

运城老年大学试用教材

中国历史

(上册)

周庆义

山西运城老年大学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闻喜县印刷厂印

运城老年大学校歌

集体创作

1 = E $\frac{4}{4}$

赞颂

5 1 2 3 6 | 5 - - - | 3 5 6 i 5 6 | 5 - - - |

河 东 大 地， 百 花 争 艳，

3 3 6 5 3 · 2 | 1 · 6 1 2 3 - | 5 · 6 i 5 3 3 2 |

老 年 人 大 学 是 新 的 创 举， 是 我 们 生 活 的 乐
波 活、有 生 气

i - - - || : 5 3 · 2 1 - | 7 · 7 6 5 6 -]

四。 生 命 在 于 运 动，
发 扬 革 命 传 统，

5 3 · 1 2 - | 6 · 5 6 1 2 - | 3 3 3 0 0 |

知 识 永 远 无 限， 勤 学 习，
坚 持 党 的 路 线， 为 四 化，

5 5 5 0 0 | 3 · 3 3 1 1 2 5 - | 3 · 5 3 1 1 2 1 · : ||

善 保 健， 为 了 幸 福 的 晚 年， 为 了 幸 福 的 晚 年。
为 人 民， 为 了 美 好 的 明 天。 为 了 美 好 的 明 天。
坚 定、有 力

6 6 1 6 | 3 2 2 1 6 | 3 3 6 6 | 5 6 5 2 3 |

老 骥 伏 枥， 志 在 千 里， 老 益 壮， 老 有 所 为，
尾 声、高 潮

6 6 5 3 2 | 3 2 2 1 6 | 5 1 2 3 5 |

老 骥 伏 枥， 志 在 千 里， 余 热 生 辉，

2 · 1 6 5 6 - | 5 1 2 3 6 | 5 - - - |

努 力 贡 献。 河 东 大 地，

3 5 6 i 5 6 | 5 - - - | 6 · i 5 | 3 2 |

百 花 争 艳， 焕 发 青 春

1 6 1 2 3 · v 5 | 6 6 6 i 5 3 | 5 · 3 5 6 | i - - - ||

放 眼 未 来， 为 共 产 主 义 事 业 永 远 向 前。

主 编 王沁声

副主编 王天胜 李 雪

宋书林 杨志宏

蔡贵农

编 委 刘乐成 孙功炎

许崇义 何国安

周庆义 董竹平

董平锁 谢伟峰

前 言

运城老年大学暂开设十门课，现已编出大部分试用教材，含老年保健、老年体育、文学、历史、地理、绘画、园艺花鸟、法律常识等八个分册。它针对老干部的特点，体现了趣味性、故事性、通俗性、实用性，兼顾科学性和系统性。是一套适合老年人学习的科学丛书。既可作老年人大学的教科书，又可供广大老年人作函授教材。

这套教材是我们组织任课教师编选的，主要供内部使用，也很想同有关单位交换，以收抛砖引玉之效。由于时间较短，内容较多。加之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请广大读者及各方面人士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提高。

在编选这套教材时，我们得到了山西人民出版社有关同志的支持以及运城师范专科学校景克宁教授和孙功炎副教授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山西运城老年大学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编写说明

《中国历史》简述了从夏、商奴隶社会到“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历史概况。全书分上下两册，由一百三十六篇文章组成。上册第一篇为《中国历史朝代系统表》，起提挈全书的作用。另有大事记六十七篇，叙述历代发生的大事。为保持历史的连续性与系统性，所以在每事前加有必要的连续段。下册有人物传记六十八篇，分别记叙各个历史时代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有较突出贡献的人物事迹。

由于老年大学课时的限制，有好些应当编入的事件和人物未曾编入，对编入的叙述也较为简略，对经济、文化上的一些资料 and 情况也没有全部列入。如有机会，当另作补充。

由于编者水平的有限，本书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提出意见，以便今后修改。

编者 周庆义

目 录

一	中国历史朝代系统表	(1)
二	大禹治水的传说和夏朝的建立	(7)
三	汤伐桀灭夏、建商	(8)
四	盘庚迁殷和殷墟甲骨文	(9)
五	武王伐纣、建周	(11)
六	周公东征和周初大封建	(12)
七	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	(14)
八	幽王烽火戏诸侯和平王东迁	(15)
九	齐桓公用贤霸诸侯	(16)
十	晋文公知义成霸业	(18)
十一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19)
十二	向戌弭兵和三家分晋	(20)
十三	商鞅变法	(22)
十四	合纵、连横	(24)
十五	中国的第一个皇帝	(25)
十六	秦朝的暴政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革命	(28)
十七	楚汉相争	(29)
十八	七国之乱	(32)
十九	西汉对匈奴的和亲与战争	(34)
二十	王莽篡权	(36)
二十一	绿林、赤眉起义	(37)
二十二	东汉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和党锢之祸	(39)
二十三	黄巾军起义	(40)
二十四	袁曹官渡之战	(42)
二十五	赤壁之战和三国鼎立	(44)
二十六	白痴皇帝和八王之乱	(45)
二十七	淝水之战	(46)
二十八	把马当老虎的门阀士族	(48)
二十九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49)
三十	平分北国的玉壁之战	(51)
三十一	隋统一中国及同台湾的关系	(53)
三十二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朝的建立	(54)

三十三	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56)
三十四	科举制度·····	(58)
三十五	“天可汗”和文成公主入吐蕃·····	(60)
三十六	安史之乱·····	(62)
三十七	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	(66)
三十八	黄巢起义·····	(68)
三十九	“李天下”和“儿皇帝”·····	(70)
四十	黄袍加身和杯酒释兵权·····	(72)
四十一	王小波、李顺起义·····	(73)
四十二	澶渊之盟·····	(74)
四十三	四大发明·····	(76)
四十四	王安石变法·····	(78)
四十五	靖康之耻·····	(81)
四十六	南宋与金的对峙·····	(83)
四十七	钟相、杨么起义·····	(86)
四十八	元统一中国·····	(87)
四十九	元末红巾军起义·····	(89)
五十	朱元璋起义和建立明朝·····	(91)
五十一	郑和下西洋及驱逐倭寇的斗争·····	(93)
五十二	资本主义萌芽·····	(96)
五十三	明代的宦官专权·····	(97)
五十四	明末农民大起义·····	(100)
五十五	清朝的建立·····	(103)
五十六	郑成功收复台湾和台湾回归祖国大陆·····	(105)
五十七	鸦片战争·····	(107)
五十八	太平天国运动·····	(110)
五十九	第二次鸦片战争·····	(115)
六十	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	(118)
六十一	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和中法战争·····	(121)
六十二	甲午中日战争·····	(124)
六十三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127)
六十四	戊戌变法·····	(129)
六十五	义和团运动·····	(131)
六十六	辛亥革命·····	(135)
六十七	袁世凯窃国和二次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140)
六十八	新时代的曙光·····	(144)

一 历史朝代系统表

早在四、五千年之前，大约相当于父系公社或者更早一些，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居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居住在东方的人被称做夷族。夷族中一个著名的酋长，叫太皞(kào号)，风姓，传说他人头蛇身(一说龙身)，可能是蛇(或龙)图腾的一族。一般把太皞和伏羲做为一个人，并说伏羲画八卦。从这个传说中可以窥测到这是一个开始有畜牧业的时代，八卦不过是一种记事的符号。与太皞有关系的是少皞，可能是从太皞氏分出来的。

当时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统被称为狄族、戎族。其中有个犬戎族，另一个薰鬻(xūn yù 助育)族，是北方强族。即秦汉时匈奴族的祖先。

居住在南方的叫蛮族，其中九黎族最强。九黎族在太皞、少皞族衰败后，进入中原，蚩(chī 痴)尤是九黎族的酋长。神话传说他兽身人言，吃沙面，铜头铁额，耳生硬毛，头上有角，可能是以猛兽为图腾。

最先由西方进入中原的是炎帝族，姜姓，传说他牛头人身，可能是牛图腾的氏族。西方羌(qiāng枪)族的一支。炎帝，号神农氏，是标志农业的时代的开始。九黎族进入中原后，驱逐炎帝族，后来炎帝族与黄帝族联合，在涿鹿(涿鹿，或说在今河北怀来县，或说在今河北涿鹿县，或说在今山西运城市解州镇一带)大战，蚩尤被杀，九黎族一律退回南方，一部被炎帝族、黄帝族俘获，称为黎民。杨筠如《尚书鬻诂》：“黎民当即九黎之民”，直到后世还以“黎民百姓”称一般平民。

黄帝族，是从西北方迁来中原的，姬姓，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缙云氏。古代学者都认为华夏始祖，所以至今说我们中华民族是“黄帝子孙”；又因炎帝、黄帝二族曾结成联盟，打败九黎族，定居中原，把黄帝和炎帝说成象两个亲兄弟一样，所以又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古代关于黄帝的传说很多，把我们古代许多创造，如用玉(坚石)作兵器、造舟车弓矢、染五色衣裳、养蚕、造文字、制乐器、建官制等等都归为黄帝或其妃嫔、大臣的功劳。

黄帝战胜了蚩尤，为炎帝族和黄帝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给夷人发展也造成有利的局面。此后夷人融入华人的有四个分支：皋陶(gāo yáo 高姚)、伯益、颛顼(zhuān xū 专旭)。号高阳氏，其后裔为祝融氏)、帝喾(kù库，号高辛氏，名俊)。从而黄帝在人们传说中越来越具有帝王的形象。

在我国古代传说有三皇五帝。三皇，各书传说不一。一、《河图·三五历》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二、《尚书大传》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三、《白虎通》以伏羲、神农、燧人或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四、《春秋运斗枢》以伏羲、神农、女媧为三皇；五、秦博士以天皇、地皇、秦皇为三皇(始皇议帝号时说)；六、

《尚书序》、《帝王世纪》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五帝，各书记载也不一。一、《礼·月令》以太皞、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为五帝；二、《世本》、《大戴礼》、《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三、《尚书序》、《帝王世纪》以少昊（喾）、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

在南方居住的苗、黎、瑶等族，虽都有传说的神话，但后人很少记载。南方最流行的是有关“盘瓠”（bō wù）的神话，后到三国时有一个叫徐整的作《三五历记》将盘瓠吸收到汉族神话中，把盘瓠说为开天辟地的盘古氏。

部落联盟制度，是在氏族公社后期才形成的。部落联盟已经超出了原来血缘关系的界限，按地域互相结合，是氏族公社到国家的过渡形态。部落联盟首领由联盟议事会推举产生，这就是所谓“禅让制度”。传说中的尧、舜、禹就是这样产生的部落联盟首领。尧号陶唐氏，舜号有虞氏，禹号姓，号夏后氏。在黄帝时，人们可能还是以游牧生活为主，所以史书上载黄帝往来迁徙无定。到尧、舜、禹时，就进入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时期了，所以传说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舜都蒲板（今山西永济县）、禹都安邑（今山西夏县）。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当部落联盟制，逐渐形成套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机构时，国家就从原始社会中脱胎而出了。

禹老时，在部落联盟议事会上提出继任人选问题，大家先举皋陶。皋陶很快死了，又举皋伯益。禹死后，禹的儿子启夺取了禹原来职位，杀死伯益，建立了夏王朝。夏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度的王朝，姒姓，最早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后来却时有迁都。自启至桀共十六帝，十三代，《竹书纪年》说共472年，《三统历》说432年。总之，是从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这样一段时间内。

夏桀，是夏朝最后一个暴君。商汤伐桀，灭夏，建立了商朝。商，子姓，都亳（bó），传十代到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汤至盘庚中间还曾迁都五次。自汤到纣共十七代三十王（汤子大丁早死，不计），其中兄死弟继的十四王。商年代不可考，《竹书纪年》说496年，《三统历》说629年。大约是在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这段时间内。

商纣，是商朝最后一暴君。据《史记·周本纪·鲁世家》以及《竹书纪年》年代推算，在周文王姬昌死后四年，约公元前1066年，武王姬发载文王木主伐纣，灭商，建立了周王朝，都镐（hào）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历史上叫西周。西周从武王灭商到幽王凡十一代十二王，《竹书纪年》说共257年。自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中国历史有确实纪年，是从公元前841年，即共和元年开始的，共和以前年代不甚确实）西周是封建领主社会。

公元前771年，周的都城镐京被西戎攻破。第二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城到洛邑，历史上叫做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自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这一时期，周王室衰弱，政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各诸侯国间，不断进行着兼并战争。在西周初据说有八百诸侯，到春秋时兼并为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其中重要的是齐、晋、楚、秦、卫、鲁、郑、宋、陈、蔡、中山、

吴、越等。在各诸侯国中有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及楚庄王。又有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及越王勾践。前一说法流行较广，但不如后一说法更符合历史实际。战国时期，自公元前475至前221年，这一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出现了七雄并峙的局面。这战国七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时期社会进入到封建地主制。

秦始皇嬴政，继承了秦先人遗业，逐步吞并了战国时六国，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地主国家。从公元前221年开始（时为秦始皇二十六年），至前207年灭亡。仅二世十五年，是个短命的王朝。秦都在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秦行暴政，陈胜、吴广首先发难，全国农民大起义，秦王朝灭亡。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建立汉，定都长安（今西安西北）。历史上叫做西汉。公元8年灭亡，西汉共存在了214年。

王莽在公元9年篡西汉，建立了国号叫做新的王朝，至公元23年为农民大起所埋葬，共存在15年。公元23年农民军拥淮阳王刘玄称帝，年号更始，至公元25年。从9年至24年，一般史书及纪年表多附于西汉下。

刘秀在农民大起义中，建立了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东汉自公元25年至220年，共196年。

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Pí批）篡夺了东汉政权，建立魏国，定都洛阳。接着刘备在221年称帝，建立了汉（历史上称蜀汉），定都成都。孙权在公元222年建立吴国，以建业（今江苏南京）为都城，这就是三国时期。蜀在公元263年被魏司马昭灭。魏至公元265年被司马炎所篡。吴在公元280年被晋武帝司马炎灭。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曹魏建立晋朝，定都洛阳，历史上称西晋。公元280年灭吴，结束了分裂局面，国家又统一了。可从东汉以来，不断南迁的匈奴、鲜卑、羯（jié节）、氐（dī底）、羌等族不断掀起反抗西晋的斗争。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山西南部起兵，建了汉国。308年自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313年攻下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司马愷。西晋大臣又在长安拥立了晋愷（mǐn敏）帝司马邺，316年，刘聪族弟刘曜篡晋愷帝投降。西晋自265年至316年，仅存在了52年。

西晋亡，北方、南方纷纷逃亡江南，联合江南大地主，共同支持晋皇族司马睿（ruì锐）于317年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至420年为刘裕灭。在这104年间，北方陷入非常混乱的局面，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历史上称为十六国，实际数目多于十六国。现将十六国家割据情况列表如下：

国号	种族及创建者	政权存在年代	都城	附记
汉	匈奴族刘渊	304~318	平阳(山西临汾)	因建国较早,不在十六国数内。
成	巴氐族李雄	307~347	成都(四川成都)	
前赵	匈奴族刘曜	318~329	长安(陕西西安)	
后赵	羯族石勒	319~350	襄国(河北邢台)	
魏	汉族冉闵	350~352	洛阳(河南洛阳)	因存在时间太短,不在十六国数内。
前凉	汉族张骏	324~376	凉州(甘肃武威)	
前秦	氐族苻健	351~394	长安(陕西西安)	
前燕	鲜卑族慕容皝	337~370	龙城(辽宁朝阳)	子慕容皝迁都蓟(北京西南),357年又迁都于郟。
后燕	鲜卑族慕容垂	384~407	中山(河北定县)	
后秦	羌族姚萇	484~417	北地(陕西富平)	
西秦	鲜卑族乞伏国仁	385~431	苑川(甘肃榆中)	
后凉	氐族吕光	386~403	姑藏(甘肃武威)	
南凉	鲜卑族秃发乌孤	397~414	金城(甘肃皋兰西北)	
南燕	鲜卑族慕容德	398~410	滑台(河南滑县)	
西凉	汉族李暠	400~421	敦煌(甘肃敦煌西)	
夏	匈奴族赫连勃勃	407~431	统万城(陕西横山西)	
北燕	汉族冯跋	409~436	龙城(辽宁朝阳)	
北凉	匈奴族沮渠蒙逊	401~439	姑藏(甘肃武威)	

公元420年,东晋将领刘裕废掉东晋皇帝,自立为帝,国号宋(420—479)从此,我国进入南北朝时期。南朝为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齐(479—502)的建立者为萧道成;梁(502—557)的建立者为萧衍;陈(557—589)的建立者是陈霸先。四朝都城均在建康。北朝是鲜卑族拓跋氏,386年拓跋珪在代北(内蒙古、山西北部)建立了魏,历史上称北魏。398年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北方。494年,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534年至550年,是高欢控制下的政权。550年高欢子高洋废东魏孝静帝,建立了北齐。北齐550年至577年。东魏、北齐都城均在郟(今河北临漳)。西魏,535年至557年,是宇文泰控制下的政权。557年宇文泰子宇文觉废西魏,建立了北周。北周557年至581年。西魏、

北周都城均在长安。

577年，北周灭北齐。581年，掌握北周大权的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定都长安。589年隋灭陈，结束了东晋以来二百七十多年南北分裂局面。隋也是个短命王朝，到618年，在农民大起义中灭亡，仅存在了38年。

隋末，农起大起义，617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利用隋政权将覆灭的形势，起兵太原，攻入关中，占领长安。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亡。李渊做了皇帝，把长安作都城，建立了唐朝。一直到907年灭亡，共290年。

907年，唐亡。在以后54年时间里，称为五代，有五个短命王朝先后承接，列表如下：

朝代名	建国者	起止时间	国都
后梁	朱全忠（朱晃） （朱温）	907~923共17年	大梁（今开封）
后唐	李存勖	923~936共14年	洛阳
后晋	石敬瑭	936~947共12年	大梁
后汉	刘知远	947~951共5年	大梁
后周	郭威	951~960共10年	大梁

以上五个朝代的统治地区，主要是在黄河流域一带。同时在南方及北方的太原还有十个小国，所以这一时期又称为五代十国时期。十国列表如下：

国名	建国者	起止时间	国都
前蜀	王建	891~925共35年 907年始称帝	成都
荆南（又名南平）	高季兴	907~963共57年 924年受唐封为南平王	荆州（今湖北江陵）
后蜀	孟知祥	926~965共40年 934年始称帝	成都
南汉	刘隐 其弟刘岩称帝	905~971共67年 917年始称帝	广州
南唐	李昇（biao变）	937~975共39年	金陵（今南京）
吴	杨行密	892~937共46年 902年受唐封为吴王	扬州
楚	马殷	898~951共56年 907年受梁封为楚王	长沙
闽	王审知	893~945共53年 907年受梁封为闽王	长乐（今福建福州）

吴越	钱镠	893~978共86年	杭州
		907年受梁封为吴越王	
北汉	刘崇(刘晏)	951~979共29年	太原

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yīn印)发动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宋朝，定都东京(河南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宋先后灭掉其它几个并立政权，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长期的分裂局面。到1127年灭亡，共168年。北宋时，我国北部地区，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都城在上京(今辽宁巴林左旗附近)。辽太祖阿保机在916年建国，于1125年亡，共210年。西夏是党项族政权，都兴庆(宁夏银川)，1038年西夏王元昊(hào浩)自称皇帝。1044年，北宋与西夏达成协议，元昊表面上放弃皇帝称号，接受北宋册封的夏国主之称。1227年为蒙古所灭，共存190年。

住在我国东北的女真族兴起，1115年阿骨打自立为皇帝，建立了金朝，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称上京。在灭辽和北宋后，曾先后迁都到中都(今北京)、开封等地。1234年在蒙古和南宋联合进攻下灭亡，共120年。北宋在1127年亡后，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后又南逃，定都临安(今杭州)，历史上称南宋。1279年为元灭亡，共153年。

元是蒙古族，1206年铁木真建蒙古汗国，他做大汗，称成吉思汗。1260年，忽必烈做皇帝，1271年定国号为元，建都燕京，(今北京)，叫做大都。至1368年灭亡。自成吉思汗算起，共存在163年，自定国号元起，共98年。

明，朱元璋在元末农民大起中，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先定都南京，1421年，迁都北京。自1368年建国，至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被推翻，共277年。

清，是满族女真族一支。1616年努尔哈齐建立后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入关，定都北京。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从皇太极建国号为清起，至灭亡，共276年；从定都北京算起，至灭亡，共268年。清在1839年以前属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为民国元年。建都南京。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十月一日正式成立，首都北京。

二 大禹治水的传说和夏朝的建立

在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都传说远古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在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在氏族社会的末期，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个传说，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在征服大自然斗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尧、舜时洪水为患，用鲧（gǔn）治水，鲧用堵塞的办法，失败了。舜就把鲧流放到羽山，鲧就死在那里。部落联盟又选用了鲧的儿子禹来治水，禹接受鲧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用了十三年时间，终于治平了洪水。在十三年当中，他三过其门而不入，把小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禹是我国古代人民最崇拜的人物。

据《史记》记载，禹、益、后稷三人一同奉舜帝命令，禹负责治水；益把稻种发给在低湿地区的人们，让他们种水稻；后稷教民稼穡。《论语》上说：禹“尽力乎沟洫”。从这里看来，禹大概在灌溉工程上尽了力，并与益、后稷协同发展了农业生产。《禹贡篇》，又系统地说明山川土壤物产贡赋，禹把全国分为九州：冀、兖（yǎn）、青、徐、扬、荆、豫、梁、雍。这说明农业发展了，部落联盟的地域扩大了，氏族的血缘纽带松弛了，接近崩溃了。相传禹时还有很多发明：伯益发明了凿井；奚仲发明了车；青铜冶炼也开始了，禹用青铜铸了九个大鼎，象征着他统治下的九州；仪狄把粮食做成香酒。《越绝书》载风胡子说，神农时用石做兵器，黄帝时用玉做兵器，禹时用铜做兵器，战国时用铁做兵器。以上传说总有其一定的真实性吧，想见禹是远古生产力大跃进时代的代表人物。

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必然要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城是阶级社会开始的标志，传说禹是开始造城的人（一说嫫作城）。皋陶又为禹用法律镇压了那些反对他的人，这也是阶级社会开始的标志。从而禹的权力也随之增强，发号施令，征伐三苗（南方的三个部落），把俘虏转化为奴隶。这样奴隶就多起来，随着私有财产的发展，奴隶也成为私有了，奴隶主阶级也就产生。禹不断巡行各地，一次在涂山召集氏族首领，就有一万多部落带上财宝来讨好禹。又一次在会稽召集各部落首领，防风部落首领来晚了，禹当时就把他杀掉。禹已经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天子”了。

社会在发展，氏族制度已经到了崩溃的时刻，奴隶制社会必然产生。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就继承了王位，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不过禹并不曾废除氏族公社的“禅让”制。禹老时，在部落联盟议事会上提出继任人选问题，大家举皋陶。可皋陶很快就死了，又举孝伯益。禹死后，禹的儿子启杀死了伯益，继承了禹的位置，建立了夏王朝。在战国以前的书，从不称夏禹，只称禹、大禹、帝禹；对启才称夏启、夏后启。从这里可见禹和启两人的时代不同了。

启建立了夏王朝，氏族制为国家所代替；夏朝实行帝位世袭制，传贤为传子所代替。伯益为维护禅让制，被启杀掉了。与夏同姓似的部落有扈氏（在今陕西广户）也起兵反对启破坏“禅让”旧制，启与有扈氏战于甘，有扈氏被启灭掉，罚做牧奴。伯益之死，有扈氏之败，都是历史发展倾向所决定，他们都做了维护旧制度的牺牲者。

从启开始，夏国家建立起来，但政权并不稳固。启的儿子又争夺继承权，启放逐小儿子武观到黄河西岸，武观反叛，启又派兵平定了叛乱。启死后，儿子太康继位，太康荒淫，后羿趁太康到洛水北岸打猎未归，夺取了夏都安邑，拒绝太康回来，自己做了君长，号有穷氏。后来羿又被他的亲信人寒浞（zhào 洩）收买羿家奴杀死，夺取了羿的政权，还占有了羿的妻妾。太康失位后，逃到同姓斟寻（zhēn xún 针寻，在今河南巩县西南）。羿灭斟寻。立仲康。仲康死，子相逃到商丘（在今河南商丘）、又逃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县），依同姓昆吾（今濮阳西南）等部落。寒浞攻杀相。相妻从壙洞爬出，逃归她母家有仍氏，生下相的遗腹子少康。少康先做有仍氏牧官，被寒浞迫害，又逃奔虞后裔有虞氏（在今河南虞城县），做有虞氏庖正，虞君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他。少康很能干，他争取夏同姓，积极做复国准备，终于攻灭了寒浞。太康失国后，又被少康恢复，史称“少康中兴”。可见一个新制度的建立，是要经过一番斗争的。

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奴隶制是极端残酷、野蛮的剥削制度，但从历史的眼光看来，从原始公社到奴隶制国家，却是一大进步。恩格斯说过：“只有奴隶制才能使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文化的繁荣，即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反杜林论》）

三 汤伐桀灭夏、建商

夏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建国，共传十三代，十六个王（从夏启计算起）。到了十三个王孔甲起，夏王朝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而开始走向崩溃。《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乱淫，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孔甲以后四世是履癸，履癸即夏桀，他更加暴虐，无限制地征用民力，残酷镇压奴隶和平民，是一个有名的暴君。《国语·周语》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隳”；《尚书》说桀不用贤良，不恤平民，“乃大淫昏”；《史记·夏本纪》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有个大臣关龙逢（Pánq 虔，一作蒙龙逢。）他向桀进谏说：“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不胜，民惟恐君后亡。”桀说：“吾有天下，犹天有日，日亡吾乃亡。”桀不听，关龙逢立而不去，桀杀了关龙逢。商汤讨伐夏桀的誓词中说到当时人民咒骂夏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意思是说大家宁肯与夏王朝一齐同归于尽，表示出人民对这个政权的无比痛恨。夏桀为了挽救他垂危的命运，曾为“仍之会”，企图压服东方诸部落，借以举制兴起的

商。但是他这一盘棋失败了。《左传》说：“夏桀为仍之会，有缙（mī民）叛之。”又说：“桀克有缙以丧其国”。桀靠军事武力，也不能挽回他危亡的命运。

商是兴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古老部落，传说商的始祖名契，契母简狄吞吃玄鸟卵有孕而生契。这反映了商族是以燕子当作自己的氏族图腾。从契到汤，已传十四世，是夏朝的一个属国。

汤即位以后，用伊尹为相。汤用伊尹，说来还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伊尹，原本是汤妻子的陪嫁奴隶，伊尹初到商汤时，做厨司，汤发现伊尹很有才能，就和他交谈治国的道理，伊尹滔滔不绝地谈了很多好道理，汤马上把伊尹提拔做他的助手。这个故事说明了汤对人才的特别重视。汤后来伐桀之所以胜利，据史书上记载，伊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商汤在伊尹辅佐下，国力日益强大。夏桀无道，失掉民心，汤和伊尹商量伐桀，伊尹说：“现在夏桀还有力量，我们先不去朝贡他，试探一下，看他怎么样？”汤按伊尹的计策，停止对桀的进贡。夏桀大怒，命令九夷发兵伐商汤。伊尹一看九夷还服从夏桀，就赶快请汤向桀谢罪，并恢复了进贡。过了一年，九夷一些部落忍受不了桀的压榨勒索，逐渐脱离夏朝。伊尹说伐桀的时机到了。可是四百多年的夏王朝，也不是轻而易举地能推翻的，汤和伊尹研究了一番，决定先从灭夏的一些属国做起，以削弱夏的藩卫，扩大自己力量。汤先灭掉附近的葛（在今河南宁陵北），接着又灭掉十几个小国和部落，又进而攻灭了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在今山东范县）。然后举兵伐桀。

汤说：“夏桀作恶多端，上帝的意旨要我消灭他，我不敢不听从天命。”人民本来十分痛恨桀，汤又借上帝意旨来动员将士，所以将士们都很勇敢，他出兵于顾（ér儿），（据孔颖达疏：“盖今潼关左右”，《太平寰宇记》谓：“即雷首山，在山西水济县南”。）又督师于亳（bó勃），（今山西垣曲县离黄河十里多有上亳城、下亳城，据《垣曲县志》载：即汤伐桀督师处。）颍至亳连成一连线，说明汤的军队布满中条山，对桀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形成一个半圆的钳形包围圈。最后逼桀在其国都决战。《史记·夏本纪》说：“桀败于有纛之墟，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有纛之墟，据《蒲州府志》，即今山西永济，鸣条，岗名，在今山西运城（古安邑）北。夏师大败，桀奔依昆吾（今河南濮阳），汤灭掉最后一个夏属国昆吾，桀逃南巢（今安徽巢县），死于南巢。

夏亡，汤回到亳（今河南商丘），一说建都于西亳（今河南偃师）。商是我国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奴隶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 盘庚迁殷和殷墟甲骨文

汤传至第十代，第二十个王，到了盘庚，中间迁都五次，五迁的年代和地点说法不一。据《史记·殷本纪》、《尚书序》、《括地志》、《水经注》、《康熙字典》、

《中华大字典》、《辞海》等书及《河津县志》载：商自十四帝祖乙迁于邢（gēng狄，即今山西河津县王村），至第二十帝盘庚乃迁于北蒙，号之曰殷（今河南安阳县小屯村）。盘庚迁殷以后，商又称殷，又称殷商，本名仍称商。

盘庚迁殷后，商王国的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了发展，特别到二十三帝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可以说是商最强盛的时期。武丁即位后，三年不管事，三年后自称梦见圣人，名叫说（yuè悦），画出说的面貌，令百官去寻找，终于在傅岩（今山西平陆县圣人涧，现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筑版的奴隶中找着了。殷俗信神鬼，武丁说是梦中得到圣人，贵族们不敢反对，就任用傅说做宰相。傅说辅佐武丁，商国大治，《孟子》说：“武丁朝诸侯，王天下，犹运之掌上。”虽有些夸大，但武丁时的商，国家强盛，社会安定，是可信的。傅说被称为“中兴贤相”，武丁死后，被称为高宗。

为了研究商文化，对河南安阳县小屯村一带殷墟，从1928年开始发掘，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进行了十五次发掘。解放后，又连续不断地进行大量工作。发现了大量用奴隶进行人祭的遗迹，在商王和大贵族坟墓区，发现了大量的人殉和数以千计的杀人祭坛。在一坐宫殿基址里，还发现千把左右的使用过的石镰，说明奴隶们在集体劳动，劳动后把石镰堆放一起。奴隶俑，男的双手铐在背后，女的双手铐在前面。这十分深刻地反映了商国奴隶们的悲惨处境。商王的宫殿遗址，手工作坊遗址，制骨、制陶、铸铜遗址，及居住区均有发现。在器物上有大量的青铜酒器，有酿酒用的鬯（lè雷），装酒用的壶，贮酒用的尊，盛酒用的卣（yǒu友），温酒用的盂（hé和）、斝（jiǎ假）、爵，渴酒用的觚、斝（zhì至）、斟酒用的斗等，以及其他青铜、象牙、玉和白陶制作的各种贵重器物也出土很多。说明奴隶主占有社会财富，过着极其豪华的生活。

奴隶主不仅垄断了社会财富，还垄断了文化知识。在安阳发现十多万片有字的甲骨，是奴隶主占卜的纪录。殷墟这些甲骨，上面刻有文字，所以叫甲骨文。早在清朝末年，小屯村农民耕地时，挖出一些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和甲骨。起初，把甲骨当成中药“龙骨”卖给药店。后来发现这些“龙骨”上刻有文字，就又卖给古董商人。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认出甲骨上面的文字是商朝文字，于是引起人们的重视，就出现了专门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和科学鉴定，甲是乌龟的甲壳（大多是腹甲，少数是背甲），骨是牛肩胛骨，也有少数是肋骨和其他动物的骨头，还有人的头盖骨。甲骨上的文字是用青铜刀刻上去的，有许多完整的龟腹甲上，还发现有用毛笔写的字。根据研究结果，看出商统治阶级最讲迷信，因之商王对上帝鬼神几乎每天都要祭祀，凡事都要通过占卜来祷告祈求。占，就是占卦；卜，就是问事。甲骨文就是占卜的纪录文辞。甲骨文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卜辞，剔除其迷信的成分，能得到许多商朝的历史资料。

五 武王伐纣、建周

商自汤到纣，共延续了十六代，三十王。纣王是商最后一个暴君，历史上对他不说一句好话，其实他在历史上也有一定的功绩。他曾经攻伐东夷，把疆土扩展到我国东南一带，使长江流域得到了开发。东夷奴隶主贵族向商进攻，掠夺奴隶。纣王父亲帝乙就对东夷发动大规模反击，但没有取胜。纣即位后，亲自征伐东夷，他身先士卒，把东夷打败，俘虏了亿兆东夷人，一直打到长江下游。从此，中原文化传播到东南地区，那里的人民，吸收了中原文化，发展了生产。所以对开发我国东南地区和长江下游传播文化来讲，纣王是有过贡献的。

但是纣很荒淫，他大造宫殿，在邯郸以南，朝歌以北修建了许多离宫别馆，又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他宠爱妲己，妲己教纣王做炮烙刑具，就是用铜铸成空心柱子，行刑时，把犯人脱光衣服绑在柱子上，柱子中间烧红炭火，把犯人活活烫死。他异母哥哥微子启劝谏他，纣王不听，微子逃跑。他叔父比干劝告他，他杀死比干，剖腹取心。他堂兄弟箕子劝说他，他囚禁了箕子。谁也不敢劝说他了，有的一言不发，有的借病不朝，有的偷上太庙祭器、乐器，投奔到周。老百姓更苦透了，不仅有服不尽的劳役，怎样贡奉也不够的酒肉，而且还时时有冒被砍头、剥脚、剖腹的危险，人民只好四处逃亡。

这时周在西方兴起。周，是渭水中游黄土高原上一个古老部落。相传周的始祖后稷，名弃，他母亲姜嫄，有邠氏女，到野外践踏了巨人脚印，而生了弃。后来就留在他母亲氏族中，安家立业。后稷，就是传说中教民稼穡的农师。后稷十几传至公刘，迁居到豳（bīn宾，今陕西邠邑），从事农业生产，并实行了劳役地租。自公刘九传到古公亶父，因受戎狄人的压迫，又迁居岐山下周原（今陕西岐山），开始营建城郭室屋，设官司，把人民组织在“邑”的地域性组织之中，看来粗具国家雏形。所以周人称古公亶父为太王，尊奉他为周王朝奠基人。古公亶父死，子季历立，击败了西北游牧部落，日渐强大，引起了商王文丁不安，文丁杀死季历。季历死，子昌立，就是周文王。周文王注意农业生产，实行仁政，内政整顿得很好。他就发动战争，讨伐西北各部落小国，又扭回头向东发动了翦灭（今山西黎城）战争，最后灭了商王的亲信崇（今山西长安县）。周灭崇后，迁都于丰（今陕西长安县），巩固了周对渭水流域诸部落的统治。文王死后，子发立，是为武王。

商被纣王搞得乱七八糟，武王在姜尚的协助下做出进攻商的决定。先在孟津（今河南孟津县）大会诸侯，赶来会盟的部落和小国首领有八百多个。周武王就在会盟大会上公布了纣王罪行，宣读了伐纣宣言。会后，等到了适当时机，文王死后第四年春天，武王载着文王木主，出兵伐纣。由于八百诸侯相助，所以大军浩浩荡荡地从孟津向南都城朝

歌进发。一路上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就到了离商都七十里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北）。

这时，纣王正与妲己在鹿台上歌午，听到报告，才收了酒席，急急应战。可是他的军队还在东夷前线，一时抽不回来。纣王下令把大批奴隶和俘虏编入军队，一共七十万人，开赴牧野前线。武王的军队只有六、七万人，以六、七万人，对七十万人，在数量上说，处于劣势。可是周兵士气旺盛，纣王的军队，不仅不抵抗，而且在阵前纷纷起义，掉转戈矛，杀向纣王。纣王一看不妙，赶快逃回朝歌城里，跟他的只有百十来人。纣王知道末日已到，穿上他的宝衣，在鹿台上大吃一顿，叫人在鹿台下放一把火，把自己烧死了。

纣王死了，殷商朝亡了。周武王得到了各部落和小国首领的拥戴，建立了周朝，自称天子。建都在镐京（今西安市西南），历史上称西周。

最后，再说一点商纣王和周文王、武王在施政和用人方面是大不同的。前面已经说过，纣王不恤百姓，不用贤臣，杀戮贤臣。据说武王伐纣前，先派人到商侦察，侦察的人回来报告说：坏人当权，朝政昏乱；又说：好人全被斥逐，百姓闭口不敢说话。武王看到这种情况，才决心举兵伐纣的。在他的誓词中指贵纣听信妇言，不祭祀祖宗，不信任亲族，招集四方罪人和逃奴。这最后一条，正是各诸侯国仇恨纣王的，从而激发了各诸侯国跟随武王伐纣的决心。而奴隶们呢？从商纣王的军队在阵前倒戈起义一事看来，足可证奴隶们对纣王的痛恨了。再说文王的政治，与纣王相反。他禁止饮酒打猎，施行裕民政策，有节制的征收租税，而自己却十分勤俭，穿着普通人的衣服，亲自到田地上耕作。他针对纣王招诱奴隶，为其他小国所怨恨的形势，提出谁的奴隶归谁所有，不许他国隐匿，并定为法律。这样就争取了各诸侯国对周文王的拥护。史载西伯（周文王）行仁政。在用人方面，“文王访贤”的故事，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文王访贤”，就是在一次打猎时，在渭水南岸，遇到一个钓鱼的老人，这位老人姓姜名尚，字牙，又叫姜子牙。文王和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愈谈愈投机，从这老人的谈论中认识到他对治国安邦的确有一套精辟的见解。文王高兴地说：“象你这样有本领的人，我们老太公盼望好久了！”就干脆称他为“太公望”。马上请姜尚坐上车，同回王宫，封他为专管军事的太师。周文王自从得到姜尚，事事与他商量，周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迅速发展，逐渐超过了商。在武王伐纣时，姜尚主持军事，终于一举打败了纣王。武王对用人才方面也很注意。孔子在《论语·泰伯》中就说过：“舜有五位贤臣，天下便太平，武王也说过：‘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臣子。’”从这里亦可见周能以灭商的原因了。

六 周公东征和周初大封建

周灭商后，按惯例要保存商祭祀。武王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为殷侯，留在冀都，并

着他统治商遗民。可又有些不放心的，就把商王畿分为邶（bèi背）、卫、鄘（yōng用）三个封区，分别由武王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去统治，以监视武庚，称为三监。（武庚与三叔封地说清不一，又说三分商王畿，武庚治其一，三叔治其二。）

武王伐纣后两年就病死了，子成王诵才十三岁，由周公旦摄政，三叔不服，放出谣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武庚乘机煽动管叔、蔡叔，并联合东方的旧属国奄（在今山东曲阜县）、蒲姑（在今山东博兴县）及徐夷、淮夷起兵反周。周公处此境遇，首先对在朝内的召公奭（shì式）披肝沥胆地谈了心，要他们不要听信谣言。召公等为周公这番诚恳的话感动，消除了误会。朝内安定了，周公毅然调动大军，亲自率领军队东征。花了三年时间，平定了武庚等叛混。杀死了武庚，管叔自杀了，把霍叔革了职，对蔡叔办了一个充军的罪，压服了以奄为首的东夷诸部落。东征的胜利，扩大和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周的势力伸展到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

周公东征胜利后，把商王朝奴隶主贵族全部俘虏，称他们为“殷顽民”。为了对他们严加控制，就强制迁徙到离镐京较近的洛水北岸，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成周城（在今洛阳东三十里）。同时又在成周城西三十余里筑了一座王城。派八师师兵力（一师二千五百人）驻成周，监视顽民。《尚书·多士篇》记载周公告诫顽民说：“你们受上天惩罚，本当杀死，我保留你们生命，应该感恩做我黎民。现在分配房屋田地给你们，安心谋生，如再反抗，不听天命，就是自取死亡。”又说：“如果你们安居乐业，你们子孙也会兴盛起来。”商遗民处在这样环境里，只好逐渐软化降服了周朝。

周公旦辅政七年，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他还制定了一套典章制度。到成王二十岁时，他把政权交给了成王。成王到他儿子康王两代，周王朝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史称“成康之治”。

武王灭商后，开始分封诸侯。周公东征胜利后，才实行大封建。封建的目的是为了“蕃屏周”。周初封建的诸侯，大多数是同姓子弟，正如《荀子·儒效篇》所说：“周的子孙，只要不是叛面，都变成了显贵的诸侯。”除姬姓者外，也有异姓的诸侯，这些有的是周人的亲戚，还有一些小国的首领，即所谓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裔。分封的诸侯，以姬姓者为多，据说周初共分封了七十一国，姬姓的四十国，其中武王兄弟辈的十五国，成王兄弟辈的十国。

周初究有多少诸侯国？《逸周书·世俘解》说：自武王以后，周共灭九十九国，降服六百五十二国。周初又封了七十一国。传说周初有八百诸侯。这个数字，因缺乏具体记载，很难说究竟，但数目总是不小吧。这些诸侯国中重要的是：卫，武王弟康叔的封国，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北）。鲁，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都奄（今山东曲阜）。宋，是归顺周的高贵族微子的封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齐，是太公望的封国，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周授权于齐，可以讨伐有罪小国。晋，是成王弟叔虞封国，都唐（今山西翼城），国号唐，叔虞子燹（xiǎ写）改为晋。燕，是周贵族召公奭的封国，都蓟（今北京）。周大封建，在周初，也的确起了屏卫周王室的作用，可是为以后诸侯兼管，群雄併峙留下了祸根。

封建诸侯叫“建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叫“锡命”，在仪式中，受封者从周天子接受册命，叫“册封”。册封的主要内容，说明封地疆界，辖区内人民、土地的数量，以及所赐给的下属官吏、仆役、奴隶，还有礼器、兵器、车马、服饰等，以表示给予受封者对封国的统治权力和权力等级。诸侯的等级，在商朝有侯、伯、子等爵位，有侯、甸、男、采、卫等五服名称。周制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侯、甸、男、卫称外服，封在外服的是正式国家；采称内服，封在内服的是卿大夫食邑。服定贡赋的轻重，爵定位次的尊卑。受封者接受周天子的爵和服，政治、经济的正式关系才建立起来。

诸侯对天子承担保卫王室、纳贡、朝贺、等义务，还要随时听从天子调遣，率领自己的武士、军队参加战争。天子对诸侯享有赏罚予夺的大权。国君的继位和废黜，卿大夫的任免，周王也有权过问。

诸侯在自己国内也按照同一方式分封给自己的家属和亲信以为卿大夫，叫作“立家”。有时周王也直接分封一些卿大夫的采邑。

周天子、诸侯、卿、大夫，逐级形成一个宝塔式的结构。这样，既有纵的联系，又有横的联结，盘根错节，巩固了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

七 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

西周自武王起，传到第十个王——厉王姬胡，是个有名的暴虐国王。他贪财好利，对“国人横政暴敛，加重剥削。对谏臣荣夷公十分信任，荣夷公教唆厉王实行“专利”，把“国人”赖以生存的山林川泽都霸占了。大夫芮（ruì锐）良夫劝谏不要行“专利”，他不听。“国人”纷纷议论，谴责厉王。厉王为制止“国人”的谴责，就派了一个卫国的巫师去监视“国人”，如果发现有人敢谴责国王，就抓起来杀头。这样，公开谴责厉王的人没有了，可人们在路上相遇，相互用眼色表达了对厉王刻骨仇恨。

厉王自以为他能制止住人们对他的诽谤，高兴地对召公说：“我有办法制止人们的诽谤”。召公提醒他说：“用堵住人民嘴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比用堵塞洪水的办法来治水更怕人，一旦洪水冲破堤防，就要淹死更多的人。治水要用疏导的方法，治国要人民敢于说心里话。他们有好的建议就采纳，如果不让人们讲话，是危险的啊！”厉王不听，仍用恐怖手段来对付人民，矛盾就一天天激化。

大夫芮良夫又对厉王说：“周室要衰败了，荣夷公只知搜刮民财，‘国人’怨声载道，再这样下去，会有大祸的，‘国人’要起来反抗的。”厉王不听。

过了三年，就是公元前841年，“国人”终于拿起武器来造反，厉王得到消息，吓的跑出王宫，逃奔到彘（zhì制，今山西襄县），后来就死到彘。起义群众找不到厉王，就要太子姬靖来抵罪。太子姬靖吓的跑到召公家，群众又包围了召公家，要他交出太子。召公没有办法，只好以自己的儿子顶替太子姬靖，交给起义群众，这才救了太

子。

据西周铜器铭文说，这次国人暴动，是“由于有司平时不过问政事，不去约束帮人（国人），不能管理各种官吏，有罪过也放纵他们，致使他们敢于赶走官长。甚至守卫王宫的卫队也起来造反了。”这个记载当然是不公平的，可也看出起义队伍成员具有广泛性，不仅是一般住在城里的平民，连周王室的低级官吏，王宫卫队也参加进去了，所以它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厉王跑了，太子年小，也不能露面，国家大事就由周公和召公两人共同执政，历史上把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的时期叫做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就是公元前841年。这里要特别提出来，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准确年代可以查考的开始。

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7年），逃亡在外的周厉王死了，太子姬靖也在召公家长大成人。周公、召公决定让姬靖继承王位，把政权交给了他，这就是周宣王。宣王为了巩固周王室的统治，进行了一系列的对外部落的战争，使处于崩溃前夕的西周王朝，好像得到了暂时的稳定，史书上称为“宣王中兴”。但是到了宣王的儿子幽王时，西周还是灭亡了。

八 幽王烽火戏诸侯和平王东迁

公元前782年，周宣王由于征伐外族失利，忧郁而死。他的儿子姬宫涅（niè 聂）继承了王位，就是周幽王。周幽王是在水旱灾祸频繁的情况下登上王位的，可是他不但不采取措施减轻人民负担，反而重用“善谀好利”的虢（guó 国）石父，加重对人民搜刮剥削，激化了矛盾。他有一个宠爱的妃子叫褒姒，于是就就想废掉原来的申王后和杀死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子伯服为太子。有一天，宜臼在花园玩耍，幽王故意派人把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放出来，想让老虎咬死宜臼。宜臼胆子很大，不但不躲避，反而迎上前去大吼一声，把老虎吓得后退了好几步，乖乖地象叭儿狗一样俯地不动。幽王阴谋未逞，宜臼却从此存了戒心，在幽王即位第五年，逃奔外祖父申侯那里去了。又过了三年，幽王下令废掉申王后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为王后，伯服为太子。

褒姒有个怪脾气，从来不笑。幽王为了博得褒姒一笑，竟下令将为了敌寇来侵需向诸侯示警的烽火台点着了，烽火台一举火，就表明敌人来袭击国都，凡是诸侯、将领望见烽火台上烟火举起，都得迅速领人马赶来保卫周室，所以各诸侯将领一见烽火台举火，就纷纷率兵赶来，结果到都城一看，并没有一个敌人影子。这时褒姒看见一个个将领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样子，果然大笑起来，幽王也十分高兴。这个计策就叫做“烽火戏诸侯”，也是那个惯会拍马逢迎，善谀好利的虢石父想出来的。从此，烽火台举火以示外敌侵犯的作用也就丧失了。

申王后的父亲申侯，见幽王废掉申王后和太子宜臼，就联合犬戎进攻周国都丰镐。

当申侯与犬戎联军快到国都时，幽王又令在烽火台上举火以告警，可是，诸侯和将领们以为又是幽王在褒姒，重演“烽火戏诸侯”的耍戏，就都不来。幽王只好带着褒姒仓惶出逃，逃到骊山下，幽王被犬戎军杀死，褒姒被虏去。犬戎军入丰镐，王室财物被劫掠一空，人民也遭到洗劫。

这时申侯赶来，与诸侯商议，立宜臼为国王，这就是周平王。但国都被抢劫，破坏不堪，又受到犬戎威胁，只好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这一年是公元前770年，史书上把在丰镐建都时的周称西周，东迁洛邑以后的周称东周。东迁以后，周王室衰弱，周王无力控制各诸侯国，把“政由天子出”的大一统局面，变为“由诸侯出”，“由大夫出”的分裂局面。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兼并，社会制度也由封建领主制开始逐渐转向封建地主制。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西周从周武王伐纣灭商，到周幽王被杀灭亡，共十一代，十二王，约257年。

九 齐桓公用贤霸诸侯

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春秋，从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为什么叫“春秋”呢？《春秋》本是鲁国一部史书，据说由孔子整理修订而成，所以为儒家经典之一。《春秋》一书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所以对这一段历史时期，称为春秋时期。这是一个诸侯国互相兼并的时期，也是由封建领主制转向封建地主制时期。

西周初年，据说有八百诸侯，到春秋时兼并为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其中重要的是齐、晋、楚、秦、鲁、郑、宋、陈、蔡、中山、吴、越等国。

这一时期，周天子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各个强国为了要挟天子而令诸侯，就都要争做霸主，故而春秋时期出现了大国争霸的斗争。

春秋时代，齐桓公称霸，比其他各国都早，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综合他的霸业有以下几点：（一）平他国内乱，如北杏之会，就是平定宋的内乱的。当时宋万弑其君捷（即闵公），齐会诸侯平之。（二）攘他国外患。如幽之会，当时郑侵宋，齐会诸侯伐郑。（三）谋周室的安定。如首止之会，就在谋安周室，定太子郑之位。（四）修诸侯间之友好。如葵丘之会。齐霸业有以上几点，所以说是典型的。

齐之所以成霸业，主要的有：（一）齐先世姜尚对周建立有特殊功劳，被周天子特别看重，凭着这一点在周室瓦解，天下共主的资格没落时，齐首先具有假尊王攘夷之名，以行霸政的理由和条件。（二）齐位于今山东半岛，经济发达较别处早，较别处优。东有大海，西有泰山，膏壤二千里，地势也较别国优越。

但齐桓公之所以能成霸业，主要的是依靠了贤能之人，是依靠了有名的智士管仲的辅佐。说到管仲，他与齐桓公原本是冤家仇人。这里有一段有趣的历史。管仲，名夷

吞，少时与一个叫鲍叔牙的人一块做买卖，家境贫穷。齐襄公长子名纠，鲁女所生，次子名小白，莒（莒）女所生。管仲为公子纠之傅，叔牙为公子小白之傅。襄公淫乱，小白劝谏襄公，襄公怒。叔牙说：“有毒淫者，必有奇祸”。小白就带叔牙逃莒，公子纠带管仲去鲁。后公孙无知篡位杀死襄公，无知即位一月多，被雍廩及诸大夫刺杀。鲁庄公遂奉母文姜命送纠入齐，管仲说：“小白在莒，莒地比鲁近，如果小白先入齐，就不好办了。请给臣良马，先截住小白。”这时小白闻齐国乱，也向莒借兵车百辆回齐。管仲带轻骑昼夜奔驰，行至即墨，莒兵已过即墨，从后又追三十里，正遇莒兵停车造饭。管仲见小白辘坐车中，上前鞠躬说话。这时莒兵睁眉怒目有争斗之色，管仲只带有三十乘，诚恐众寡不敌，就假装退却，猛地弯弓搭箭，对着小白射来。小白大喊一声，口吐鲜血，倒于车上。管仲自以为得计，射死了小白，就高兴地还报鲁侯，与公子纠称庆。但小白并非真死，管仲一箭，只射中小白带钩。小白知管仲妙手，恐他又射，一时急智，咬破舌尖，喷血诈倒。鲍叔牙当即着小白变服，从小路疾驰回齐国都城临淄（齐）。鲍叔牙单车先入城中，说诸大夫迎小白入城即位。这就是齐桓公。

桓公即位，鲁庄公亲自带兵护送公子纠至乾时，遇来迎战之齐兵。齐鲁交战，鲁兵大败。鲍叔牙又带大兵，压鲁境上，向鲁索要公子纠，鲁庄公怕齐，乃杀公子纠，械送管仲入齐。鲍叔牙见管仲，即令破械，迎他入馆。

鲍叔牙劝管仲辅桓公，管仲说：“臣节已亏，何能反而事仇人。”鲍叔牙说：“成大事者，不恤小耻，立大功者，不拘小谅。子有治天下之才，未遇其时。主公志大识高，若得子为辅，以经营齐国，霸业不足道也。功盖天下，名显诸侯，孰与守匹夫之节，行无益之事哉？”鲍叔牙见桓公，力荐管仲。桓公说：“夷吾射寡人中钩，其失尚在。寡人每戚戚于心，得食其肉不厌，况可用乎？”鲍叔牙说：“人臣者各为其主，射钩之时，知有纠不知有君。君若用之，当为君射天下，岂特一人之钩哉。”桓公要拜鲍叔牙为上卿，鲍叔牙说自己“非治国之才”，力荐管仲为相。桓公与管仲谈了三天三夜，句句投机，全不知倦，十分高兴，就斋戒三天，拜管仲为相。管仲又告桓公说：“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桓公于是专任管仲，号为仲父。“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桓公用贤，管仲效力，而霸诸侯。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向》）

齐桓公专任管仲而不疑，可是他自己却为奢淫生活而腐化自身。所以管仲、桓公死后，齐国就发生内乱，诸子争主，霸业不继，很快地被其它国家把霸主地位抢夺过去了。

十 晋文公知义成霸业

春秋五霸是哪五个国家呢？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及宋襄公；另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hé）闾及越王勾践。从上面两种说法看来，前一说法的秦穆公和宋襄公在历史上有人不承认，因为秦穆公只是称霸西戎，宋襄公霸业未成。后一说法下一题再讲。现在只说晋文公。

晋在春秋初年是个不太大的诸侯国，《国语》说晋国是“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澮、浍以为渠”。西有吕梁山，东面、南面有太行山和中条山，《左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干邻”。春秋初，又一直内乱。到公元前678年，武公才结束了分裂状态。武公死，献公立，把原来晋国的一军改为二军以扩大兵力，随后灭掉了周围各小国如狄（今山西河津）、霍（今山西霍县）、魏（今山西芮城）、虢（今河南陕州）、虞（今山西平陆）。晋原有的疆土，只限于今晋南一带，开始扩展到今山西中南部及黄河南岸和黄河以西地区，晋逐渐强大起来。

晋献公宠爱骊姬，害死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外逃。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到过许多诸侯国，大约在公元前638年，重耳十分狼狈地来到楚国，楚成王破格以对待国君的礼节款待这位亡命的晋国公子。一次楚成王在盛大的宴会上对重耳说：“公子要是回到晋国，当了国君，用什么来报答我呢？”重耳恭敬地说：“美女和玉帛等物，君王有的是，珍奇的鸟羽，名贵的象牙犀皮，就产在你的土地上，流到我们晋国来的，不过是君王剩余的部分。我不知拿什么来报答你才好。”楚成王又说：“就象你说的那样，不过总得给我一点报答吧。”重耳想了想说：“若托君王的福，能返回晋国当上国君，有朝一日两国不幸发生战争，我将退避三舍，以报答君王今日的盛情。”（三舍，即九十里。古时军队一日行三十里而住宿，叫一舍。）

公元前637年，重耳在秦国支持下，趁晋惠公死后晋国的混乱，当上国君，就是晋文公。

公元前635年，周襄王被其异母兄弟太叔带，在狄国借兵，夺了王位。周襄王逃奔郑国，向各诸侯国发布命令平乱。列国的均不敢出兵，惟晋文公马上发兵，打败狄人，杀了太叔带，护送襄王回京。襄王为了酬谢文公，把阳樊、温、原和欒（luàn）（今河南济原、武陟一带）赐给晋国。晋国不仅获得了土地，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晋在诸侯中的威望和地位。

这时，楚国势力已伸展到黄河流域，有代替齐桓公称霸中原之势。晋文公看到要树立霸业，首先要打败楚国。他一面积极整顿内政，一面把二军扩充到三军。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四年），楚伐宋，宋告急于晋。第二年，晋楚两国在曹国相遇。以实力而论，楚强晋弱。晋文公为了实践“退避三舍”的诺言，命令军队后撤。晋军中有些将士

愿不通，狐偃解释说：“当初主公在楚王面前说过，两国交兵，晋国情愿‘退避三舍’。今天后退，就是实践我们的诺言。要是我们对楚国失了信，我们就理亏了。如果我们退兵，楚军还步步进逼，那就是他们理亏，那时，我们与他交手，就理直气壮，理直气壮，就能打胜。”晋军一口气真的退了九十里，到了城濮（今山东濮县）。这时，楚军有些将士想停下来，可主将成得臣十分骄傲，步步紧追，并向晋文公下了决战书。大战开始了，晋军仍用虚实就虚的战术，而骄傲的成得臣，把晋军投放在眼里，直追上去，正中晋军埋伏之计。晋军把楚军杀了个七零八落，大败而回。晋文公又下令不要追杀，成得臣带着一些残兵败将退回。走到半路上，得到楚王的谴责，自己也想回去无法交代，自杀了。成得臣骄兵丧命，晋文公知义胜楚，城濮一战而霸诸侯。

晋军打败楚军消息，传到周王处，周襄王亲到践土（今河南原阳县东南）慰劳晋军。各国诸侯在践土会盟，并得到周王策命。这年冬天，晋又会诸侯于温（今河南温县），周王也亲自赴会，晋由此跃升为中原霸主。

文公死后，襄公立，又在穀（今河南灵宝）打败秦国，继续称霸。直到公元前546年，晋国常能维持霸业。不过楚也时时与晋争霸，晋楚大战三次，晋胜两次（前575年鄢陵之战，前557年落阪之战），战败一次（前597年郟之战）。

楚国自城濮之战失败后，比晋国始终处于劣势。直到楚庄王在公元前597年郟（pí，在今河南郑州市东）之战时，才把晋国打败，成了继晋后的又一霸主。

十一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上一题说春秋五霸又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这一题简单说说吴、越情况，重点讲一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事。

吴国和越国是春秋后期在长江下游兴起的两个国家。吴国在今江苏省南部地区，建都姑苏（今江苏吴县），越国在今浙江省一带，建都于会（kuài快）稽（今浙江绍兴东南）。晋国为牵制楚国，就扶持吴国，特别是在军事上支持吴国，攻击楚国，吴楚连年打仗，甚至一年打七次仗。后来楚就扶持越国，攻击吴国，这样，吴越两国，结成仇怨。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在槀（gǎo）李（今浙江嘉兴县南）大败吴兵。阖闾中箭，回到吴国就死了。阖闾临死时，嘱咐儿子夫差说：“不要忘记报越国的仇。”

夫差为了报越国的仇，就让人每天一早起来提醒他说：“夫差！你忘了越王杀父之仇吗？”夫差流泪说：“不，不敢忘！”夫差叫大将伍子胥和大臣伯嚭（pǐ）加紧操练兵马，准备打越国。

公元前494年，夫差为报父仇，起兵伐越，在夫椒（今江苏苏州）大败越兵，乘胜

攻入越都。勾践率领五千将士退到会稽山，派人向吴求和。吴子胥要夫差灭越以除心腹之患，但越国大夫文种给伯嚭行贿，伯嚭在夫差跟前替越王勾践求情。夫差因胜越而骄傲自满，认为越国不足为患，就答应越国求和，但要勾践亲到吴国服役。

吴王夫差一想到中原争霸。公元前485年伐齐。次年，又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今山东莱芜），齐军主帅国书被杀。公元前482年，夫差率大军到黄池（今河南封丘）会诸侯，与晋国争做盟主。不料就在这时，越军攻入吴都，越水师自海道入淮，绝吴军归路。夫差匆忙回国向越求和。由于吴的长期穷兵黩武，民力凋敝不堪，难以和越对抗。终于在公元前473年，越灭掉了吴。

为什么越王勾践能在失败之后，又战胜吴国，终于灭掉吴国呢？这就是尽人皆知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

在夫差战胜勾践，允许勾践求和而撤兵后，勾践带着妻子和谋臣范蠡（即李）到吴国，接受屈辱条件，伺候夫差，从事劳役，终于赢得夫差的欢心和信任。三年后，勾践被释放回国。勾践回国后，唯恐自己贪图眼前安逸，消磨掉报仇雪耻的志气。于是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他每天晚上躺在稻草堆上，枕戈而卧。他还在房内挂一个苦胆，每天看着它，吃饭时先尝尝这苦味。并经常提醒自己说：“不要忘记会稽之耻。”他注意任用贤才，派文种管理政事，范蠡管理军事，大力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减轻刑罚，薄收赋税，训练军队，加强战备。并亲自巡回各地，了解人民生活，慰问人民疾苦。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艰苦奋斗，越国生产发达，人民安乐，全国团结一致，兵强马壮，转弱为强。因之一战而胜。

可是，吴王夫差呢？他不恤民力，“视民如雉”，常年劳师动众，人民不堪其苦。他自己更骄傲淫佚，狂妄自大。并且妒贤害能，听信伯嚭谗言，杀害了忠心耿耿为吴国的吴子胥。吴国貌似强大，实际上日渐衰败，由强变弱，因之一战而败，终被灭亡。

吴国灭亡了，越国土地更大了，国力也更强了。勾践北渡淮水，会齐与晋等诸侯于徐州，使越兵横行于江、淮以东。当时“诸侯毕贺，号称霸主。”

十二 “向戌弭兵”和三家分晋

要讲韩、赵、魏分晋，先说一说“向戌弭（mǐ）兵”。公元前546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是把春秋划分为前后两期的一年。这一年，向来争夺霸权的晋、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兵大会。大会以前，列国形势主要是诸侯兼并，其次是大夫兼并；大会以后，形势变为主要是大夫兼并，其次是诸侯兼并。

宋国大夫向戌同晋国执政赵武、楚国执政屈建都有交谊，所以想谈和两国偃息兵停战。这时晋国六家世卿（赵、范、知、中行、韩、魏）相互之间为争权而剧烈斗争；楚国因受吴国威胁，不敢贸然北进，所以两国都愿意暂时停战，因此两国赞同向戌的倡

导。公元前546年，晋、楚、鲁、宋、蔡、卫、陈、郑、许、曹十国大夫在宋都商丘大会，约定晋、楚两国同作霸主。此后，楚专力对吴，晋专心内争，可各小国呢？却要备两份贡品，向两个霸主朝贡，负担更加重了。但也因南北使臣不断往来，华夏文化对楚发生更大影响，楚逐渐被看作是华夏列国中的成员国，华夏范围在人们思想上扩大到楚吴江南地区。

弭兵大会之后，除了吴、越和楚国之间的争雄战争外，中原范围内基本上没有象从前那样的争战，可是在各国政权结构变化上，却出现了大夫取代诸侯，“政由大夫出”的局面。如齐、鲁、晋各国大夫之间斗争都很剧烈，最后韩、赵、魏三家世卿瓜分了晋国，田氏取代了姜氏齐国。这就是“向成弭兵”所反映的这个历史阶段的形势和其影响。

现在特别讲一讲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历史。因为这三家以后都各自成为一国，并在战国时期有着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晋国的祁氏、羊舌氏、荀氏、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赵氏、魏氏在相互争斗中，先灭掉了祁氏，羊舌氏，又灭了荀氏、范氏、中行氏，只剩下知氏、韩氏、赵氏、魏氏四家，四家中以知氏的势力最大。知氏大夫知伯瑤想侵占其他三家土地，就对韩康子、赵襄子、魏桓子说：“晋本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霸主地位。为使晋公室再度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公室。”虽然这是知伯瑤在借公室的名义掠夺其他三家大夫的土地，可韩、魏两家又不敢惹知伯瑤。所以韩、魏两家把土地和户口让给了知伯瑤，唯有赵襄子坚决不让知伯瑤。

公元前455年，知伯瑤命令韩、魏一起攻打赵氏。赵襄子自知难以抵挡，就带着兵马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知氏等三家围攻晋阳，赵襄子死守晋阳，两年多时间，知氏未能攻下来。知伯瑤察看地形，看到晋阳城东北那条晋水，就想出一个水淹晋阳城的办法，晋水原是绕晋阳城往下流，如果引晋水到西南，就可能水淹晋阳城。于是知伯瑤立即开沟河，使晋水直通到晋阳城下，并在上游筑坝拦水，准备放水淹城。这时正是雨季，水坝蓄水已满，知伯瑤就命令打开水坝，放水淹城。一时晋阳城内大水弥漫，人们都跑上房顶。虽然这样，赵襄子仍不投降。

这时知伯瑤得意洋洋地对韩康子、魏桓子说：“晋阳城眼看就要完了。起先我还以为晋水是晋阳城的护城池，能拦阻敌人，现在才知道这正是我们破晋阳城的好武器啊。”韩、魏两家听了这话，暗暗吃惊。他们知道知伯瑤势力大，自己敌不过他。偏偏魏氏封邑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靠近晋水，韩氏封邑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靠近汾水，想到今天赵氏的处境，两家就都担心起自己明天的命运来。

晋阳城情况越来越危急，赵襄子非常焦急，他忧愁地对门客张孟谈说：“民心固然未变，可水势要再涨，全城就难保了。”张孟谈说：“韩、魏两家割土地给知伯瑤，决非他们甘心情愿，帮助知伯瑤来打我们，也非他们的本意，我去说服他们掉转枪头，共同对知伯瑤。”张孟谈夜间偷偷出城，先找到韩康子，又找到魏桓子，陈说利害，约他们一起攻打知伯瑤。韩、魏两家这时正在担心自己将来命运，一听张孟谈的话，自然都

同意了。

第二天夜里，韩、魏、赵三家把水头拦住，使水又转向知伯瑀营地冲去。三更之后，知伯瑀正在营里安睡大觉，忽然杀声震天，连忙从床上起来，只见衣服被子全湿了，定睛一看，军营里大水汪洋一片。连忙指挥士兵抢修堤坝，谁知堤坝尚未抢修，只见四面八方敌兵杀来，韩、赵、魏三家联兵，驾着小船、木筏，在隆隆战鼓声中，冲杀过来。知家兵士，一时措手不及，不是被砍死就是被淹死，全军复没。知伯瑀本人也被俘杀死。

韩、赵、魏三家一举灭亡知家，首先把知家侵夺韩、魏两家的土地归还给韩、魏两家，接着又把知家的土地由三家平分。以后又把晋国其他土地瓜分了，这就是三家分晋。

当时周王室虽仅存空名，但总还是天子。要正式做诸侯，总还要周天子封，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派使者去洛邑朝见周威烈王，要求周王正式封他们为诸侯。仅有空名的周王不承认也没用，就只好正式封三家为诸侯。从此韩、赵、魏三家都成为中原大国，加上秦、齐、楚、燕四国，历史上称为“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即以韩、赵、魏三家分晋开始。

十三 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随着封建领主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的转化，上层建筑也势必要改革，这在当时称为“变法”。各国中变法最早的是魏国。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在位）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弟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任用李悝（kui）为相，还有吴起、西门豹等人。这些出身于小贵族的士参与政治，标志着世族政治为官僚政治所替代。李悝在魏实行变法，“国以富强”，当时魏在七国中最强。

楚悼王时，魏吴起奔楚，楚悼王用吴起进行变法；齐威王时，奖励即墨大夫试行变法，用邹忌为相，行君主集权和法治，到威王末年，“齐最强于诸侯”，韩昭侯时，用申不害为相，史称“修术行道，国内以治”。

变法时间较晚但比较彻底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商鞅（？～公元前338年）姓公孙氏，故名公孙鞅，卫国人，故又名卫鞅，被秦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所以都叫他商鞅。商鞅原在魏相公孙痤（cuò）门下做小官，他学习了李悝的《法经》和变法经验，后听说秦孝公打算实行改革，正在招纳变法人材，就到了秦国。

商鞅见了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与孝公谈得很投机。但商鞅的变法主张遭到一些贵族和大臣们的竭力反对。后来秦孝公，就要不要变法问题，让商鞅同甘龙、杜挚等人展开激烈的争论。甘龙、杜挚坚持“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理论。就是说，效法古代不会有过错，遵循旧礼不会有差错。商鞅以汤、武“不修古而兴”、桀、纣“不易礼而亡”等历史事实，痛

斥了他们复古倒退的谬论。商鞅对传说中的古代原始氏族社会和殷、周不同的上层建筑作了比较，指出历史是进步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这就是说，治理国家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仿效古代。这就在理论上为变法奠定了基础。秦孝公就封商鞅为左庶长，负责主持变法的事。

在实施变法前，商鞅怕人民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去做，就叫人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把这根大木头扛到北门，就赏谁十两金子。”人们围在南门口，看着这根木头，又奇怪，又发笑，大家纷纷议论说：“这根木头谁都能扛到北门，哪儿用得着出十两金子。”谁也觉着这是笑话，不肯去扛。正在大家议论纷纷时，出来一个人说：“我试一试”，他边说边就扛起木头，一直走向北门。商鞅立刻派人在北门上等着这个扛木头的人，马上如数给了他赏金，向人民宣布变法命令是一定要实现的。

接着，商鞅就在公元前359和前350年两次颁布了变法令。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废井田，开阡陌。掘开原作为井田疆界的阡陌，废除井田制度，国家承认田地归私人所有，准许土地自由买卖。

（二）、奖励军功。废除贵族一出生就享受爵禄，长大就当官的特权。按军功授爵，军功越大，授给的爵位越高，赐给的田宅越多。贵族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

（三）、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织。把国家掌握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编制户籍，不许私自迁徙。按土地征收赋税，按人口征发劳役、兵役和人头税。有成年男子两人以上的人家，必须分立门户，否则，加倍交纳租税。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人，免除徭役。限制工商业者活动，禁止弃农从商。

（四）、建立封制集权制。在全国设置三十一个县，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人民每五家编成一“伍”，每十家编成一“什”，由国家统一控制。

新法一颁布，有很多人说不法不好。后来太子驷也触犯了新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是由于“自上犯之”，应首先惩治破坏新法的贵族。可是太子是国君继承人，怎样惩罚呢？商鞅认为太子犯法，是由于老师教导不严的原因，所以当惩罚太子的老师。于是商鞅立即把太子驷的两个老师公孙贾和公子虔一个处了黥刑，另一个处了劓刑。这样，新法才大刀阔斧的推行下去。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继位，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就造谣说商鞅谋反，惠王下令逮捕商鞅，把商鞅车裂——五马分尸而死。商鞅死了，可是他制定的新法在秦国继续得到了贯彻实行，因此，秦国终于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

十四 合纵、连横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历史上的说法也不完全相同，这里仅就一般的说法，大体上讲一讲。

战国时，七雄并立，哪个国家也想兼并其他六国，统一天下。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国力日强，最有力量统一天下。东方六国为了对付秦国，实行联盟，由于他们在地理位置上是从南到北的纵向连盟，所以称为“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秦国为破坏“合纵”，分别拉拢一国或几国结成连盟，由于在地理位置上是从西向东的横向连盟，所以称为“连横”，实为“事一强以攻众弱”。“合纵、连横”即当时兼并战争中的外交策略。

前面说过，战国初魏国最强，公元前354年，魏军包围赵都城邯郸，齐国派田忌率军救赵，用大军事家孙臏“围魏救赵”策略，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击败魏军。公元前343年，魏攻韩，齐国又派田忌、孙臏救韩，前341年，在马陵（今山东濮陵）齐又大败魏兵，魏损失十多万兵，主将太子申、庞涓都战死。魏又在西河屡败于秦，失去少梁（今陕西韩城）和安邑（今山西运城市）一带，河西屏障开始被秦突破。马陵失败之次年，商鞅又率兵伐魏，虏魏将公子卬（*ang*昂）。魏一再战败，已不能称霸于天下，国力也日渐衰弱。

秦在商鞅变法后，国势蒸蒸日上，不断向东袭击魏国。公元前333年，又败魏，次年魏割阴晋（今陕西华阴）与秦。次年秦又大败魏兵，虏魏将龙贾，次年魏又纳河西地与秦。次年，秦又取魏汾阴（今山西荣河）、皮氏（今山西河津），并攻下了焦（今河南陕县）。魏不得已，只得又割上郡十五县向秦求和。从此魏失去了在河西的全部领土及河东大部。

东方六国，见秦有虎狼之心，都存有戒心。公元前334年，苏秦到了燕国，以合纵的利益向燕王陈说，燕文侯送他车马金帛，去各国游说，苏秦首先到了赵国，赵肃侯亲自到郊外迎接了苏秦。苏秦对赵肃侯说：“我仔细研究过：中原列国土地比秦国要大五倍，军队比秦国要多十倍，为什么各国却要用自己的土地去奉献给秦国呢？如果大王用我的计策，约会诸侯，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五国一同抵抗。这样，秦国孤立了，就再不能欺负六国了。”赵肃侯听了非常高兴，立即给他一百辆车马，一千斤金子，一百双玉璧，一千匹绸缎，请他去联络其他各国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诸侯，都同意他的合纵策略。公元前333年，六国诸侯在赵国的祖（*hu*胡）水（今河南北部）开会，正式订立了合纵盟约。赵王做纵长，苏秦一人佩六国相印。

苏秦合纵的规约是：秦攻楚——齐、魏出兵援救，韩、秦粮道，燕、赵做声援。秦攻韩、魏——楚攻秦军后路，齐出兵助楚，燕、赵作声援。秦攻齐——楚攻秦军后路，韩

守成皋，魏阻秦道路，燕出兵救齐，赵作声援。秦攻燕——赵守常山（河北正定县），楚屯武关（陕西商县东），齐渡渤海援燕，韩、魏出兵援救。秦攻赵——韩守宣阳，楚屯武关，魏屯黄河南岸，齐渡清河，燕出兵援赵。虽然规约很具体，可是六国之间存在矛盾，都还想从中为自己占些便宜，所以纵约极不稳固，苏秦的合纵前后只有三年便解散了。

秦国用谋臣张仪的连横策略，击破六国。秦惠文王听从张仪的计谋，首先把从魏国掠取的城邑退回给魏国几个，又把女儿许配给燕太子。魏、燕贪图眼前利益，就和秦国交好了。没有多久，齐国被燕国打败，齐襄王怀疑苏秦在齐为燕搞活动，就用车裂之刑处死苏秦，六国合纵也就拆散了。六国之间争斗，给秦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当时，六国中以齐、楚两国大，并且结成联盟。张仪认为要实行连横策略，首要拆散齐、楚联盟，于是他就向秦惠王请示去了楚国。张仪到了楚国，用重礼买通了楚怀王的宠臣靳尚，然后去见怀王。表明秦王派我来就是要向楚国交好，但要秦、楚交好，就得先与齐断交。只要楚国与齐国断交，秦国情愿把商於（wāng。今河南淅川县西南）之地六百里献给楚国。楚怀王这个糊涂虫就信了张仪的话，真的与齐国绝交了，并派人去秦国接收商於之地。楚国使臣到了秦国，张仪却拒不承认这回事，他说：“大概是你们大王听错了，秦王怎么能轻易地把国土送给人呢？我说的是我自己的六里封地，不是秦国的六百里领土。”楚王气急了，当即发兵打秦，但此时齐国也来和楚争战，楚受到两面夹攻，一败涂地。楚没有拿到秦的商於之地六百里，反而把汉中土地六百里被秦夺走了。

张仪就是这样，连骗带欺，先后又到齐、赵、燕各国，说服他们与秦交好。秦昭王时，范雎为相，又定“远交近攻”政策，连横愈益得势，合纵愈不易成。但秦仍怕山东各国合纵，直到战国末年，胜败已定，还是在怕合纵，所以始终坚持连横策略，用山东策士为相，执行这个国策。秦终于在上一策略下，不断取得胜利。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十七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山东六国全部灭亡，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

十五 中国的第一个皇帝

在秦以前，我们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天子”、“王”，不叫“皇帝”。秦嬴政统一全国后，丞相王绾（wāng宛）、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说：“陛下功盖三皇五帝，不能再称‘王’了，应有个最尊贵的称号才是。三皇五帝数秦皇最尊，陛下称秦皇最恰当。”嬴政略一思考说：“既然我功盖三皇五帝，就应取‘皇帝’二字以概括之，就称‘皇帝’好了。我是始皇帝，我的子孙继位为皇帝，就依次序称为二世、三世，直

至千万世。”真是雄心上盖千古，下压万世，唯朕一人。“朕”，在秦始皇以前，是每一个人都可用的自称之词，如今日所说“我”；自秦始皇起，只有皇帝才能称“朕”，别人就不行了。“皇帝”、“朕”，不仅仅是个名词问题，它象征着专制主义的加强。

全国统一了，该怎样治理这个大国呢？丞相王绾提出：“六国刚刚破灭，特别燕、齐、楚离京城咸阳很远，应分封王子到那里去，以加强统治。”廷尉李斯立刻反对王绾分封意见。并举周时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相互兼并为例，建议“在全国设置郡县”。秦始皇采纳了李斯意见，决定废除分封的办法，改行郡县制。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郡以下设县，郡、县的长官都由中央直接任命。在中央，事无大小，都得由皇帝说了算，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据说秦始皇每天要看一百二十斤的奏章（那时奏章都是刻在竹简上），看不完不休息。这一切都说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正式形成了。

既然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就还得要有一些统一的有力措施才行。秦始皇的统一措施主要有：（一）战国时期各国度量衡不一样，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使长度、容量、重量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二）他又造元形方孔钱，统一货币，通行全国。（三）统一全国文字，把简化了的字体小篆（zhua*传）作为标准字体。接着又出现了一种比小篆还简便的隶书。现在的楷书，就是从隶书演化来的。（四）实行“车同轨”，就是车轴上两轮距离，一律都定为六尺。并修驰道，规定大路路面一律宽五十步（每步六尺），从京城咸阳到全国各重要地方都修有驰道。秦始皇的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加强全国统一，有利于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这应当说是秦始皇的历史功绩。

（附：秦统一文字图表）



当时秦朝的北方，有一个游牧民族，称为匈奴。战国后期，匈奴的贵族就常常趁北方燕国、赵国衰落的时候，向南侵犯，把黄河河套一带的大片土地夺了过去。秦统一六国

后，就派大将蒙恬（tiān 甜）带领三十万大军去抵抗，收复了河套一带地区，设置了四十四个县。为了防御匈奴侵犯，秦始皇又征用民伕，在原来燕、赵、秦三国为防止匈奴侵犯而各自在本国北方所修筑的城墙的基础上改建，修起一条万里长城——从西面的临洮（今甘肃岷县）到东面的辽东（今辽宁辽阳西北）。

后来，秦始皇又派五十万大军，平定了南方，添了三个郡，蒙恬又打败匈奴，添了一个郡。这样，全国就有四十个郡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宴会，大臣们都颂扬秦始皇的功绩。可是有个博士淳于越又提出废除分封建制不应当。这时候，李斯已经做了丞相，李斯就说：“现在天下安定，法令统一，但有些读书人不师今而师古，妄议国家大事，制造混乱。如不严禁，一定要降低皇上威信。”秦始皇立刻下令：除秦国的历史和医药、种树、法令等书籍外，私有的《诗》、《书》及百家言论集等一切书籍都要全部交出烧掉，谁再谈论这类书就要办谁的罪，谁要拿古论今，就要将谁满门抄斩。

当时，有两个叫卢生、侯生的方士背后议论秦始皇。秦始皇知道了，派人去抓他们，他们早已逃跑。秦始皇大怒，又发现咸阳有些儒生议论他，秦始皇就抓来儒生审问。儒生经不起拷打，又供出一大批人来。秦始皇就把这些儒生共四百六十多个人统统活埋了。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焚书坑儒”。按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做得太残暴了。毁灭了文化，杀害了知识分子，从此之后，有学问的人减少了，幸存者也不敢说话了，只有那些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奸贼如赵高之流，成了秦始皇身边的重要人物。

现在再补充讲一个问题。秦本是西方一个小国，平王东迁时，始封秦君襄公为诸侯。可是东方大国没有统一中国，而秦这样一个原来的小国却统一了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秦能用人才，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李斯在公元前237年写的上秦始皇《谏逐客书》，在这方面说得很清楚。他说：“从前（秦）缪公求士，在戎得到了由余，在宛得到了百里奚，在宋迎来了蹇叔，在晋求得丕豹、公孙支。这五人，都不是秦国人，而缪公用了他们，并国二十，遂称霸西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移风易俗，民富国强，百姓愿为君王所用，诸侯亲服，打败了楚、魏的军队，攻占了土地千里。惠王用张仪的计谋，占领了三川、巴、蜀、上郡、汉中的土地，并吞了九夷，控制了郢、郢，东面据有成皋险要的土地，割取了肥沃的土壤，遂瓦解了六国的合纵，使他们侍奉秦国，功业一直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免去穰侯的相国职务，把他与华旧君一并赶出关，增强和巩固了王室的权力，限制了私室的权力，因而能以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这四个君王，都靠着外籍人的功劳而使秦强大起来……如果这四个君王拒绝外地有才能的人而不用，这样秦国一定不会富裕、强大的啊。”李斯对秦国敢用人才的传统作法的总结，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可是忆过去，看今天，秦始皇一反从前的传统作法，贤才不会为他效力了，阿谀奉承的小人，欺上瞒下的奸贼包围了他。得贤才者昌盛，失贤才者败亡，秦的前景可以想见了。

十六 秦朝的暴政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

上面说的秦始皇征民夫修长城，本来不是件坏事，可是由于秦始皇对人民压迫很重，法规苛严，劳役繁多，致使民夫死于工地者甚多，所以有“孟姜女寻夫哭长城”的传说，不论其真实性如何，却反映了人民对秦始皇的怨恨。秦始皇为了自己的享受，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建阿房宫，修骊山墓，工程浩大，征用民夫七十多万。人民的生活，被秦始皇这种图谋个人奢侈享乐，荒唐淫逸的行为害得好苦。可是秦朝法律又十分严酷，人民对他的残暴统治，不敢公开议论，只有在暗地里酝酿着反抗斗争。再加上秦灭六国之后，虽然秦始皇把六国的兵器都收集到咸阳，铸成了十二个金人，以此来防止六国贵族的反抗。但他这种以力压服的办法并不能征服人心，如公元前218年春天，他外出巡视到博浪沙时（在今河南原阳县），就在他的车后飞来一个大铁椎，把秦始皇座车后面的副车打得粉碎。这个铁锤就是韩国贵族张良为报仇而进行的一次谋杀秦始皇的行动。

秦始皇为了炫耀自己而到处巡视，以宣扬其所谓圣德。公元前210年，他又到浙江、江西、江苏、湖南以至南海巡视，然后取道山东返回。在山东他就病了，到了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后就病危了。于是他急忙命赵高代笔写信给太子扶苏返京（时扶苏在蒙恬军中），让扶苏来主办丧事，继承皇位。不久秦始皇在沙丘去世，丞相李斯怕皇帝死在外面，太子一下子又回不来，诸公子争夺天下，老百姓乘机造反，就保密不发丧，把车子捂得严严的，急急赶回咸阳。可是赵高并没有把秦始皇召太子的遗诏发出，赵高是秦始皇小儿子胡亥的老师，又与蒙恬有冤仇，就偷偷地与胡亥计议篡夺皇位，并哄吓丞相李斯，让李斯同意他们篡夺皇位的阴谋。这样，胡亥、赵高、李斯三人先将秦始皇遗诏烧毁，又写了一份令太子扶苏、大将蒙恬自杀的假遗诏送往长城蒙恬军中。扶苏见信，哭了一场就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被赵高派去使者抓起来，关进监狱弄死了。胡亥回到咸阳，即皇帝位，这就是秦二世。

沙丘政变，赵高篡权，秦二世胡亥，谋杀自己哥哥、姐姐和诸大臣。胡亥更是荒淫无道，从各地征二三百万囚犯和民夫，大规模继续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骊山墓开得又大又深，并把大量的铜熔化了灌于地下以铸地基，上面又盖了石室、挖了墓道和墓穴，坟里挖成江河湖海样子，灌上水银，葬秦始皇于墓内。为了防人盗墓，还在墓穴里装上杀人设备，最后竟残忍无人道地把所有造坟工匠全部活埋在墓道里，不让一人出来。不仅如此，胡亥更制定了比秦始皇还残酷的刑罚，人民动不动就要触犯法律，动不动就要被杀头或请门抄斩，剥削日益加重，凡是对百姓逼租税越多的官和杀人越多的官，就越被胡亥认为是忠臣。人民在水深火热的生活里受尽折磨，可又敢怒而不敢言。

以后，赵高为了自己的目的又设计杀害了丞相李斯，自己当了丞相，窃取了朝政大权。他还生怕大臣不服，一天，他牵一只鹿到朝堂上，指着鹿对二世说：“我给陛下牵来一匹好马。”二世一看，笑着对赵高说：“丞相真会开玩笑，这明明是只鹿。”赵高辩白说这不是鹿就是马，并问众大臣是鹿？是马？有的大臣直喊“是马”，有些正直又大胆的人则说“是鹿”。赵高记下敢于说“是鹿”的人，没过几天，就假借罪名杀害了他们。赵高“指鹿为马”的目的，当然是要钳制二世，压制大臣。

人民在秦的暴政下实在没法生活下去。公元前209年七月，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的地方官派了两个军官，押着九百名民夫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去防守边戍。这伙戍卒中有两个屯长就是陈胜和吴广。这伙戍卒到了蕲（qí）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西南），遇上大雨，道路被冲毁，他们只得停下来。这样，就无法按期赶到渔阳。按照秦法，误期者处死。陈胜、吴广想：去渔阳吧，死；逃跑吧，被抓住，也是死，起来反抗吧，最多也不过是死。该怎样办呢？在这种走头无路的情况下，陈胜吴广就决定起义。陈胜慷慨激昂地说：“那些做王侯将相的，难道非要世代相传吗？”九百戍卒，在陈胜、吴广领导下，杀了带队的官员，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个个袒露右肩，宣誓共同战斗，推翻暴秦统治。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就在大泽乡点燃了。起义军人人奋勇杀敌，占了大泽乡，攻克蕲县和附近几个县城。农民军纷纷前来参加起义军。不到一个月，起义军就拥有兵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人，步兵几万人。起义军又乘胜攻占了陈县（今河南省淮阴县），陈胜在陈县召集父老，大家说：“将军替天下老百姓征伐暴秦，这样大的功劳，应该称王。”陈胜就被拥戴称了王，国号叫“张楚”。

陈胜称王之后，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原来六国的后代，也起兵为恢复六国而参加了反秦斗争。

陈胜派周文带兵去攻打咸阳，周文作战很勇敢，可是起义军是临时组织起来的，缺乏训练，被秦将章邯打败，周文被迫自杀。吴广率军去进攻蒙（Xīng 刑）阳，其部下田臧与吴广意见不合，竟假借陈胜命令杀害了吴广。田臧派人继续围攻蒙阳，他自己去迎击章邯，战败身死。章邯战败了周文、田臧，又围攻陈县，陈胜向东南退却，退到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被他的车夫庄贾（zhuāng jiǎ）杀死。庄贾背叛革命，投降秦军。起义军将领吕臣攻入陈县，捉住叛徒庄贾，杀死了他。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虽然失败了，但由他们点燃的革命烈火，却越烧越旺，最后终于埋葬了秦王朝。

秦行暴政，激起农民革命，结果秦始皇本想传位于子孙万代，没想到只有15年的时间，就在二世上灭亡了。

十七 楚 汉 相 争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点燃了革命烈火，农民起义风暴席卷大半个中国。在各地起义

军中，有一支是由原来楚国大将项燕的儿子项梁领导的队伍。项梁在会稽起义，渡过淮河后到了江苏。还有一支是沛县人刘邦领导的，刘邦原来曾从丰乡（今江苏丰县）带着一百多队伍来投靠项梁。项梁又听了谋士范增的意见，把留落在民间的楚王后代找了来，立为楚王，也叫楚怀王。

项梁打了几个胜仗，还打败了秦大将章邯。项羽（项梁侄儿）和刘帮带领另一支队伍，杀了秦将李由。这时项梁就骄傲起来，防备松弛，章邯趁机偷袭定陶楚军，项梁战死。项羽、刘帮、吕臣等只好后撤到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一带，采取守势。

章邯又移兵攻赵，很快攻下赵都城邯郸，包围了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楚怀王应赵王歇的请求，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带兵救赵。宋义进兵到安阳（今山东省曹县东），按兵不动。项羽建议他进兵，还受到申斥，项羽大怒，一天早上，他冲进宋义营帐，一剑砍死宋义。然后自己做了假上将军，紧接着又请示楚王封他做了上将军。他就带兵杀向巨鹿。

楚军渡过漳河，项羽命令士兵准备好三天的干粮，叫大家把渡河用的船全部凿沉水底，把做饭用的锅全部砸碎。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破釜沉舟”，项羽以此来表示有进无退，誓死取胜的决心。

当时援救赵国的各国军队虽然很多，但都畏惧章邯，不敢出兵交锋。项羽一到战场，就出动兵马，楚军个个奋勇，人人争先，以一当十，与秦兵大战九次，九战九胜。各援救赵国的部队，人人胆战，个个佩服，从此各诸侯国都尊项羽为上将军，统属项羽统率。章邯向咸阳讨教兵，赵高正忙着篡权，避而不见。赵王谋臣陈余看到章邯狼狽相，就乘机劝他投降。

再说刘邦，他在项羽北上救赵时，奉楚怀王命率了一支部队去西攻咸阳，楚怀王还和诸将约定：谁先打进咸阳，平定关中，就封谁在关中做王。

刘邦军队打到高阳，有个读书人叫郦食其（lì yì jī 利亦基）来见他，建议刘邦去打陈留。刘邦采纳了这个意见，攻下陈留，得到许多粮食，解决了军粮问题。接着刘邦又打到南阳郡，用计引诱南阳郡守投降，刘邦封他做了假侯。从此，刘邦所到之处，秦军纷纷投降，刘邦很快打到咸阳。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八月，刘邦进到武关，赵高杀二世，派人来接洽投降事，条件是让赵高做关中王。刘邦没答应，赵高也被秦王子婴杀死。十月，刘邦打到咸阳霸上，秦王子婴乘着素车白马，带着玉玺，在脖子上套上罪绳，亲到霸上投降刘邦。刘邦进入咸阳，封闭府库，召集父老到霸上，宣布废除秦朝所有严刑峻法，向大家约法三章：第一，杀人的偿命；第二，打伤人的要判罪；第三，偷盗的要判罪。一下子就获得了民心。

项羽听说刘邦已经进入咸阳，把肺都气炸了。他立即率领部队直奔函谷关，打到新丰鸿门，离刘邦驻地霸上只有四十里。项羽得到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告密说：“刘邦想在关中称王，准备拜秦王子婴为相，把秦皇宫的珍宝全部占为己有。”项羽更火上加油，项羽的谋士亚父范增又说：“夺大王天下的定是刘邦，应趁早下手除掉他。”项羽这时有四十万人，刘邦只有十万人，项羽决定第二天就派兵去打刘邦。

项羽的决定，惊动了他小叔父项伯。项伯和刘邦的谋士张良相好，为了救张良，项伯就连夜跑去刘军营通知张良，叫张良和自己一块走。张良却不肯，就把情况又转告了刘邦。刘邦也吓坏了，就邀请项伯，低声下气地向项伯辩白，并把自己的女儿许给项伯的儿子，两人结为亲家，请项伯向项羽说情。没有政治头脑的项伯竟一口答应，并嘱咐刘邦第二天到项羽营中谢罪。

第二天刘邦赶到鸿门，甜言蜜语，低声下气地向项羽谢罪，并说有小人从中挑拨。项羽本是个直性人，又把刘邦没放在眼里，就毫不在意地说：“这都是你那里的曹无伤派人来说的。”项羽就在鸿门设宴，表示和好。可范增是个有智谋，有远见的人，他决心要杀死刘邦，以除后患。酒席宴上多次举起自己身上佩带的玉玦（jué），向项羽暗示快下决心，杀死刘邦。项羽不理。范增急了，就把项羽堂弟项庄找来，吩咐他说：“项王仁慈，不能下狠心杀死刘邦，你借敬酒，舞剑助兴，趁机杀死刘邦。否则，你们都要落到刘邦手里。”项庄进帐敬酒，舞剑，寒光闪闪，意在沛公。项伯见事不妙，竟也拔剑起舞，以身护着刘邦。张良见事情危急，连忙出帐召来刘邦的名将樊哙。樊哙立刻带上宝剑和盾牌闯进帐内，进帐时卫兵拦挡，樊哙毫不理会，撞倒了卫兵。项羽冷不防进来这样一个武士，赶快按剑而问：“你是干什么的？”张良毫不在乎地说：“他是沛公的车夫樊哙。”项羽打量了他一番，赞叹地说：“好一个壮士！赏他一杯酒，一只猪蹄。”樊哙一饮而尽，用宝剑割猪蹄吃。樊哙饮罢酒，气愤愤地说：“当初，怀王跟将士们约定，先进关者为王。现在沛公进了关，并没称王。他封府库，关宫室，把军队驻到霸上，等待将军。如此劳苦功高，没有赏赐，反想杀害。这是秦王的老路啊！”项羽听了，竟没有什么答话，只是说“坐吧！”过了一会，刘邦起来上厕所，就借机从小道逃回霸上去了。

项羽进了咸阳，杀了秦王子婴和秦国贵族八百多人，下令烧毁阿房宫。人们带着仇恨的心理，放起火来，熊熊大火，一直烧了三个月，阿房宫化成一堆瓦砾。

项羽改楚怀王为义帝，把六国旧贵族和有功将领一共封了十八个王，他自己称楚霸王，封刘邦在偏远的巴蜀和汉中，称为汉王。刘邦分析力量，知道自己抗不过项羽，只好带着人马到封地南郑（今陕西汉中）去。

刘邦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韩信建议刘邦放手任用勇敢善战的人，努力争取民心。在关中的雍王章邯、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是人民所痛恨的秦朝三个降将，应先向他们开刀，再东向与项羽争锋。刘邦在公元前206年八月，出兵攻打关中，不到三个月，打败了关中三王，并趁项羽去平定齐国旧贵族叛乱的机会，向东进军，于公元前205年夏，占领了霸王都城彭城。项羽赶快亲率三万精兵，回救彭城。项羽果然英勇善战，刘邦大败，连父亲太公、妻子吕后也都做了俘虏。刘邦自己带几十名骑兵，逃到蒙阳、成皋（今河南巩县东）。项羽围攻蒙阳，刘邦求和，范增建议项羽不允和，刘邦用反间计挑拨项羽与范增的关系。范增一怒之下，请假回家，在路上得了病，背上长了个毒疮，没过几天就死了。范增死了，项羽就没有出主意的能人辅佐他了。

两军对战，互有胜败。公元202年十二月，韩信在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设

下十面埋伏，把项羽重重包围。为了动摇楚军心，张良把会唱楚歌的人找来，教各营士兵大唱楚歌。晚上，霸王听到四面楚歌，他惊骇地说：“难道刘邦已把西楚全部打下来了吗？”项王心里难受极了，情不自禁地唱出一曲悲凉的歌声：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是随侍在霸王身边为霸王最心爱的美人。她见霸王歌曲曲呼叫着自已，劝霸王不要把她放在心上，赶快突围要紧。霸王拉着虞姬，眼泪簌簌地掉了下来，左右的人也低头哭泣。虞姬是个烈性女人，她为使霸王安心突围，趁霸王转身的时刻，抽出宝剑自杀而死。霸王见虞姬已死，带着八百江东子弟兵，连夜突围。

霸王边走边战，突围、斩将、砍旗，仍不失万人敌之勇。但终因众寡不敌，及突出重围，只剩下二十六人迫随着他。霸王来到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北乌江浦），乌江亭长划着一只小船在那里。亭长对霸王说：“江东地方虽小，还有千里土地，几十万人口，还可以在那里称王。”霸王看了看，苦笑了一下说：“我在会稽起兵，带八千子弟渡江，到今天没能回去一人，即使江东父老同情我，立我为王，我还有何脸面见江东父老。”他把自己的坐骑乌骓马送给了亭长，叫士兵也下马，与汉兵肉搏起来。他们杀了许多汉兵，项羽也受了十几处创伤。最后，在乌江边自刎而死。

在反秦战争中不可一世的霸王，在四面楚歌声中倒下去了。

在反秦战争中灭掉秦朝，又战胜霸王的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刘邦就是汉高祖。

十八 七 国 之 乱

刘邦的一些部下在灭秦及同项羽争夺天下的战争中，立过大功，因此刘邦在称帝以后封了一些功臣为王。但这些诸侯王各据一块土地，势力大，兵力强，所以汉高祖刘邦对这些称王的功臣，尤其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这几个功劳最大的功臣确实很不放心，时刻想除掉这些人。于是汉高祖就采用了谋臣陈平的计策，假装巡视云梦泽，命令韩信到陈地相见。韩信到了陈地，汉高祖就以谋反的罪名，把他捆绑了起来，从宽处分，降为淮阴侯。过了几年，陈稀（Xi希）造反，汉高祖去讨伐陈稀。这时有人向吕后告发说韩信和陈稀同谋。吕后和萧何又设计引诱韩信进宫，让预先埋伏好的武士把韩信拿住后杀了。韩信被杀三月，汉高祖回到洛阳，又有人告发彭越谋反，于是就又把彭越下了监狱。后来罚做平民，迁送到蜀。在路上彭越碰上吕后，彭越便向吕后哭诉冤枉，吕后就又带着彭越回到洛阳。吕后向汉高祖说：“应当处死彭越，免得以后麻烦。”就这样地处死了彭越。英布看见韩信、彭越已死，估计厄运该轮到自已身上了，就干脆造起反来。汉高祖打败英布，英布逃跑，半路上被人杀死。

汉高祖在铲除异姓王的过程中，又分封刘姓子弟为王，称为同姓王。起初只有九个，后来逐渐增加，到汉文帝时增加到二十二个，其中最大的有齐、楚、吴、荆、燕、

淮南。这些王国所领有的土地，合起来占了西汉帝国土地的大半，皇帝直接统辖的地区，只有十五个郡，而且这十五个郡中还有列侯和公主的领地，真正属于皇帝的只有十个郡左右。

刘邦总认为同姓王都是刘家子弟，不仅不会反叛中央，且能为中央的藩篱。可事实并非如此。在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和六年（公元前174年）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就曾发动过叛乱，不过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汉景帝时，吴王刘濞（b1卑）骄横得很，刘濞是刘邦的侄子，二十岁时便被封为吴王，掌管东南三郡五十三城，自然资源丰富。他采铜铸钱，煮水制盐，蓄积财富。并招降纳叛，扩张势力。为争取民心，他免除自己封国内的赋税。景帝做太子时，与刘濞的儿子因席博吵架相打起来，失手打死了刘濞的儿子。以后刘濞再不去京城朝拜皇帝，并积极准备谋反。

还是在汉文帝时，一个叫贾谊的大臣就看到诸侯王对中央集权制和国家统一的危害性，并主张分割诸侯王国，以削弱他们力量。景帝时，大臣晁错（chao错）错建议削夺王国领土。他对汉景帝说：“吴王因儿子被打死，假装有病不来朝拜天子，这种狂妄的行为，是应当杀头的。现在他不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应趁早削夺他的领地。”景帝说：“削他的领地，他起来造反，该怎么办？”晁错说：“削他的领地，他要造反，不削夺他的领地，他也要造反。削他的地，他早一点反，危害小一点；不削他的地，他迟一点反，准备得更充足些，危害更大些。”景帝认为有道理，就开始实行削弱诸侯王领地和权力的措施。先削了楚国一个郡、赵国一个郡和胶西国的六个县。接下来，就要削吴国的封地了。

晁错父亲急急忙忙从家乡颍川（今河南禹县）跑来，阻止晁错这一削王侯封地的政策。晁错说：“削地是为了国家安全，天下太平，顾不得个人安危。”他父亲叹了口气说：“这样办，刘家天下安定了，我晁家可危险了，我不愿看到大祸临头。”这老人回到家乡就服毒自杀了。

吴王刘濞看到三个王国封地已被削小，估计到要轮到自已了，就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联合楚王戊、胶西王卬（ang昂）、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zi咨）川王贤、胶东王雄渠，一起出兵，于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发动叛乱。这就是“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起兵的名义是“清君侧”，要求杀掉汉景帝身边的主张削弱王国的晁错。朝廷上几个妒忌晁错的人也劝说景帝杀晁错以安抚叛兵，景帝为保住皇位，也就批准了杀死晁错的奏章。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维护汉王室天下，维护统一的晁错，竟被腰斩了。

晁错死了，“清君侧”的兵马并不因君侧之清而退兵。汉景帝才知道错杀晁错，就立刻督促周亚夫进兵平乱。周亚夫出奇兵直奔洛阳，截断了吴、楚等国联军的粮道。叛军粮食供应发生困难，士兵饥饿，纷纷逃散。周亚夫乘机猛烈进攻，把叛军打得大败。楚王戊自杀，吴王濞逃到丹徒（今江苏省丹徒县），想联合东越兵卷土重来，可是东越人乘机杀死了他，把首级送给周亚夫。不到三个月，吴、楚等七国之乱平定了。

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只能在自己的封国里征收租税，不许干预地方行政，权力大大削弱。到了汉武帝时，又实施“推恩法”，彻底解决了地方割据问题，汉朝的中央政权巩固了。

十九 西汉对匈奴的和亲与战争

匈奴，殷、周时就兴起在我国北方，秦、汉时期强盛起来。公元前201年，匈奴单（chan）于冒顿（mò dù）墨毒）进攻山西中部。次年，汉高祖刘邦率军迎击，曾被匈奴围困在白登（今山西阳高县境）。围了七天，刘邦派人向单于阏氏（yānzhī 嫪之）送了厚礼，才得突围。史称“白登之围”。以后，匈奴常常侵袭边境，掠夺人畜，大臣娄敬向高祖建议与匈奴结“和亲”，把公主嫁给冒顿单于。高祖采取了娄敬的建议，就派娄敬到匈奴去说亲，冒顿同意了。汉高祖就挑了一个后宫宫女所生的女儿，当做大公主，送到匈奴去，冒顿立她为阏氏。文帝、景帝时，继续与匈奴“和亲”，对匈奴忍让，想借以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但匈奴越发骄横了，仍不断入侵边郡，抢掠人口牲畜，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南侵，游骑迫近长安。据统计边境各郡每年被匈奴杀害和掠夺的人口在一万以上，西汉完全处被动挨打的地位。

西汉经过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六十多年，采取与民休息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强盛。但强盛的汉朝却常常受到匈奴的威胁，不但要嫁女儿给他，还要送匈奴许多财物。即使这样做，北方边境仍得不到安宁。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君臣单于又派人来求亲。汉武帝答应了匈奴和亲。但武帝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一心想改变这种受欺凌的屈辱的地位。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马邑（今山西朔县）有个大商人聂壹通过大将军王恢向武帝建议，由聂壹假装在马邑做内应，引诱匈奴来取马邑，汉大军埋伏在马邑附近，好歼灭匈奴军，擒捉单于。汉武帝采纳了聂壹的“马邑诱敌”之计，派王恢、韩安国、公孙贺及李广等将军带领三十万人马埋伏到马邑旁边山谷里。君臣单于果然中计，亲带十万骑兵来取马邑。匈奴军行至大约离马邑一百里地的武州（今山西左云县），打下汉设置的了望敌人，传递消息的一个亭堡，抓住守在那里的亭尉。匈奴审问亭尉，亭尉把汉布置的埋伏全告诉了单于。单于立即全军撤退。埋伏在马邑的汉军，得到单于回军的消息，赶快追赶，但已来不及了。马邑诱敌之计没有成功，但从此双方关系大破裂，接连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其中最大的有决定性的大战有三次。

第一次，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杀辽西（治所在今辽宁义县西）太守，虏去二千多人。帝武派将军卫青等人率领大军，避实就虚，从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境）向西迂回，击败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久为匈奴盘据的秦时河南地（今黄河河套地区）。汉在那里设置朔方郡，并重新修缮秦蒙恬所筑边塞。同年夏，招募贫民十万口徙居朔方，作为边塞重镇。

第二次，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仍连年入侵边境，武帝命将军霍去病带兵远征。这次战争焦点是争夺河西地区（汉时指今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及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霍去病自陇西两次出兵。一次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一次过祁连山（在甘肃境），围歼匈奴，斩获匈奴四万多人。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数万人归汉。汉分徙其众在陇西（郡治未详，东汉时治狄道，即今甘肃临洮县）、北地（治马岭，即今甘肃怀县东南）、上郡（治设在陕西绥德）、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称五属国。后又徙徙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余口，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之地（上七十二万人中，有一部分徙往会稽）。自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至盐泽（湖名，即今新疆罗布泊），匈奴从此绝迹。汉又分河西地为武威、酒泉两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增设张掖、敦煌。河西四郡的建立，不仅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交通，成为通往西域的走廊，对我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准备了必要条件。

第三次，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各带五万骑兵，另外组织了随军马匹十四万匹，步兵、辐重兵数十万人，分道深入漠北，捕捉匈奴主力。匈奴听从降将赵信计谋，移军漠北，以逸待劳，企图汉军到来，一鼓全歼。霍去病东路军出代郡（治所在代县，今河北蔚县西南），深入二千多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连战连胜，斩获七万余人。至狼居胥山（今内蒙古苏克特旗以北），登临翰海（唐以前人皆解作海名，据方位判断，当在今蒙古高原东北境，疑即今呼伦湖与贝尔湖。今人岑仲勉考证，既云“登临”，即是“山”，而非“海”，“翰海”当即今蒙古杭爱山不同音译）。卫青西路军出定襄（治所在成乐，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出塞一千多里，与匈奴单于相遇。大败单于，单于率数百骑远遁，汉兵一直追到漠北翼（tian田）颜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纳拉特山）的赵信城。这次战役之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在汉武帝时与匈奴的长期交战中，涌现出好些民族英雄，如上面所说的卫青、霍去病。还有一个李广，他一生身经大小七十几战；匈奴称为“飞将军”，司马迁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赞论他。又有一个苏武，在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匈奴用迫害、诱惑等方法，要苏武投降，苏武坚贞不屈。匈奴把他送到北海（今苏联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荒无人烟处牧羊，没有吃的，他掘野鼠，草籽而食。终于击败了匈奴胁迫的诡谋。苏武留匈奴十九年，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始返回祖国。真是“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苏武字）！”又有一个张骞通西域的史实，在当时，也是因为匈奴控制着西域各国，截断匈奴的右方援兵。张骞通西域，使西域各国归附了汉，开辟了我国通往印度、西亚乃至欧洲的交通，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在下册人物传记内还要细说。

汉宣帝时，匈奴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严重的纷争，五个单于并立。宣帝甘露元年（公

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汉，愿为汉防守阴山。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西城副都护陈汤击杀郅（zhì）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得匈奴全部土地。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宫人王嫱（昭君）自请嫁匈奴。入匈奴后，被称为宁胡阏氏。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成帝又命她从胡俗，复为后单于的阏氏。对汉和匈奴的和好关系，曾起了一定的作用。她的故事成为后来诗词、戏曲、小说、说唱等的流行题材。在一段的六、七十年中间，匈奴和汉和好，汉北部边境呈现了“边城晏（晚）闭，牛马布野”的和平气象。

二十 王莽篡汉

西汉前期，经济繁荣，国家强盛，文、景时，号称“文景之治”，武帝时国力最强，昭帝、宣帝时仍维持富强局面，到元帝时，走了下坡路，元帝死后，汉成帝是个荒淫皇帝，大权逐渐落到外戚手里。皇太后王政君有八个兄弟，除一个早死外，其他七个都封为侯，王凤还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王凤有个侄儿王莽，不象其他王家子弟那样有骄奢习气。王莽做事谨慎，节约勤俭，很有礼貌，人们都说王家子弟数王莽好。后来王莽也做了大司马。

这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随时发生，西汉王朝摇摇欲坠。王莽于汉成帝末年，继诸叔之后出任大司马大将军。汉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势。到汉平帝时，王莽复任大司马，屡次捐钱赈地，收揽民心。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排除异己，严厉处理与平帝外家卫氏有关的吕宽之狱，使死者成百；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树立党羽，笼络儒生。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官吏和朝中大臣以及一些平民上书颂扬王莽功德，请太皇太后封他为安汉公，还封给土地。王莽几次假惺惺地推辞汉平帝对自己的封赏。当时上书称颂王莽功德者前后共有四十八万多人，还有人收集了歌颂王莽的文字三万多字。王莽的威望越来越高。王莽看着时机快成熟了，在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的一天，用毒酒毒死了平帝，然后找了个两岁的小孩刘婴来做皇太子，历史上称孺子婴。王莽做了摄政，并改元为居摄元年（公元6年）。后来又要太皇太后封他为摄皇帝，并指使人制造出一些迷信的东西来骗人，象什么献祥瑞、呈符命等等，什么“王莽是真命天子”的图书，什么“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契据等都出现了。王莽见时机已到，就向太皇太后讨皇帝玉玺。太皇太后大吃一惊，不肯把玉玺交出。王莽就采取强迫的方法，于是太皇太后只好气愤地将玉玺扔在地上。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曰“新”，以公元9年为新朝始建国元年，废孺子婴为安定公，从此西汉灭亡了。

西汉王朝结束了，但西汉社会遗留下来的阶级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王莽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陆续颁布法令，附会《周礼》，托古改制。

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私人奴婢改称“私属”，一律不许买卖。占有

土地超过九百亩而男子不到八口的人家，要把超过的土地交出来，分给同族和邻里的人；没有土地的人家一夫一妻可分田一百亩。从这法令上看是要限制土地兼并和奴婢买卖。实际上，他只是把一部分违犯法令的豪族地主的土地转归到王氏豪族集团控制的官府手里，穷人并没分到土地。另一方面，自耕农的土地也成为“王田”，这些贫困的自耕农如卖掉一小块土地，就要连同全家流放边地，甚至被处死，加速了自耕农的破产。所以他这一规定，不仅遭到豪族反对，也遭到广大农民反对，只行了三年就宣布作废了。

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又下诏实行五均六莞（guan管）。五均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师，以便管理市场，平定物价，调节物质，当时人称之为“平市”。六莞是指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除（she者）贷等五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用来推行五均六莞的多是一些大商贾，这些人“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自然要遭到人民反对了。

居摄二年（公元7年）、三年、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多次铸造钱币，又多次改换，更加速了人民破产。

王莽改制，搞了十多年，把全国经济搞得更乱了，“农商失业”，“百姓困乏”，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他为了挽回自己威信，拯救自己的统治，一面玩弄符命把戏，一面发动对匈奴和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不义战争，更加重了人民负担。又逢严重灾荒，米价高达五千钱、万钱一石，甚至黄金一斤也只能易豆五升。真是内外交困，危机四起。于是农民暴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西汉末旧臣反王莽的斗争也不断发生，而且与农民起义斗争联系起来。更始元年（公元23年）王莽的新朝彻底崩溃。

二十一 绿林、赤眉起义与刘秀称帝

西汉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王莽并未能解决，王莽的残酷统治，人民生活更加痛苦。终于激起了农民大起义。

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临淮人瓜田仪在嵇长州（今江苏省吴县）起义，出没于江湖之间。同年吕母在海曲（今山东省日照县）起义，杀海曲县宰，入海坚持战斗。同年，湖北中部大旱，新市（今湖北京山境）王匡、王凤起义，饥民纷纷参加起义军，他们聚集在绿林山（今湖北当阳东北）里，因此叫做“绿林军”。几月后，绿林军发展到七、八千人。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的荆州牧发兵进攻绿林军，绿林军出击获胜，部众增至数万人。第二年，绿林山中疾疫流行，绿林军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领，西入南阳（治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新市兵攻随县时，平林人陈牧、廖湛率众响应，于是绿林军中又增添

了一支平林兵。西汉室宗刘玄，这时也投身平林兵内。

南阳大地主刘寅、刘秀兄弟也是西汉宗室，他们在南阳组织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称为舂陵军，与下江兵联合。这时绿林军发展到十多万人，为扩大影响，拥刘玄作皇帝，复汉国号，以公元23年为更始元年。绿林军建国号后，王莽发州郡兵四十二万，由王邑、王寻率领，阻击绿林军。六月，王莽军前鋒十多万人，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省叶县）。绿林军王凤、王常八、九千人坚守昆阳，刘秀轻骑突围出城，征集援兵。刘秀发鄧、定陵兵数千人援昆阳，王邑、王寻一战而败，王寻被杀。城中兵乘势出击，莽兵大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昆阳战后，王凤、王常、刘秀等派人打扫战场，光收拾缴获战利品就费时一月多。

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功绩，他们兄弟势力逐渐凌驾农民军其他将领之上，因此新市、平林诸将劝更始帝杀刘秀之兄刘寅。接着绿林军分兵两路进击王莽。一路由王匡率领，攻克洛阳。更始帝在洛阳派刘秀到黄河以北发展势力，刘秀到河北后，就逐渐脱离农民军控制。另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西入武关。析县人邓晔起兵攻下武关，迎入绿林军，合兵直取长安。关中震动，王莽被杀，长安被绿林军迅速攻克。公元24年更始帝迁都长安。

刘玄进长安后，沉醉在腐化的宫廷生活中，并杀害农民将领，义军内部离心离德现象滋长起来。王匡率一部分绿林军离开他们同赤眉军联合。赤眉军首领樊崇在公元25年打进长安，刘玄逃走。

现在再说赤眉军。绿林军起义第二年，琅琊（今山东诸城）樊崇领导饥民在莒（jǔ）县（今山东莒县）起义，山东各地起义军逐渐汇合在他周围。为同王莽军队相区别，起义军把眉毛涂成红色，因此叫“赤眉军”。他们因袭汉乡官和地方小吏称号，把各级首领分别称为三老、从事、卒史，彼此之间以巨人相称。他们改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口头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赤眉军力量日大，先后转战在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镇压许多郡县官吏，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

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与绿林军王匡是同名）和更始将军廉丹进攻赤眉军。王莽的军队残害百姓，百姓作歌谣：“宁逢赤眉，不逢太师（王匡），太师尚可，更始（廉丹）杀我。”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东）大败王莽军，杀廉丹，乘胜追击，愈战愈盛，很快发展到十几万人。樊崇等二十多人，接受了刘玄的封号。由于刘玄排斥赤眉，樊崇等又脱离刘玄，转战于河南一带。公元25年，赤眉军西进，至华阴（今陕西华阴），有众三十万。赤眉军在地主巫师怂恿下，在军中找到一个没落的西汉宗室、十五岁的牛吏刘盆子，拥立为皇帝。接着，攻入长安，推翻了刘玄的统治。

赤眉入关时，刘秀也派兵从河北向关中进发。这时刘秀在河北一带力量已发展壮大，公元25年六月，赤眉军迫近长安时，刘秀在滹（hōu）南（今河北柏乡县北）称帝，这就是东汉光武帝。赤眉军在长安粮食发生困难，樊崇只好带着军队往西流亡，到了天水（在今甘肃）一带，遭到地主豪强拦阻，樊崇又向东转移。汉光武帝听到这一消息，立带大军二十万埋伏起来，并派大将冯异到华阴诱樊崇大军至峭山下。等赤

眉军一到，立即伏兵四起，冯异叫打扮得跟赤眉军一样的汉兵高喊“投降”以扰乱赤眉军的军心，从而镇压了赤眉军的反抗，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汉光武帝镇压了绿林、赤眉军后，接着又消灭割据陇右和蜀地的两个豪强，统一了中国。并建都洛阳，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东汉”，或者叫“后汉”。

二十二 东汉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和党锢之祸

东汉建立后，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三帝，到了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和帝在公元89年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窦宪等专权。永元四年（公元92年）和帝用宦官郑众掌卫为禁军，消灭了窦氏势力。郑众被封为鄯（chao渠）乡侯，这是宦官用权和封侯的开始。安帝时，实际掌权的是邓太后和他的兄弟邓骘（zhì）等人。邓太后死，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消灭了邓氏势力，皇后的兄弟阎显当上了御校，形成宦官、外戚共同专权的局面。公元126年，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拥立十一岁的济阴王为帝（汉顺帝），并杀阎显。孙程等十九人皆封侯。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后父梁商及后子冀为大将军。顺帝死，邓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质、桓三帝。梁太后也任用宦官，还扩充太学，尽力争取官僚士大夫，但根本大权还是握在梁冀手里。梁冀十分骄横，八岁的质帝也看不惯他的行为，有一次，质帝在朝堂上指着梁冀说：“这真是个跋扈将军！”梁冀听后气得要命，怕质帝长大了自己吃不消，就用毒药煮饼害死了质帝。桓帝即位，梁冀更飞扬跋扈。他把持朝政，官吏升迁，都得向他请愿，满足他的勒索。他还强占土地，调发卒徒，兴建私人苑囿。他爱养兔子，修建了一个兔苑，命令各地交纳兔子。每只兔子身上都烙有记号，谁要伤害梁家兔子，就犯了死罪。有个商人误打死一只兔子，竟株连了十多个人的性命。他抓良家子女为奴婢，称做“自卖人”。并抓富户来随意加给罪名，叫这些人拿钱来赎人。有个孙奋家很有钱，梁冀送他一匹马，向他借五千万。孙奋给了三千万，梁冀生了气，诬孙奋母亲是他家逃奴，曾偷过梁家十斛珍珠，一千斤金子。孙奋不承认，被官府活活打死，财产全部没收。梁冀专权二十年，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太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消灭梁氏。梁氏被抄家时财产竟达三十多万万。官府获得这笔巨大收入，便在这一年减收了天下租税的一半。

梁冀死后，宦官独揽政权，权势达于顶点。宦官兄弟姻亲临州宰郡，杀人如麻，与盗贼无异。宦官候览前后夺人宅舍竟达三百八十一所，夺人田地一百一十八顷。

在外戚与宦官为专权的而进行的反复争斗中，为了笼络儒生，双方又都扩充太学。顺帝时太学生多至三万人。太学生一般出自地主阶级，同官僚士大夫有着密切联系，他们议论朝政，品评人物，成为“清议”的中心。一些太学生还攻击腐败朝政和恶罪权贵，支持敢于干犯权贵的人。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奏劾贪污守

令，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党羽，被贬作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规得罪宦官，也被贬为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人上书，从而使皇甫规也获得了赦免。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为太学诸生特别尊重的李膺做了司隶校尉，陈蕃做了太尉，有人告发宦官张让兄弟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县令张朔贪污勒索。李膺要查办张朔，张朔逃到张让家里，李膺终于在张让家的夹墙里搜出了张朔并立即杀死。又有一个与宦官侯览来往密切的方士张成，得知皇帝要颁布大赦令，就怂恿儿子杀了自己的仇人，并说：“大赦令下来了，不怕司隶校尉依法惩办我儿子。”李膺不管这一套，说“故意杀人，大赦也不能赦到他身上。”就杀了张成的儿子。这样，宦官就怂恿一个叫牢修的人在桓帝面前告了李膺一状，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结成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

汉桓帝听信了诬告，就下令逮捕党人，把李膺、杜密、陈寔、范滂等二百多人逮捕下狱。这些人被捕时，并不害怕，例如陈寔，只是一个有名望的太学生，有人劝他逃走，他说：“我逃了，别人怎么办？我进了狱，还可使别人活下去。”在查办党人时，青州平原相史弼不查报，查问的官员追问史弼，史弼说：“如果一定要冤枉好人，平原家家户户都是党人。如果一定要我死，我宁愿死；要我查办党人，‘我不能这么做’查问的官员没法，只好胡乱地把平原的官收到监狱里去回报朝廷。

第二年，有一个颍川人贾彪，自告奋勇地到洛阳为党人申冤；汉桓帝的皇后的父亲窦武也上书要求释放党人；李膺在狱中采取以攻为守法，故意招出好些宦官子弟为党人。宦官害怕了，对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常，应大赦天下。”这样，李膺及其它党人被赦归田，禁锢终身。历史上称这次行动为“党锢之祸。”

党锢事件后，士大夫把那些不畏宦官权势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度辽将军皇甫规没有被列入党锢，甚至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

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名士陈蕃与窦武共同执政，起用李膺等并谋诛宦官。双方陈兵对阵，结果陈蕃、窦武皆死，姻亲、宾客被收杀，门生、故吏被禁锢。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曾打击过宦官的张俭等又被追捕，党人横死狱中者百多人，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达六、七百人。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又株连了党人的许多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直到黄巾起义，党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说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当农民高举义旗时，这些党人获得赦免后，却又立刻同宦官站在一起，集中力量来镇压起义军，充分暴露出这些党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性质。

二十三 黄巾军起义

东汉，本来是建立在地主豪强基础上的王朝，东汉后期，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取

治极其黑暗腐朽。汉灵帝更是昏庸透顶，他在西邸公开卖官，二千石的官禄卖二千万，四百石的官禄卖四百万，暂时付不出钱的可赊欠，上任后可加倍付款。用钱买来的官，自然要加倍向老百姓勒索偿还，真是豺狼当道，民不聊生。再加上当时天灾接连不断，人民走头无路，只有起来反抗斗争。农民起义自安帝以后就不断发生，统治阶级对之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起义斗争，仍如火如荼（tú途），越来越厉害。人民中间传诵着一首歌谣，表现出了当时农民起义军蔑视统治阶级，同封建统治者进行顽强战斗的意志。歌谣说：“发如苴，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不可轻”。到了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暴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

黄巾起义最初是有个叫张角的人，在巨鹿（今河北晋宁南）看到革命形势日渐发展，就创立了一个宗教组织，叫“太平道”，他利用“太平道”作为组织革命力量的工具。并在疫病流行时，同他的弟弟张宝、张梁及一些弟子以给群众治病，为掩护，宣传并组织群众参加太平道。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太平道传遍黄河、长江中下游一带，参加太平道的有几十万人。张角把全国几十万教徒组织成三十六方，大方有一万多人，小方有六、七千人，每方都设有渠帅领导，统一归张角指挥。在革命条件已基本成熟时，张角就决定甲子年，即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全国同时起义。并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革命口号。

在离规定的起义时间还有一个月时，有个叫唐周的叛徒竟向东汉统治者告了密，以致使洛阳的大方渠帅马元义不幸被捕，英勇就义，一千多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在宫廷内做内应的两个宦官封爵、徐奉也被捕牺牲。叛徒给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东汉朝廷连夜去冀州搜捕张角。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角当机立断，派人驰告各方，决定提前起义。张角先发制敌的英明决策，使起义军取得了主动权，打乱了封建统治者妄图扑灭革命火焰的如意算盘。所有起义的农民都以头上裹黄巾为标志，开始了同东汉王朝的斗争。

这次起义，由于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又经过长期酝酿，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因此，一开始就是“八州并举”，“旬日之间，天下响应”。数十万农民军冲杀在各个战场，杀官吏，烧官府，摧毁地主田庄，没收地主财物和土地，开仓赈济饥民。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

黄巾军主要集中在冀州（今河北冀县）、东郡（今河南濮阳东南）、颍川（今河南省禹县）和南阳（今河南南阳市）四个地区。他们打了许多胜仗，攻占许多郡县。都城洛阳处于起义军的包围形势之下。张角亲自指挥河北黄巾军，屡次把东汉军队打得狼狽不堪。东汉统治者派卢植去镇压，老吃败仗，被装入囚车送去洛阳治罪；东汉政府又派董卓代卢植，在下曲阳，被张角打得丢盔卸甲，受到了撤职处分。八月，东汉又派皇甫嵩北上，进攻河北黄巾军。正当黄巾军同敌人展开决战的关键时刻，张角不幸病死。黄巾军在张梁领导下，同皇甫嵩血战，屡败皇甫嵩。但起义军在胜利中骄傲，放松警戒。一天黎明，遭到了皇甫嵩的突然袭击，张梁仓卒应战，不幸牺牲，各地豪强地主纷纷组织反动武装，配合镇压起义军。在东汉军队和地主武装的联合进攻下，黄巾军主力在经

过九个月的英勇战斗后，失败了。

张角直接领导的黄巾军主力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在山东、青州的黄巾军，一面生产，一面战斗，曾发展到一百万人，屡次打败东汉军队。河北、山西一带也有很多支起义军，有的二、三万人，有的六、七千人，他们攻打城市和地主的坞堡，在战斗的过程中，逐渐联合起来，号称黑山军。并坚持战斗达二十多年之久。

张角所领导的黄巾大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有纲领、有目的的农民革命战争。在思想觉悟、组织领导、斗争策略等方面，比起以前的农民起义，有进一步提高。它表明我国农民武装斗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却瓦解了东汉政权，打击了豪强地主，有利于社会发展。

二十四 袁曹官渡之战

经过黄巾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官吏纷纷招募军队，扩充势力，许多豪强地主武装依附他们。这样，就出现了不少割据一方的军事集团。各军阀之间互相混战，广大劳动人陷入痛苦的深渊。

中平六年（公元169年）汉灵帝死，刘辩（少帝）继立，大将军何进密召并州牧董卓入京，铲除宦官势力。正在这时，宦官杀何进。袁绍又发动政变，把宦官一网打尽。接着董卓入洛阳，尽掠东汉朝政。废黜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汉献帝），逼走袁绍、曹操等人。董卓专横，洛阳混乱。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讨伐董卓军队以袁绍为盟主，进屯洛阳周围。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关东联军本乌合之众，很快分崩离析。长安却发生改变，董卓被杀。其部将李傕（jué决）、郭汜等在长安一带横行。经过五、六年的混战，全国逐渐形成许多割据区域，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曹操占据兖（yǎn演）、豫二州，公孙瓒占据幽州，刘备、吕布在陶谦之后相继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的淮南部分，刘表占据荆州，刘焉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江东，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度占据辽东等。

曹操曾领兵镇压颍川黄巾，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在济北诱降黄巾军三十余万，有些豪强地主也追随曹操。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他迎汉献帝到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扩大了政治影响。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进行了一场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曹操以两万左右的兵力，大败袁绍十万之众，消灭了袁绍的势力，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在官渡大战前，曹操就先消灭了表亲吕布，掌握了黄河北岸的战略要点射犬（今河南省沁阳东北），截断了袁绍沿河西进的进路。又对在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的刘备发动进攻，乘刘备兵力尚未集中之时击败刘备，迫降了关羽，刘备逃到邳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依附袁绍。

袁绍觉得曹操是个劲敌，于是决心攻打许昌。公元200年，袁绍集中十万精兵，派沮（jū）居授为监军，从郟城出发进兵黎阳（今河南浚县）。他先派大将颜良渡过黄河，进攻白马（今河南滑县）。为解决白马之危，曹操采取声东击西的作战方针，首先率兵到延津，摆出渡河进攻袁绍后方的架式，诱使袁绍主力到延津，然后派轻兵袭击已将白马包围了的袁军，杀死颜良。曹操首战告捷，军心振奋。但曹操并没有轻敌，而是立即主动撤出白马。袁绍不知这是曹操之计，反而派大将文丑率五、六千骑去追击曹操的兵马。可是曹操已在白马山南麓设下了埋伏，令将士解鞍放马，散衣物、辐重车辆于路上，文丑的军卒到此之后，见到衣物、辐重满地，以为曹军溃散，便纷纷下马抢夺辐重。这时曹操率五百骑兵突然冲击，袁军措手不及，文丑在乱中被斩。

此战一胜，曹操就又撤到了官渡。官渡为许昌门户，沟渠纵横，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袁绍在官渡曹营外面，堆起土山，筑起高台，居高临下，向曹营射箭。曹操设计了一种霹雳车，车上安装机纽，兵士们扳动机纽，把十几斤重的石头发出去，打垮了袁军的高台。袁军又挖地道，曹军也深挖壕沟来抗拒袁军。袁军多次强攻不下，双方相持三月之久。

九月，袁将韩猛监护几千辆粮车给驻在官渡的袁军送粮。曹操派徐晃，史涣袭击，把粮草全部烧光。袁绍在十月份又从河北运来一万多车军粮，屯积在袁军大营北约四十里的乌巢（今延津县东南）。曹操见袁绍对乌巢防范疏忽，又奇袭乌巢，包围了粮屯，放起火来，袁绍大将张郃力主营救乌巢，而袁绍错误地认为曹营空虚，只派少数人救乌巢，命大将高览、张郃直取官渡曹营。曹营留守袁洪、荀攸严密防守军营，高览、张郃等攻不进去。曹操却攻入乌巢，杀死了袁军守将，火烧了袁绍的全部军粮。张郃、高览的军队闻听粮库被烧，不战自乱，张郃、高览也投降了曹操。曹军乘机反攻，两面夹击袁军，使袁军死伤七万多人，袁绍仅带八百骑兵仓惶渡河逃走了。

官渡之战，袁强曹弱，可是曹操大败袁绍，这是什么原因呢？曹操迎汉献帝到许昌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了有利地位。曹操在用人上“唯才是举”，他身边聚集了大批政治、经济和军事人材。与此相反，袁绍代表豪族地主割据势力，在他的内部各自代表一部分割据势力的利益，连他的几个儿子之间也互相争权夺利，文官武将各附一派，勾心斗角，甚至在战场上也互相折台。这是袁绍官渡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曹操在战争中，能够听取部下意见，用审时度势、临敌变化等军事思想指导作战，根据敌强己弱的特点，战略上采取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白马获胜，主动后撤，官渡狙击，坚守不攻，都是避开不利决战，为准备反攻创造条件。在战术上声东击西，迂回奇袭，使自己处处掌握主动权。袁绍对敌我双方力量没有正确分析，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曹操力量，恃强急攻，长驱直入，一线平推，不知凭借自己优势兵力，实行战略包围，使全军陷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在决战关头，又没有以足够兵力反击乌巢，结果遭到曹军偷袭，导致全线败溃。

官渡大战，历时八月，袁绍主力被曹操彻底消灭。建安六年，（公元202年），袁绍忧愤病死，曹操又利用袁绍之子袁谭、袁尚的矛盾，相继占领青、冀、幽、并四

州，统一了中原。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率军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打败袁氏残余势力勾结的乌桓首领单于，统一了北方。

二十五 赤壁之战和三国鼎立

曹操打败乌桓以后，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挥军南下，企图夺取刘表的荆州（今湖北襄阳一带），然后进占江东，统一全国。这时，在中原活动失败的刘备，正在荆州依托刘表。八月，荆州牧刘表病死。九月，曹军进抵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北新野，刘表幼子刘琮带七、八万军队降曹。刘备立即从樊城向江陵（今湖北江陵）一带撤退，并命令关羽带水军经汉水到江陵会合。曹操亲率轻骑五千，紧追刘备，在长坂坡（今湖北当阳县东北）打败刘备，占领江陵，从而基本控制了荆州。刘备在长坂坡大败后，退到夏口（今汉口），同关羽水军及刘表大儿子刘琦部队会合后，一共只有二万多人兵力，扼守长江南岸樊口（今湖北鄂城西北）。诸葛亮对刘备说：“形势紧急，只有向孙权求救了。”正好孙权也派鲁肃来找刘备劝说联合抗曹，诸葛亮就与鲁肃一起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去见孙权。

孙权本人不愿以“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曹操，可是吴国群臣意见不一，以鲁肃等人代表的主战派与以张昭、秦松等人代表的主降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诸葛亮舌战群儒，批驳了主降派的言论，坚定了孙权的抗战意志。孙权又把心腹人周瑜从郡阳召回，商议对策。周瑜也是坚决主战的，于是孙权就任命周瑜和大将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三万精锐部队与刘备在夏口会师，准备共同抗曹。

曹操不战而降刘琮，又大败刘备，轻敌情绪左右了他。孙、刘联军知道战争胜负关系到自己生死存亡，士气旺盛。两军在赤壁（今湖北嘉鱼东北）遭遇。此时曹军中疾病流行，初次交锋，曹军败退到长江北岸乌林（今湖北嘉鱼西），双方隔江对峙。曹操为了克服北方人不服船上生活的困难，把船用铁链锁在一起，船与船间铺上木板，总以为这样可以减少风浪颠簸，又可以在船上行走骑马，如行平地。周瑜部将黄盖见曹操采用“连环船”战术，便向周瑜建议用火攻。周瑜采纳了黄盖建议，决定在可能出现东南风的冬至前后发动进攻。周瑜为了能顺利实现火攻曹营的计谋，又用“苦肉计”，当着曹营派来的使者，故意以违犯军令责打了黄盖，从而当黄盖诈降曹操时，曹操竟深信不疑。

在十一月的一个夜晚，东南风大作，黄盖带领十只战船，顺风向曹营急驶。船上满载浸了油的枯柴、干草和硫磺、烟硝等易燃品，上面用帐幕篷盖。黄盖站立船头，带领士兵高喊：“黄盖来降！”曹营将士，外出观看。黄船驶近曹营水寨，黄盖一声令下，十只战船一齐放火，十条火龙直向曹营冲去，“连环船”立即着火，江面成为一片火海。“连环船”无法驶动，曹营士兵拥挤撞撞无法逃走，烧死淹死的不计其数。风大火大，一会儿便蔓延到岸上营盘。周瑜得知黄盖得手，遂率孙、刘联军乘势渡江攻击，曹

军大败。曹操率残兵败将，沿华容小道（今湖北盐利县西北）撤退。孙、刘联军乘胜追击，水陆并进，直到江陵县境。曹操损失大半人马，水军丧失殆尽，孙、刘联军取得了战争胜利。这就是决定三国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

赤壁战后，孙权在长江中下游的地位得到巩固。刘备占领了长江以南荆州等四郡，后又进入益州，消灭了刘璋势力，并从曹军那里夺得了汉中。这时曹操已完成了北方的统一，这样，在我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三国时期。

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篡汉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世称蜀。孙权在公元222年称吴王，至公元229年，又在建业称帝，建立吴国。

二十六 白痴皇帝和八王之乱

曹丕于公元220年篡汉建魏，为魏文帝，经过明帝，到齐王曹芳，由曹爽和司马懿辅政。齐王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一网打尽曹爽和他的党羽，掌握了魏国权柄。过了两年，司马懿死，魏国大权落在司马懿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手里。司马师废去曹芳，另立曹髦。后来司马师也病死了，大权由司马昭一人掌握。魏帝曹髦受不了司马昭的专横，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亲自讨伐司马昭，被司马昭部下刺死。司马昭又另立曹奂为魏元帝。这时司马氏在曹魏的内部力量已经巩固，就出兵伐蜀，公元263年冬灭蜀。司马昭灭蜀之后，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在公元265年把挂名的魏元帝曹奂废掉，自己做了皇帝，建都洛阳，历史上称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公元279年，晋军五路大举攻吴，第二年，吴被晋灭亡。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之乱后出现的分裂割据局面，延续了九十年之久，到此又归于统一。

公元290年，晋武帝病重，临死前遗诏，要皇后父亲杨骏和皇叔司马亮一同辅佐太子。杨骏为了独揽大权，串通杨皇后，扣住诏书，另伪造一道诏书，指定杨骏独自辅政。司马亮死后，司马衷即位，就是晋惠帝。

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一天，他带着太监在御花园玩，池塘里蛤蟆乱叫。白痴皇帝呆头呆脑地问：“这些小东西叫，是为官家，还是为私人呢？”太监真不知该怎样回答，有个比较机灵的太监说：“在私地里叫就是为私家，它在官地里叫，就是为官家了。”惠帝点了点头表示懂得了。又有一天，各地闹饥荒，地方官员报告说因灾荒饿死了许多百姓。这个白痴皇帝竟然说：“没有粮食吃，为什么不多吃些肉呢？”大臣们听了，不知该怎样回答才是。有这样一个白痴皇帝，一些野心家当然要闹事了。

晋武帝在时，他认为魏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皇族子弟做诸侯王，使皇室孤立。所以，他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武帝一死，杨骏用阴谋手段，排挤了汝南王司马亮，一些诸侯王不甘心这种局面，加上晋惠帝虽然是个白痴，但皇后贾氏却是一个心狠手辣的

人，她不愿杨骏独揽朝政，就秘密派人跟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联络，要他们讨伐杨骏。元康元年（公元291年），贾后秘召楚王玮从荆州带兵进洛阳。司马玮进京后，顿时全城戒严，贾后挟惠帝下诏杀死杨骏和杨氏党徒几千人，杨太后也被逼身死。从此以后，诸王为争夺统治权，展开了极其凶残的内战。

杨骏被杀后，汝南王亮进洛阳辅政，可兵权在楚王玮手里。贾后与楚王是同党，就把汝南王亮抓起杀了。可贾后又怕楚王玮权力太大，不好驾驭，当天晚上就宣布楚王玮擅杀汝南王，把楚王玮办了死罪。从此朝政由贾后独揽。贾后掌权七、八年，专横跋扈，胡作非为。太子司马遹（yù）不是贾后所生，贾后就想除掉太子，于是就用酒把太子灌醉，趁太子昏沉沉时，叫他抄写了事先草好逼惠帝退位的信。第二天，贾后叫惠帝传假信给大臣们看，大臣们不信是真信，贾后就让对笔迹。贾后见大臣们虽不敢说话，但心中不服，所以不敢处死太子，只是将太子废掉了。

赵王伦于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被召入京，他掌握了禁军和朝政。太子被废后，一部分拥护太子的大臣不满。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他们与赵王伦密谋废贾后，复太子。赵王伦一面答应参与行动，一面又与贾后研究，挑动贾后用毒药毒死太子。贾后听了赵王伦的话，毒死了太子。赵王伦借口为太子报仇，派禁军校尉齐王冏（jiǒng）带兵进宫，逮捕了贾后，把贾后杀死。赵王伦宣布自己辅政。

赵王伦当上相国后，独揽大权，还不满足。过了一年，干脆把晋惠帝软禁起来，自己称皇帝。各诸侯王都想夺这个皇帝宝座，所以又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厮杀。参加这场混战的有：赵王伦、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yóng）、长沙王乂（yì）、东海王越，加上汝南王亮、楚王玮，一共有八个诸侯王，历史上称为“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前后延续了十六年，到永兴三年（公元306年），八王中七个都死了，留下的最后一个东海王越。他毒死了晋惠帝，另立晋惠帝弟弟司马炽（chì）帝，这就是晋怀帝。

十六年的内乱，使西晋统治集团力量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隐伏着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了。

这时，匈奴贵族刘渊利用人民仇视西晋统治的情绪，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在离石（今山西离石）起兵反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国号汉。并派兵攻打洛阳。永嘉七年（公元313年），匈奴军攻下洛阳，晋怀帝被掳。晋军在荆棘成林的长安拥立愍（mǐn）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匈奴刘曜又夺得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二十七 淝水之战

西晋灭亡后，公元317年，逃亡到江南的贵族、官僚和大地主，同江南门阀世族

一起，拥戴晋皇族司马睿（rǔ瑞）建立政权，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历史上叫做东晋。

西晋结束以后，黄河流域的各族统治者互相混战。在约一百一十年里，北方各族、匈奴、氐（dī低）、羯（jié竭）、羌、鲜卑等族先后建立了许多国家。历史上把这些国家（黄河流域建国的有十五个，西南地区一个），总称为十六国。

四世纪下半期，氐族贵族建立的前秦逐渐强大起来，统一了黄河流域。在东晋太元七年（公元382年），秦王苻坚召集文武百官商议进攻东晋。第二年苻坚强征各族人民当兵，发动了侵东晋战争。东晋由谢安负责，抵御苻坚的侵犯，谢安派谢石、谢玄等人带兵迎击。

前秦有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貌似强大。但前秦国内民族矛盾十分尖锐，鲜卑族和羌族的士兵都希望前秦失败，就可以乘机摆脱氐贵族的统治；秦军中的汉族士兵更希望晋军获胜，由于军心离散，秦军战斗力不强。东晋虽只有八万人，但大部分是由淮河两岸富有战斗经验的农民和北方流亡的农民组成，战斗力较强。

公元383年七月，苻坚下了动员令，八月大队出发。秦军百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送粮草的船只就有一万余艘，浩浩荡荡杀向东晋首都。十月，秦前锋苻融首先率部攻占了寿阳（今安徽寿阳），淝水之战全面展开。晋将胡彬在增援途中得知寿阳失守，即退守硖（xiá狭）石（今安徽凤台西南）。苻融又进攻硖石，同时深部将梁成率兵五万据守洛涧（今安徽淮南市东洛河），并在洛口附近淮河水面设置木栅，阻止晋军西援，使硖石晋军陷入重围无援境地。被围在硖石的胡彬向谢石发出求援密信，密信又为苻融截获，转送苻坚。苻坚认为一举灭晋，就在旦夕，遂带八千轻骑兼程往寿阳，直接指挥围攻硖石。并派攻占襄阳时被俘的晋将朱序到谢石背中劝降。朱序到晋营，不但没有劝降，反将秦军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情况详告谢石，并提出破秦建议。谢石得知秦军虚实，决心利用苻坚急于进攻硖石，无暇兼顾洛涧之机，首先攻秦洛涧。十一月刘牢之率兵五千偷袭洛涧，并分兵迂回秦军后方，断其归路，出敌不意袭击梁成中军大营，杀死梁成，歼秦军一万五千余名，大大鼓舞了晋军士气。

洛涧一战打破了秦军对淮河的封锁。谢石、谢玄率主力乘胜水陆并进，挺进淝水（今安徽寿阳东瓦埠湖至淮河的一段河流）东岸，与秦军隔河对峙。胡彬也突破秦军对硖石的包围，沿淮河进军。途中，晋军为造成对方错觉，故作声势。苻坚在寿阳城上远望晋军阵容严整，士气旺盛，心生疑虑。连八公山上摇动的树木，以为都是晋兵，心里有些畏惧。

苻坚命令秦兵严密防守，晋军一时不能渡过淝水，如果再拖下去，各路秦兵一到，就难于应付了。谢玄就派人给苻坚送去一信，说：“你们大军到晋，在淝水边摆下阵势，却按兵不动，这难道是想打仗吗？如果你们把阵地稍往后撤一点，腾出一块地方，让我军渡过淝水，双方可以在战场上比比高低，这才算有胆量。”秦军各将领都反对后退。苻坚说：“他们要我们让出一块阵地，我们就将计就计，等晋军渡河一半时，我

们派骑兵冲上去，定能消灭晋军。”

约定秦军后撤，晋军渡河时刻到了。秦军是拼凑起来的杂牌队伍，号令不一，人心不齐，加上洛涧新败，无心再战，一听后撤命令，士兵们撤退就跑。谢玄带领八千多骑兵，趁势飞渡淝水，向秦军猛攻。这时，朱序在秦军后阵中大叫：“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士兵们也不明究竟，更是边喊边跑，急急逃命。苻坚急急挥剑想压住阵脚，但兵败如山倒，晋军又猛冲过来，哪里压得住。把先锋苻融的战马也冲倒了。当苻融挣扎着起来时，晋军业已赶到马前，一刀结束了苻融性命。大将一死，秦军更无法收拾，立即就溃不成军。驻扎在淮河北岸的晋军在胡彬率领下也乘势杀来，秦军如惊弓之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相互践踏，死伤大半。苻坚见势不妙，也拼命逃跑，不料一支流箭飞来，正好射中他肩膀。苻坚也顾不得疼痛，一口气逃到淮北才息了口气。

谢石、谢玄收复了寿阳，捷报送到建康，谢安正跟客人下棋。他看完了捷报，不动声色，照样下棋。客人问前方战役如何？谢安方慢吞吞地说：“孩子们到底把秦苻坚打败了。”客人倒高兴地坐不住了，赶快告别，传播胜利消息去了，谢安真的不动声色吗？他回到内宅，兴奋的心情再也按不住了，跨门槛时，三步并两步，把脚上的木屐也碰断了。

苻坚逃回北方，部下只剩十多万人。东晋乘胜收复了黄河以南许多失地。

淝水战后，北方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局面，原来被秦苻坚控制的各族首领，乘机又开始逐渐中原了。

淝水之战，东晋胜利，使南方人民避免了氏族统治的摧残，使南方经济、文化免遭破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二十八 把马当老虎的门阀士族

门阀士族的统治，应当从曹丕说起。曹丕为了拉拢世家大族支持他篡汉建魏，实行了九品官人之法，也就是“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在各州郡都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人材，按优劣情况分别评定为九个品级，政府根据评定的品级高低，任命他们担任不同的官职。担任中正官的都是世家大族，他们当然要把本阶层的人评得高。从此世家大族的势力就发展起来了。

晋王朝也是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世家大族的权势日渐膨胀。两晋时期的世家大族通过九品中正制完全控制了选拔官吏的权力，选拔的标准，已经不谈“人才优劣”了，只讲家族门第高低。按被选士人的祖辈、父辈的门第等级确定官职。门第列在上等的世家大族称为“高门”，门第列在下等的称为“寒门”，没有列入士族的称为“庶族”。寒门和庶族出身的地主子弟，只能做一般的和较低的官，升为高级官吏的机会极少。出身高门的士人，可以担任重要的官职，升迁也快。做高级官吏逐渐成

为他们的特权。所以那时的人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势族也就是高门士族。这就是所谓“门阀士族”。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皇帝，也都是靠士族的支持，才登上宝座的，所以士族的地位一直延续不变。

士族通过婚姻和仕宦两途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越是腐朽衰落就越要通过婚姻的途径来巩固自己的势力与地位，以维护自身利益。南朝士族以门第凌辱寒庶的事例很多，实际上是士族地位脆弱的表现。

士族把自己的婚姻关系严格限制在士族范围以内，并极力排除非士族混入士流的可能性。士族如果不严守这种限制，便为士族们目为婚姻失类，要受到排抑和抵斥。齐代王源嫁女给富商满璋之子，御史中丞沈约就上章弹奏说：“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联姻，实骇物听”，因此请对王源实行革官禁婚的惩罚。

士族，特别注意士族谱，齐、梁以来，尤为重视。他们致力于士族谱的编撰，企图用家世源流和婚姻纪录作为自己应享特权的凭证。寒族地主也常常伪造谱牒，篡改户籍，冒充士族。

士族还非常讲究礼法门风，讲究身份，他们连坐也不与其他不是士族的人共坐，不穿同样的衣服，甚至不互相往来。终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连有志读书的人也很少。梁代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说：士族们名为士族，考试的时候，不懂经书，却要雇人答卷；参加宴会，不会做诗，只好托别人代笔。他还说：士族子弟穿着宽大的衣服和高底木屐，身体虚弱，不敢骑马，出门要坐长檐车，下车还要人搀扶。建康令王复甚至看到马打喷嚏、踢跳，都吓得要死，对人说：“这是老虎，为什么叫马呢？”

士族们既然如此腐朽，所以他们也只能做些徒具虚名的官，领取厚禄，却不能起什么大作用。宰辅中的文职，官大、钱多，又可以任事不管，逍遥自在，所以都为士族们所占据。至于武职，到了南朝，他们就不胜其任了，慢慢地就不得不听命于掌有兵权的寒族地主了。梁朝末年，投降梁朝的羯族将领侯景发生叛乱，攻入建康的时候，士族们坐在床上，连床都下不了，跑也跑不动，只好穿着华丽的衣服，怀抱着心爱的珍宝，爬在床上等死。

这样腐朽的门阀士族阶级，起自魏，兴盛于两晋和南朝，但到了南朝末年，士族的势力也就逐渐削弱了，庶族地主逐渐取得了政治地位。

二十九 北魏孝文帝改革

前秦在在淝水战争失败以后，北方各民族又陷入混战，遂鹿中原。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部首领建立了北魏（历史上也称拓跋魏，后来也称元魏）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以后，那里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族人民，逐渐改变了原来的游牧生活，学会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成为农业居民。汉族人民也学到各兄弟民族的畜牧业经验，丰富和提高了生产知识。各族人民还在反抗各族统治者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加强了联系和友谊。

北魏原先建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把都城迁到洛阳。他迁都的原因和目的，是由于雁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不能满足国都平城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也是由于孝文帝企图摆脱雁北鲜卑贵族保守思想的影响，更是为了要吸收中原文化，改革落后风俗，以巩固其对各族人民的统治。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便设计说是要进攻南朝齐。大臣们纷纷反对，带头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向拓跋澄解释了他移都的真正意思是要改革政治，移风易俗，出兵伐齐只是一个借口。拓跋澄才恍然大悟，同意了孝文帝的意见。于是孝文帝率领步骑三十多万，大举南下。偏偏又碰上秋雨连绵，一月不停的天，道路泥泞，行走困难。但孝文帝全副武装，亲自骑马带头出城。大臣们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我们这次兴师动众，如果因雨而停止，岂不给后人笑话。如果真的不同意伐齐，也该迁都中原。诸位王公认为如何？”大臣们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又说：“事情不能犹豫不决。同意迁都中原的往左边站，不同意迁都的往右边站。”这时，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不南伐，我同意迁都洛阳。”其他大臣无可奈何地也表示同意迁都。孝文帝又让任城王拓跋澄去说服留在平城的王公贵族，他自己则从洛阳回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留在平城的贵族仍然反对迁都，孝文帝驳倒了这些人的意见，最后贵族们提出：“迁都是大事，是吉是凶，难以料定，不如算个卦吧！”孝文帝说：“疑难不决的事用占卜来决定，迁都的事，没有疑问，还卜什么卦。治理天下，应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能固定一处不变。我们上代曾经几次迁都，为什么今天就不能呢？”费尽了口舌，总算说服了这些贵族大臣。迁都洛阳的事，在第二年就定了下来。

在迁都以前，孝文帝在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就颁布了“均田制”法令。均田制规定：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受露田（未种树的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种植谷物。因为要休耕，实际上都要加倍受田，休耕两年的，就三倍受田。此外，十五岁以上男子还可分得桑田二十亩；不宜种桑的地方，丁男可分得麻田十亩，丁女五亩。农民死了或年满七十，露田、麻田要归还政府，桑田则可传给子孙。受田的农民，一夫一妇每年必纳粟二石，纳调（户税，征收帛或布）一匹，产麻的地方纳麻一匹。丁男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实行均田制以后，农民生产和生活比较稳定，开垦荒地多了，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在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又实行了“三长制”，就是重建乡官系统，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选本乡“强谨”的人充当，用以代替宗主督护的统治。这样，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削弱了豪强地主的力量。

迁都洛阳以后，北魏孝文帝又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如：用汉服代替鲜卑服；朝廷上禁用鲜卑话；规定迁洛阳的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沟通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婚姻关系；改鲜卑旧姓为音近或义近的汉姓；规定鲜卑人和汉人贵族姓氏的等第并使鲜卑贵族门阀化等等。在改变姓氏和规定门第方面，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改拓跋氏为元氏，门阀最高；其余所改鲜卑著姓中，穆（丘穆陵氏

改)、陆(步六孤氏改)、贺(贺赖氏改)、刘(独孤氏改)、楼(贺楼氏改)、于(勿勿于氏改)、嵇(屹奚氏改)、尉(尉迟氏改)等合称八姓,其门第与汉族崔、卢、李、郑相当,不充实官,只任清职。

孝文帝的改革,说明了征服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鲜卑拓跋部,自己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在这个征服过程中,鲜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被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我们祖国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颜之推在《颜氏家训·言辞篇》中比较南北方音,认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也说明北方汉语吸收了鲜卑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若干成份。孝文帝迁都后的一系列改革及以后的六镇起义,在不同的意义上推动了拓跋部封建化的完成,也推动了各民族间的融合,以至后来竟出现了“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北代之子孙十居六七”的局面。

毛泽东同志说:“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78页)的确如此,在今天,匈奴、鲜卑、氐、羌、羯这些民族到哪里去了?在汉族的血管里,有许多民族的血,这正是中华民族人口众多,优秀、聪明、伟大的一个原因。

南北朝时期,从政权上说,是各个政权相对立的大分裂时期;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来说,又是一个大融合时期。

三十 平分北国的玉壁之战

北魏孝文帝进行改革之后,也带来了许多不良的后果,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逐渐结合成极端腐化的高门大族势力。北魏政府赋税繁重,贪污成风,更加重了人民负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各族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日趋激烈,曾经多次暴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六镇、关陇、河北等地各族人民几次大起义。从公元523年开始,到公元528年,起义军的参加者,包括鲜卑、匈奴、敕勒、丁零、羌、氐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广大人民,在共同反抗北魏统治者的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增进了互相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对中华民族各民族进一步融合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庞大的起义军虽然被北魏统治者镇压下去,但起义军也沉痛地打击了北魏政权,使北魏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为部将高欢所迫,逃出洛阳,投奔于长安的宇文泰。高欢另立元善见为魏帝,高欢因洛阳靠近关中,逼使元善见迁都邺(今河北省临漳县),是为东魏,元善见即东魏孝静帝。北魏孝武帝投奔宇文泰后,于公元535年被宇文泰所杀,宇文泰另立元宝炬为魏帝,建都长安,是为西魏,元宝炬即西魏文帝。至公元550年,高欢子高洋篡东魏,建北齐,高洋即北齐文宣帝。公元557年,宇文泰子宇文觉篡西魏为北周,宇文觉即北周闵帝。在北魏分裂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后,高氏与宇文氏在洛阳至关中一线,河东一路,两个战场,不断

发生激战，这里只说河东一路战争。

当时高氏、宇文氏控制的河东地区，大抵相当于今天山西临汾地区与运城地区的分界。临汾地区为高氏的地盘，运城地区为宇文氏的领地。当时高氏以并州（今山西太原）为基地，位黄河之东，而宇文氏的大本营在长安，居黄河以西。宇文氏在河东所占的三角地带，等于是插入高氏统治区域的一把钢刀；而对宇文氏来说，这个地区却是保关中，攻并州至河北高氏政权的桥头堡。因之高氏日日谋划侵占河东，宇文氏却以全力保住河东，这就成了两个政权要在这块土地上争斗的原因。为此，宇文氏在这一带置有重兵，以备高氏，从而爆发了玉壁之战。

玉壁，（今稷山县白家庄、均安附近），三面是沟壕，背临大坡，前是汾河。利于防守。高欢攻玉壁共有两次，第一次是西魏大统八年（公元542年），王思政守玉壁，高欢败走。第二次是西魏大统十二、十三年（公元546、547年），韦孝宽代王思政守玉壁。这第二次大战其激烈，高欢即因这次大战中箭回去而死亡。

西魏大统十二年冬，高欢举东魏倾国人马，连营数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在玉壁城南先筑一土山，以便居高临下，攻城以入。韦孝宽在玉壁城两座高楼上缚木连结并高过土山，多积防守器械。高欢使人告韦孝宽说：“即使你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高欢又在城南凿地道，并另在城北筑土山，日夜攻打不息。韦孝宽就掘长堑，挡其地道。并命战士屯驻堑内防守，高欢将士每穿地至堑，即被擒杀。韦孝宽还在堑外积柴贮火，一知高欢部有伏于地道内者，就立刻下柴火，用皮套吹入地道中，高欢士兵无法停留在地道里。高欢复又造坚锐攻车，车之所及，无不摧毁，即使有排盾，也抗不住。韦孝宽就缝布为幔，攻车一来，张幔抵挡，布悬空中，战车竟不能攻入。高欢又缚松油竿，灌油加火，欲要烧布、焚幔。韦孝宽则作铁钩，按上锋刃，火竿来，用长铁钩远远割断，松麻俱落。高欢更在城四面穿地道二十一条，分为四路，在其中按上梁柱，以油灌柱，柱折，城塌坏。韦孝宽立即在城塌坏处竖立木栅以抗之，高欢之军仍不得入。高欢用尽一切攻击之术，韦孝宽一一拒破。高欢智穷力竭，又向韦孝宽诱降，派仓曹参军祖勳劝韦孝宽投降，韦孝宽回答说：“我城池坚固，兵粮有馀，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会降将军也。”高欢见诱降不成，就又图谋瓦解韦孝宽军心，告城中人说：“韦城主受彼荣禄，或复可尔，自外军士，何事相随入汤火中。”并射募格于城中说：“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匹。”韦孝宽手书其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斩高欢者，亦依此赏。”高欢又缚韦孝宽侄儿至城下，加刀于颈，高喊“若不投降，便要杀死此人。”韦孝宽仍慷慨激昂，无有降意，感动得士卒皆有死难之心。

高欢苦战六旬，部队死伤及病者过大半，损失七万多人。自己也中了一箭。将士灰心，高欢乃召集将士，命斛律金唱家乡民歌《敕勒歌》来安抚军心，高欢也自和之。但攻城终无效果，自己的人马又死伤众多，因而发疾，在夜间遁去。至并州（今山西太原），高欢因此忿懣，遂死去。

高欢把持北魏中央兵力，其部众中有些是六镇起义军中被招降者；宇文泰是把持一

方的北魏大将，论力量宇文氏在当时实不如高欢。可玉壁大战，高欢损伤惨重，把自己的生命也丢掉了。从此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两家暂时稳定下来。所以说玉壁之战是平分北国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

三十一 隋统一中国及同台湾的关系

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前后并存和斗争了几十年，到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再一次统一了北方。

在长期的南北对峙局面中，北方各民族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封建化过程，他们的经济、文化生活都与汉族融合一起了，就是在血统方面，各民族也日趋融合一起，已经不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了。统一条件已成熟，各民族的广大人民渴望统一。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杨坚就是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结束了东晋、十六国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长期分裂局面，全国统一了。

全国统一之后，隋文帝在中央行政机构方面，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分工明确，组织严密，表明封建国家的专政机构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了。在地方行政机构方面，统一改为州（后又改为郡）、县两级制，同时，把地方官任免权全部收归吏部，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经济上，继续实施北魏以来的均田制，但剥削量比前代少了，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可以有较多时间从事生产。短短二十多年间，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作物生产提高。政府的粮食和布帛，堆满了官府仓库。长安、洛阳等地官仓的储米，多达千万石。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造船技术达到很高水平，能造高四五十尺、长二百尺的大龙舟。经济呈现一片繁荣、兴旺的局面。公元605年，隋文帝死，其子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隋炀帝即位后立刻下令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隋朝的大运河，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hān）沟和江南河四段，全长四千多里，以洛阳为中心，东北通到涿郡，东南通到余杭。它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河流，经过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广大地区，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隋朝疆域广大，内地同边境的经济联系加强了。隋炀帝三次派人去台湾，又派人去西域。长安和洛阳有不少西域商人，他们受到隋朝政府的优厚优待。

说到隋炀帝派人三去台湾，我们需要追溯一下台湾的历史，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东汉末年台湾居住的高山族就已分成若干部落。他们已种植五谷，驯养猪、鸡，但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工具还全是石器。公共事务由部落成员共同管理，普通成员称做“弥麟”，没有君臣上下的分别，没有赋税、礼仪、刑罚，没有文字，还是结绳记事、

记帐，不知有历法，见地上青草发芽就去耕种。有雕刻绘画艺术，有歌舞集会等习惯风俗。各部落成员骁勇善战，以能得人头为荣耀。

三国时期吴国孙权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就派遣过卫温、诸葛直等率众万人，浮海至台湾。据现在所知史料，这是汉族人最早的大规模到达台湾的一次，也是中国人利用先进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派朱宽、何蛮到台湾去“求访异俗”。三年以后，又派陈棱、张镇州率众万余人，从广东潮州出发，经今澎湖的花屿、奎壁屿到台湾。陈棱等“慰谕”以波罗橈洞（有人以为即平埔社）为中心的部落居民。这个部落有几千人口，开化程度也较高。酋长叫欢斯渴刺史，已有一定权威。酋长管辖下的若干洞，设有小酋长，又有村落。陈棱等后来回到福建。这是中国人继续从事大规模开发台湾的活动。据《隋书》记载：本地“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树木有枫、栝、樟、松、槐、楠、杉、梓、竹、藤、果、药，同于江表。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

大陆与台湾社会经济生活的联系，自汉代末年以来，大抵没有间断过，孙吴以后，在东晋、宋、齐、梁、陈各朝的统治范围都只限于南方，必须发展海上贸易，来补充本身经济力量的不足，《南齐书》记载南朝海上的通商情况，是“舟舶继路，商使相续”。隋、唐南方海上，交通继续发展，隋时造船技术已很高，自广州至波斯湾的运输，主要靠中国商船。台湾在海上大量贸易中有一定的地位。《隋书》卷六十四《陈棱传》说：陈棱等人初到台湾，当地居民看见船舰，以为是商人，都去做生意。证明台湾与大陆民间通商贸易已早成习惯。当时中国大陆用于对台湾交换的，有各种手工业产品。在台北，考古学者发现有一种属于三国时代的指掌型古砖，台南也有唐、宋时代的瓦瓶、古钱等器物。这足以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十二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朝的建立

隋文帝的次子杨广，先靠阴谋手段，骗取了隋文帝对他的信任，后又杀死了隋文帝。自己当了皇帝，这就是隋炀帝。杨广统治时期，大兴土木，穷兵黩武，荒淫无道，使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好好的一座隋朝江山，被他弄得乌七八糟，最后在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隋炀帝一登上皇帝宝座，就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征调民夫二百万，把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各种奇材异石运往洛阳。据史载：从江西运一根大木柱，就用几十万民工。他在洛阳西郊修建了一个大花园，叫做西苑，周围二百里，苑内有人工海和渠。海中筑山，山出水面一百多尺，山上建有台、观、殿、阁，十分华丽。沿渠有十六院。秋冬季节，院中花木凋落，就用各种绫罗剪成花叶，缀在枝上；水池内也用彩色绫罗做成荷、菱、

葵、芡，真是四季常青。新洛阳城在洛阳城之西，规模宏大，周围五十五里。隋炀帝把原洛阳城的居民和各地富商大贾，迁徙到那里居住。这时京城虽还在长安，但隋炀帝却常住洛阳，洛阳是实际的政治、军事和漕运中心。

说到漕运，就联系到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的确对于祖国文化、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它也的确费工太大，施工又急，前后征调民伕达三百多万人，使人民深受徭役之苦。

隋炀帝开运河，本身的目的是为了他游玩，他经常在江南巡游，在位十几年间留在京城的时间总共不到一年。每次巡游，跟随他的人有二十万，乘坐的船绵延达二百里，仅拉纤民伕就征用了八万人。需用食品由沿路百姓“献食”，皇帝、妃嫔和大臣吃尽山珍海味，州、县官撑饱了自己的腰包，却榨乾百姓的脂膏骨髓。

无休止的劳役和越来越重的赋税，已经把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但隋炀帝为了炫耀武功，又于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发动了对高丽的不义战争。接着在九年、十年，又两次侵入高丽。第一次侵高丽，陆军就有一百一十三万人，分二十四路从涿郡出发，指向辽东。由隋炀帝亲自带领，水军从东莱海口出发，由来颢儿率领。成百万的民伕，无数车辆、船只不分白天黑夜，不断由南向北，为隋炀帝运粮草。可因为高丽的坚决抵抗和国内人民的反对，隋军在进到距平壤三十里的地方，因粮尽不得不退兵。撤退时，又受到高丽军的四面包抄，结果隋军大败而回，逃到辽东城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支差的民工死在半路的尸体到处都是。

繁重的徭役和兵役，使人民无法活下去。就在隋炀帝第一次入侵高丽的前一年，邹平（今山东省邹平）人王薄写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歌中说：“忽闻官军至，捉刀向前伤，譬如辽东死，砍头何所伤。”王薄首举反隋大旗，山东、河北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逐渐汇合成三支强大的集团：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和杜伏威、辅公拓（shí石）领导的江淮起义军。

瓦岗军由翟让领导在河南瓦岗（今河南省滑县南）起义，大业七年至十年，（公元611年至614年），在瓦岗驻扎。后来，贵族李密投入这支队伍，成为领导成员。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用诱敌深入，伏兵袭击的战术，在蒙阳（今河南省郑州）大海寺杀死隋大将张须陁（tuó陀），一举歼灭隋在河南的主力军两万多人。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春，瓦岗军攻占隋大粮仓洛仓，把粮食散给农民。接着，在洛阳附近又歼灭隋军几万人，缴获大量军需品。瓦岗军队伍迅速发展几十万人，控制了黄河以南和淮河以北的许多州县。他们发布文告，历数隋炀帝罪行，号召广大人民起来推翻隋朝统治。

随着瓦岗军的发展壮大，李密的野心不断膨胀，他妄图利用农民起义军力量，成自己帝王之业。他逐渐篡夺了起义军领导权，引起了起义军将领的不满。公元617年十一月，王儒信等将领劝翟让剥夺李密的军权，翟让没有采纳，结果反遭到李密的杀害，从而李密窃取了瓦岗军的全部领导权力。公元618年，李密因为军事失利，竟然先降隋，后又投降李渊。李密在瓦岗军初期，的确起过较大的作用，但在后期与翟让闹分裂，杀了翟让，结

果，瓦岗军力量也削弱了，最后瓦岗军失败，李密自己也被他人所杀。

①②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有十几万人，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河北起义军歼灭了薛世雄率领的，企图解救洛阳之围的三万隋军，支援了瓦岗军。接着攻占了河北大部分郡县。窦建德在公元618年建立了大夏政权，第二年建都洛（míng明）州（今河北省永年）。

杜伏威和辅公柘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最初在山东活动，后来向洛阳发展，以盩厔（今安徽和县）为中心展开斗争，成为南方反隋的一支主力军。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在农民起义军蓬勃发展之时，隋朝大官僚李渊乘机在太原（今山西太原）起兵，乘关中空虚，占领了长安。

大业六年（公元616年）以来，隋炀帝就在江都。江淮起义军控制了江都外围地区以后，他更惶惶不安，对镜自语：“好头颅该由谁来砍啊！”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隋炀帝被他的侍卫将领宇文化及杀死。隋炀帝杨广的残暴统治结束了，隋朝也灭亡了。

杨广被杀的那一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唐朝，李渊就是唐高祖。唐高祖同他的儿子李世民镇压了多支农民起义军，又消灭了各地割据的势力。轰轰烈烈的隋末农民大起义，本身虽然失败了，但也推翻了隋王朝，并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士族势力，大批的农民和奴婢在斗争中获得解放，进一步削弱了农民对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的依附关系，为唐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十三 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唐高祖即位以后，封李建成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在灭隋和镇压农民起义军、平定割据势力的斗争中，秦王李世民功劳最大，且有勇有谋，手下更有一批人，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武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勇将。太子李建民知道自己力量敌不过李世民，就与李元吉联合，排挤李世民。李建民还在高祖宠妃前讨好，可李世民却不理这些妃嫔。唐高祖听信宠妃的话，也渐渐与李世民疏远起来。有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喝酒，李世民酒后呕吐不已，幸而未死，李世民意识到这是李建成在用毒酒害自己。后来李建成又拉拢尉迟敬德，遭到尉迟敬德的拒绝，他又派人去刺杀尉迟敬德，也未成功。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突厥进犯中原，李建成就向高祖建议，让李元吉出征，但却要把秦王府精兵及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拨归李元吉指挥，这明明是要削弱李世民的势力。事为李世民知道了，就连忙找他舅子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议，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都有些急了，就下决心要杀李建成。李世民为了取得主动权，就在当天夜里，在高祖面前告李建成的状，诉说李建成想谋杀他。高祖决定明天一早，弟兄三人进宫，他亲自查问。第二天（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一早，李世民叫

长孙无忌和尉尉敬德带兵在玄武门埋伏。李建成、李元吉一到玄武门，觉得气氛反常，要转马头就走，李世民高喊：“殿下，慢走！”李元吉拿起弓箭想射杀李世民，但心里一慌，连弓都拉不开，李世民搭弓射箭，射中李建成；尉尉敬德也带七十多名骑兵冲杀出来，一箭射死了李元吉。东宫和齐王府将士听到信息，全部出动猛攻秦王府。李世民一面指挥将士抵抗，一面派尉尉敬德去朝见高祖。尉尉敬德手拿长矛气呼呼地冲进了皇宫，见了高祖说：“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秦王已杀了他们。怕惊动陛下，特派我来保驾。”高祖见事已至此，也没办法，只好听左右大臣的话，宣布了李建成、李元吉罪状，命令将士归秦王指挥。过了两个月，唐高祖让位秦王，自己做了太上皇。这就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从而坐了皇帝。李世民就是唐太宗。

唐朝初年，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月，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

均田制规定，一般农户，年在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受田一百亩，其中水业田二十亩，可以传给子孙，口分田八十亩，受田者身死或年老要交还政府。除“寡妻妾”受田三十亩（当门立户的受田五十亩）外，一般妇女不受田。水业田允许买卖。租庸调法规定，受田的成年男子，每年交粟二石，叫做“租”；每年纳绢两丈，绵三两，叫做“调”；每年服役二十天，不去服役，可以一天交纳三尺绢的办法代役，叫做“庸”；服役超期十五天免调，三十天租调全免。由此而形成了一套封建国家对农民实行的“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赋税制度。

唐初均田令所规定的受田数，在宽乡如有剩田，只要经过中陈立案手续，“所占虽多，律不与罪”。有利于在宽乡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均田令取消了奴婢、部曲和耕牛的受田，禁止地主在狭乡“占田过限”。反映了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经济占据着优势地位。这些对唐初农业生产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太祖李世民即位之后，注意到调和地主阶级内部各集团利益，对巩固自己政权的作用，他兼用关陇、关东和江南的贵族和士族，同时，还选拔了不少关东的普通地主，如魏徵、戴胄、马周、李勣等。这些人多数参加过农民起义，对关东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比较熟悉。他们在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封建统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从而社会安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用人方面，李世民一直坚持“用人唯贤”和“取其所长”的原则，因此网罗了一批人才，并使他们的专长尽量得以发挥。李世民还注意到民族间的矛盾，有不少的非汉族首领在政府中担任要职，调和了民族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各民族和睦相处，社会安定。

唐太宗常常回忆隋亡情景，警惕自己不要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大臣魏征劝唐太宗把隋的历史当作一面镜子，节用人力财力，加强封建统治。唐太宗采纳魏征意见，他引用古人的话说：“皇帝好比是船，人民好比是水，水能够载船，也能够把船打翻。”他对人民是既要其为封建国家服役，赋税，又注意到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不能剥削太重。例如有人建议，要把不满十八岁的青年男子，只要身形高大，体格强壮，全部点为府兵。唐太宗同意了，魏征却一直反对。唐太宗生了气，训斥魏征。魏征说：如果把湖水海

干，可以把鱼逮得一干二净，但明年就没鱼了；如果把森林烧光，林中野兽当然没地藏身，但明年也就没野兽了。现在把不够十八岁的青年男子全部点入军队，不留余地，那么以后的租调杂徭将从哪里去征取呢？唐太宗听了恍然大悟，接受了魏征意见，并用很厚的赏赐奖励了魏征的直言劝谏。

隋末农民战争猛烈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使农民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改善，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发展。唐代的均田制，使农民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纳绢代役的规定，使农民生产时间比较有保障。再加上政治比较清明，措施有力，社会安定，所以唐朝初期经济繁荣，经济繁荣了，又反转回来使社会更加安定。据史载，贞观四年，全国大丰收，流散在外的人都返回乡里，以后又年年丰稔，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对唐太宗时期这一盛况，史称“贞观之治”。

现在再讲一讲唐时长安的情况。唐朝首都长安，是全国政治中心，又是亚洲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长安城东西宽约十五里，城的周围有七十多里，城的北部。当中是宏伟的宫城和皇城。宫城是皇帝居住和处理国政的地方，里面有十几座宫殿，还有帮助皇帝处理国政的中书省和门下省。皇帝在宫城的南边，里面有政府的官署，其中最主要的是尚书省和御史台。尚书省是执行政务的最高机构，下面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御史台监察中央和地方的官吏。在皇城外，有国子监，里面设立“国子学”、“太学”等学校，是贵族、官僚、地主子弟读书的地方。皇城的南边有朱雀大街，宽阔平坦，是长安南半部的中心线，把南城分成东西两半。东城有东市，西城有西市，是繁华的商业区。市里有很多店铺，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叫做“行”。仅东市就有二百二十行，几千个店铺。市的四面有很多邸（di抵）店，供客商居住和存放货物。

长安新开的广运潭，梁泊着从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几十郡到达的船只，船上满载着各地特产。此外，各地物质还通过陆路源源运到长安。

朱雀街东面的大雁塔，高一百八十尺，雄伟壮丽。登塔俯瞰长安城，可以看到玲珑的宫殿，繁华的市街，林立的船桅（wéi桅），奔驰的车马，成群的人流，长安的这一景象反映出了唐初经济的繁荣。

三十四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长达一千三百多年，对封建时代的文化教育、官僚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都曾经发生过深刻影响。

科举制度创立于隋、唐。在汉代，实行的是“察举”和“征辟”，由州、郡等地方长官对本地方人进行考察，选拔人才，以孝廉、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等名目推荐给中央，进行考核，任以官职，这就是察举；如果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叫做征辟。到了魏时，实行“九品中正制”，各州、郡设立“中正官”，由“贤有识鉴”的官吏担任，对本州、郡的人物分为九等，中央根据中正评定的等级，授与官职。结果出现了

“门阀士族”。

隋统一中国后，曾一度实行“九品中正制”（当时叫九品州郡），但很快就又取消了。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七月，“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督、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诏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诏四科举人。这二科举人、十科举人、四科举人，虽只是偶一行之，并没有成为一种制度，但科举这一名称，却和分科举人有关。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在中国选举史上揭开新的一页，科举制度从此开始了。

唐王朝建立后，继续进行科举取士，这一制度才更加完善起来。唐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每年分科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称制科。常科和制科性质不同，在考生来源、考试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很大差异。

常科考生，来自生徒和乡贡。生徒是中央和地方的学校，每年冬天考试合格送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学生；乡贡，是不在学校学习而学有成就的人，向州、县“投牒自举”，经考试合格，由州送尚书省参加考试的。这些考生随各州进贡物品解送，所以称乡贡。

常科的科目有十二科，但有的不为人重视，有的并不经常举行，有的要求过高，所以重要的科目只有明经、进士两科，两科考试内容不同，也时有变化，而其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录取名额，明经远比进士要多。一般进士科得第的只占应考人数百分之一、二，明经科却占十分之一、二。明经科得第的，每年有一、二百人，进士科得第的，有时只有几人，最多时不过三、四十人。所以当时流传一种说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知名人士推荐。因此考生纷纷走于名公巨卿之门“投卷”，向礼部投献作品的称“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献的称“行卷”。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

进士及第，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当时人称为“登龙门”。发榜之后，有曲江会、杏园宴、雁塔题名等活动。进士们的曲江大会，有时皇帝还登紫云楼垂帘观看。达官贵人也往往在这时挑选女婿，以致曲江一带车马填塞，热闹非凡。

常科登科之后，并不立即授官，还要经吏部考试，这种考试，叫“省试”或“释褐式”。考试合格，才能授官。或者经地方长官如节度使、观察使等推引，先做他们幕僚，然后才由中央政府授官。这和后代的情况不一样。

制科，是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在唐代，名目繁多，据说多到八十六科，其中最著名的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应科的，可以是得第得官的，可以是登过常科的，也可以是庶民百姓。制科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尽管如此，制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是不如进士科。

常科、制科之外，还有武举，是由兵部考试。考生和明经、进士的乡贡一样，由各

州举送。武举，在人们心目中并不重视。

科举做为一种取士的制度，从隋朝开始，到唐太宗时才固定下来。以后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其具体办法各朝虽有很大不同，但做为一种制度说，其性质应该说是从隋、唐开始。这种科举制度，与汉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制比较，是要进步、合理、更符合历史发展要求一些，也为一些庶民百姓打开做官登上政治舞台之门。所以它不仅没有在豪门世族的诅咒声中消亡，反而一天一天地巩固起来。当然，科举制度也有许多弊端，特别是到了宋、明之后，就蜕变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

三十五 “天可汗”和文成公主入吐蕃（60幅）

唐朝时，在祖国边疆居住的少数民族，主要的有：在西北的突厥（jùé决），在北方的回纥（hé和），在东北的靺鞨（mò hé末贺），在西南的吐蕃、南诏，在台湾的高山族等。他们的辛勤劳动为祖国边疆的开发做出了贡献。在唐前期，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也出现了空前的盛况。在唐京城长安，各个民族的首领、官员、商人等不断来往。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讲一下唐太宗李世民的民族政策。

（一）在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府，由各民族首领自己治理其地区。

唐时对归附或被征服的民族和地区，设都督府，其次为州，再次为县，都督、刺史、县令都由兄弟民族自己的首领担任，并按其民族的习惯，可以世袭，却须接受唐的册封，通行唐历法，定期向唐中央作象征性的朝贡，但户籍与唐不发生关系，也不向唐交赋税。各羁縻州府均仍保持其本民族风俗习惯和组织结构。在有的羁縻州府之上，设大的行政机构都护府，代表中央行使主权，管理边防和处理民政事务。都护由中央直接任免。李世民时曾设有燕然都护府，管理北方民族事务；安西都护府，管理中亚民族事务。到武则天时代，都护府增至六个。唐玄宗李隆基时，全国共有羁縻州府八百五十六个，其范围远远超过唐帝国的本土。

（二）大力推行和亲政策。

唐以前也实施过和亲政策，但那是由于王朝本身虚弱，被迫嫁女以求和亲的。李世民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因突厥人一部逃往漠北依附薛延陀，唐朝廷讨论应如何对付。李世民说：“方法只有两个：一是举兵讨伐，一是公主出嫁。只要对人民有利，我决不爱惜一个女儿。北狄风俗，政治多由后妃操纵。公主出嫁，生了儿子，就是我的外孙。外孙作可汗，就不会侵犯中国了。所以公主出嫁，可以保证北方三十年无事。”原突厥处罗可汗的儿子阿史那社尔自高昌降，李世民把自己的妹妹衡阳（一作南阳）公主嫁给了他，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入朝，李世民将弘化公主嫁给了他，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入朝，李世民又将文成公主嫁给了他。其他在唐任职的少数民族首领，有的也娶了公主。如突厥人执失思力娶李世民妹妹九江公主，铁勒

人契苾（bī必）何力娶同宗临洮县主，突厥族阿史那忠娶定襄县主。每次公主出嫁，常常伴随大批人员、物资、文物典籍等而去，紧接着是少数民族的使者、学生、物产源源而来。这样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各族人民关系日益紧密起来。

（三）开辟路，通互市，接纳客使，兼收并蓄。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应北方铁勒诸部的请求，北自回纥，南至突厥，开一大道，称“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驿站六十八所。吐蕃自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以后，自逻些（今拉萨）至长安也开设驿站，来往人员不绝。由于交通的发展，贸易也就频繁。少数民族的商人、学者、传教士、歌舞人大量进入我国内地，唐政府都欣然接纳。

在这样正确的民族政策下，国内各族之间的联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一些外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的使者、商人、留学生也源源而来。每当正月初一，各国和各族的使者都来参加朝会。各色各样的肤色相貌，各色各样的衣着服饰，各色各样的风度和语言，各色各样的音乐舞蹈，在长安宫城南的顺天门门楼上展现出来。如此盛况，是历史上其他朝代所不曾有过的。

李世民的民族政策，使许多少数民族为之“感恩戴德”。北方各族君长到长安，一齐尊奉李世民为“天可汗”。李世民说：“我做大唐天子，还要处理可汗事务吗？”各君长高呼万岁。从此以后对少数民族发布命令，都以“天可汗”的名义下达。突厥首领阿史那思摩奉命移居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他上表说：“臣受唐家恩德，愿子子孙孙作唐家一犬，守吠北方门户。”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铁勒诸部酋长来朝，次年，以铁勒各部为羁縻州府，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和刺史，并赏赐金银、绸绢和缙袍。各部酋长手捧头戴，欢呼拜舞，以表感激之情。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留居长安的各族使者和官员数百人，放声大哭。有的剪发、髡（shā）面、割耳，流血洒地。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闻讯，请求杀身殉葬。松赞干布来信说：“先皇晏驾，天子新立，臣子有不忠者，我帅兵赴难。”

李世民自己说：“自古以来都贵中华，轻视夷狄。但我却同样看待，爱之如一。因此他们象对待父母一样，都来归附。”李世民的民族政策，就是他对各民族“同等看待，爱之如一”。

松赞干布是吐蕃王，他羡慕唐帝国，一心向唐求婚。可是他第一次派使臣求婚未被允许，使臣怕松赞责备他不会办事，就撒谎说：“唐天子本要答应把公主嫁给我们，可因吐谷浑王也去求婚，才又把我们的婚事给担搁下来。”松赞干布当即怨恨吐谷浑，就出动二十万人马，进攻吐谷浑。松赞打败吐谷浑，又乘胜进攻唐的松州（今四川松潘）。唐太宗派大将侯君集反击，吐蕃将士劝松赞干布退兵，前后有八个大臣因劝说不听愤而自杀。后来松赞干布又被唐打败于松州城下，才引兵归还，向唐谢罪，同时恳请准婚。唐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

松赞干布准备了丰厚的聘礼：黄金五千两，宝物珍玩数百件，命大相（宰相）禄东赞赴长安纳聘。禄东赞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十月到达长安，得到诏准婚。

决定以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

据说，禄东赞是个十分聪明的人，至今青藏高原还流传着一个“唐太宗五难求婚使”的佳话，当时各国来求婚的使者很多，唐太宗下了一道命令，要前来求婚的使者先解答五个难题，答上来的才能得到和亲。第一题是要把一根很细的丝线，穿过一颗有九曲孔道的明珠。禄东赞把丝线系在一只蚂蚁的腰部。蚂蚁带着丝线，爬过了明珠的九曲孔道。第二题是把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小马驹放在一起，要辨认出哪匹马驹是哪匹母马生的。禄东赞把母马和马驹儿分开关了一天，断绝了驹儿的饲料和水，第二天，再把它们放在一起。饿荒了的马驹儿分别奔跑到自己母亲那里去吃奶。禄东赞通过一道道考试，最后一题是要从二千五百名美貌年青的女子中，找出谁是文成公主。禄东赞凭他敏锐的眼力，一下子就把那仪态大方的文成公主认出来了。这个传说不大可能是事实，但却反映了吐蕃人民对唐友好的愿望，和对完成这一使命的使者的赞美。

为了等候文成公主启程，禄东赞在长安住了三个月。曾受到文成公主多次召见，文成公主了解到吐蕃的物产、风俗。为此，她特地带了吐蕃所缺的蔬菜种子及其他谷物种子，以及佛经、儒学经典、史籍、诗文、农艺、医药、历法、工技等各种书籍，从而把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介绍到了吐蕃。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一月一日，二十四岁的文成公主准备周全，择日启程。在唐太宗族弟江夏王李道宗（据说是文成公主生父）的护送下，动身去吐蕃。唐朝廷备了丰富的嫁妆；文武百官出郊欢送，浩浩荡荡离开长安。从唐朝国境到吐蕃，一路上都有人准备好马匹、牦牛、船只、食物接送。松赞干布亲自从逻些赶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或札陵湖）迎接。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婚礼结束后，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越过雪山高原，到了逻些城。公主入城那天，逻些人民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松赞干布还在逻些按唐的建筑格式，为公主专门建造了一座城郭宫殿，给公主居住。

文成公主所带来的随从人员和工匠，向当地人民传授平整土地、开挖畦沟、加筑田塍等耕作方法，以及安装水磨、纺织、刺绣等技术。至今藏族人民还传说他们的纺织、刺绣是文成公主所教。

为了进一步学习中原文化，吐蕃派来许多贵族子弟到唐朝学习诗书，后来来唐的一些吐蕃使臣能通汉文，写汉诗，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四十年，她为汉藏两族人民友好联系和发展藏族经济文化作出了大的贡献。直到现在，在西藏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还保存着文成公主的塑象。

三十六 安史之乱

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逝世，他的儿子李治继位，是为唐

高宗。李治在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从尼寺里取太宗的幼妾武则天入宫，大加宠爱。第二年，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高宗性格昏懦，率而在天徽六年（公元655年）前，政权执掌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贞观老臣手中，在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后，刚强机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干预了朝政，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政权全归武则天掌握。这样，贞观时期的繁荣昌盛，得以保持、巩固。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病死，唐中宗李显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公元684年，武则天废唐中宗为庐陵王，立李旦（唐睿宗）为皇帝，武则天仍以母后名义临朝称制。公元690年，僧法明等十人献《大云经》四卷，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作天子。接着唐睿宗等六万余人上表请改国号。武则天宣布改唐为周，立称号为神圣皇帝。她经过三十六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得到了皇帝称号。一直到公元705年，八十二岁的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等，拥唐中宗李显复位。就在这一年十一月，武则天病死在上阳宫。遗制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又回到李家来当先妣。

武则天是我国封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过去因为她是个女人而当皇帝争论不休，我们从她参政和当政的五十年的历史来看，特别是在“纳谏”和“用人才”这两点来讲，就是一些具有封建正统思想的人，也对之赞叹不止。五十年内，使贞观以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仍在继续，唐前期强大的国力日益巩固，对于后来玄宗“开元之治”的全盛时代，实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公元705年，武则天死，以后的八年政局动荡不定。公元712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李隆基，这就是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其重要党徒数十人，其余党一概黜逐出朝，唐玄宗切实掌握了朝政。唐玄宗励精图治，曾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用人和纳谏上。他所用的宰相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纘（hónq洪）、杜暹、韩休、张九龄等，都是历史上的名相，都能直言谏诤，补救缺政。开元时期（公元713—741年）唐朝达到极盛的顶点，史称“开元之治”。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一诗中描写当时的繁荣景象说：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可是唐玄宗李隆基在盛世面前，滋长骄和侈两个恶性。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他任用了“口蜜腹剑”的奸佞之人李林甫为宰相，勾结宦官、嫔妃，探听玄宗动静，以争宠固权，又重用番族为将，使安禄山等掌重兵。李林甫在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死，又任用纨绔无赖子、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为宰相，身兼四十余职，结党营私，贿赂公行，而唐玄宗李隆基又宠幸杨贵妃，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终日沉溺于《霓裳羽衣曲》的歌舞声中，纵欲享乐，不理朝政，政治日趋腐化，终于酿起了“安史之乱”。

唐初实行均田制，官民占有土地数量悬殊，允许土地买卖，为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留下机会。玄宗时，土地问题越来越严重。史书记载：“开元、天宝时期，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过于东汉成帝，哀帝时期”。均田制破坏使府兵的来源日渐枯竭，“兵农合一”的府兵制瓦解了。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玄宗正式改行募兵制。镇守边防的军事将领节度使（即藩镇），以加强边防为名大量招募士兵，并把军队变为私人武装。又由于边疆不断发生战争，各节度使受到唐王朝的重视，他们不仅拥有重兵，还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在这些节度使中，唐玄宗特别看中了平卢（治所在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安禄山。后来就让安禄山兼任了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节度使，安禄山很会耍权术，在玄宗面前故意表现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他长得又胖又矮，肚子特大。有一次玄宗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这么大的肚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安禄山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颗为陛下赤诚，愿意为陛下死的心。”唐玄宗听后禁不住高兴地笑了。玄宗为安禄山造了一座府第，封他为郡王。安禄山还认玄宗宠妃杨贵妃为义母。可是，他暗中却在范阳城北筑起一座雄武城，贮兵器，积粮谷，蓄战马，阴谋叛乱。

安禄山与节度使哥舒翰不协，与宰相杨国忠（杨贵妃族兄）也有矛盾。安禄山蓄谋反叛唐中央已久，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正好有个官员从长安到范阳来安禄山假造了一份唐太宗的诏书，召集将士宣布说：“接到皇帝密诏，要我立即带兵进京讨伐杨国忠”。第二天一早，他就发动十五万人马，打着“清君侧”的名号，从范城向南出发，经河北、山西，攻入河南。禁卫中央的神策军听到安禄山反叛朝廷，大军打过来了，吓得浑身打战，连甲冑都穿不上。唐玄宗赶快募兵抵抗，可是募来的兵既乏训练，又无斗志，开到前线，每战必败。第二年春天，安禄山就占据了洛阳，登上皇帝宝座，国号燕。不久安禄山又很快打倒了潼关。哥舒翰与安禄山在潼关相持了半年，叛军攻不进潼关。可是杨国忠在玄宗面前鼓动玄宗命令哥舒翰带兵出关迎敌。哥舒翰明知不能出关，但不敢违背皇帝命令，痛哭一场，出关迎战。哥舒翰二十万大军一出关就中了叛军崔乾祐埋伏，大败而回。二十万大军只剩下八千，哥舒翰也被俘。潼关失守，长安告急，唐玄宗带着杨贵妃、杨国忠等逃出京城，奔向四川。

出了长安，第三天到了马嵬（wēi 围）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发生兵变，羽林禁军拦住杨国忠马头，大喊“杨国忠造反了！”杨国忠慌慌张张想逃命，几个士兵赶上去，就砍下了他的头。士兵们仍然吵嚷不肯散去。唐玄宗派高力士找陈玄礼。陈玄礼说：“杨国忠谋反，贵妃也不能留下来。”这可把玄宗难住了，唐玄宗左思右想，为了保自己的命，只好狠心，叫高力士带领杨贵妃到别处，用带子勒死她。兵变总算平息了，唐玄宗如惊弓之鸟，急急忙忙逃到成都。

唐玄宗跑了，叛军顺顺利利进入长安。沿途掠夺，自不待说，入长安后更纵兵大抢三天，长安城里一片火海，黄河中下游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唐玄宗跑到四川后，太子李亨从马嵬驿收拾队伍回军北上，到了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位称帝，这就是唐肃宗。

安祿山叛軍不得人心，河北人民紛紛起來，打擊叛軍。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顏杲（qǎo稿）卿、平原（今山東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聲討叛軍。叛軍聞訊，停止西進。叛軍將領史思明攻破常山，顏杲卿被執，至死罵不絕口。顏真卿大破叛軍，攻克魏郡（今河北大名縣西），軍聲大振。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又克復常山，擊敗史思明。朔方節度使郭子儀也驅兵常山與李光弼會合，史思明大敗。

在河南地區，張巡堅守雍丘（今河南杞縣）六十多天，打退叛軍三百多次。日子長了，張巡部隊沒有箭了，他就定下“草人借箭”之計。趁着黑夜，綁了千多個草人，從城上往下放。叛軍以為是部隊出城襲營，就連忙放箭。在千多個草人身上插滿了箭，軍士一點，竟有十萬支。過了幾天，叛軍又見城上往下放人，叛軍以為又是草人，竟不防備，誰知這次是五百戰士襲營，叛軍大敗。叛軍接連中計，又集中兵力攻城。張巡部將雷萬春在城頭上指揮守城，連中六箭，為安撫軍心，忍痛屹立不動。叛軍又以為是木人。後來知道這屹立不動的“木人”是雷萬春，叛軍人人驚叫。

過了一年，睢（suī）陽（今河南商丘）太守許遠向張巡告急，張巡又移兵睢陽與許遠共守睢陽。叛軍十三萬猛攻睢陽，張巡和許遠合兵才六千人。叛軍援兵還接連而來，張、許等孤軍守城，屢敗叛兵。一次，張巡設計令部將南霽雲一箭射中叛軍主將尹子奇左眼，打了個大勝仗。城外兵越聚越多，城里兵越打越少，後來只剩下一千六百人。又斷絕了糧食，士兵們都餓倒了。南霽雲闖出敵營，去臨淮（今江蘇睢寧西北）借兵。臨淮大將賀蘭進明怕叛軍，不僅不借給兵，還想留下南霽雲。賀蘭進明請南霽雲飲宴，南霽雲流着眼淚說：“睢陽軍民一月多沒進一粒米了，我怎忍心在這裡吃飯？”就咬下一個手指，說：“霽雲不能完成主將交給的使命，只好留下手指作證。”南霽雲離開臨淮，從別處借到三千兵士，帶着人馬，直闖包圍睢陽的叛營。張巡聽到城外殺聲震天，連忙打開城門，接應南霽雲回城。張巡等仍死守睢陽，吃樹皮、戰馬、麻雀、老鼠，最後全城只剩下四百人，餓得連弓都拉不開了。睢陽城終於陷落，張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名將領全部被俘。叛軍勸降不成，把他們拉到殺場上。張巡臉朝南霽雲說：“南八（南霽雲排行第八）！男子漢死就死了，不能屈服於叛賊！”南霽雲回答說：“張公放心，我不會怕死！”他們痛罵叛賊，慷慨就義。

睢陽陷落的第三天，河南節度使張鎰帶救兵到了睢陽，打退叛軍尹子奇。又過了七天，郭子儀收復了洛陽。由於張巡軍堅守睢陽，保衛了江淮地區，使這一地區沒有受到叛軍的騷擾。

再說整個戰區。唐肅宗李亨用郭子儀、李光弼，集合朔方、隴右、河西、安西、西域軍，又得回紇兵幫助，於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收復了長安，十月收復洛陽。在此之前，安祿山已被其子安慶緒殺死。唐收復洛陽，安慶緒逃往鄆城（今河南安陽）。第二年，肅宗又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使進攻鄆。史思明從范陽發兵援救安慶緒。唐軍六十萬，九節度使互不相統率，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高居上位，不懂軍事。唐軍既缺乏統一指揮，又糧食不足，士氣低落，上下解體，恰遇大風，沙塵弥漫，交戰雙方，大驚潰散。郭子儀退洛陽，其餘各節度使逃回本鎮。史思明收集

溃军，又回郾城，杀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史思明又取东京，进军西京，唐朝廷大惧。正在此时，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自称皇帝。时为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次年，唐肃宗死，代宗立，任命长子李适（kào括）为天下兵马元帅，并向回纥借兵。与史朝义军在洛阳北部大战，史朝义败逃河北。回纥兵入洛阳，纵兵杀掠。仆固怀恩率朔方等军到河北追击，叛军几个主要将领田承嗣、李怀仙等也投降唐军，史朝义走投无路，自杀而死，战争才告结束。时为代宗应室二年（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前后延续八年之久。

安史之乱平定了，但唐王朝的中央集权力量也削弱了。唐朝廷没有力量消灭安史余部，只得承认降将李怀仙、田承嗣、李宝臣等人在河北地区的统治，任命他们为节度使。这时，不仅边镇，内地也普遍设置了节度使，发展成为藩镇割据势力。后来，各节度使子孙世袭，兵将独立，朝廷竟无能为力。各节度使，有时公开叛乱，有时联合对抗中央，有时相互攻战。有时虽然也暂时归顺朝廷，但基本形势是藩镇割据，一直至唐灭亡。

安史之乱前后延续八年。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战乱，对人民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叛军到处烧杀掠夺，进入长安纵兵大抢三天，长安城里一片火海。黄河中下游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回纥兵进入洛阳，抢劫烧杀，“伤死者万计”。唐军收复河南的州县，硬把河南叫做“贼境”，老百姓财物被抢一空。匪也抢杀，官也抢杀，洛阳周围几百里，不少州县成为废墟。黄河流域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

三十七 宦官专政与朋党之争

唐自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起，至哀帝四年（公元907年）灭亡，共165年，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已经在上题简单谈过了，这里只谈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

唐宦官专权，从玄宗时高力士开始，不过，高力士还不掌握军权。宦官掌握军权是从肃宗时李辅国开始。肃宗以李辅国有拥立之功，用他作判元帥司馬，“宣传诏令，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回到长安后，又让他专掌禁军，一切制敕都经他押署。这样，军政大权就全落在他的手里了。肃宗还用鱼朝恩为统率全军的观容使，其后又让鱼朝恩统率全部神策军。从此，逐渐形成宦官平时掌握中央禁军大权，出师则充“监军”的制度。

为了争夺朝廷大权，宦官中分成党派，互相攻杀，废立皇帝。从肃宗起，唐的皇帝有：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其中肃宗、代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等都是由宦

官拥立的，宪宗和敬宗都是被宦官杀死的。

宦官掌握着军政大权，文武群宦重赂宦官，以求升迁。禁军中的大将，常向巨室富商借贷巨款，贿赂权阉，求为节度使。到镇之后，搜括民财，用来偿债，时人称谓“债帅”。宦官和禁军将士在渭水平原，夺取良田，渔肉乡民。宦官领宫市使，派“白望”数百人在长安东西市和要闹坊强买货物，敲诈勒索，横行不法。

宦官专慈骄横，有的皇帝也很气愤。文宗时想除掉宦官，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就告给凤翔节度使郑注和宰相李训。二人利用宦官王守澄与其手下宦官仇士良的矛盾，先提拔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然后解除了王守澄的兵权，最后用毒药毒死了王守澄。接着又要除掉仇士良。郑注、李训人密谋由郑注选凤翔兵数百人，作为亲兵，等到王守澄下葬时，郑注纵亲兵杀死全部宦官。但李训又觉得如此办了，功劳就成为郑注的了，不如先下手，杀死宦官，再逐走郑注，就可独得大功。李训上朝，使徒党奏称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有甘露。唐文宗令李训率众宦官去察看。李训回来说不象是真甘露，唐文宗故意表示惊讶，令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众宦官再去看。仇士良等前去，李训已先在左金吾埋伏下几百人。仇士良叫禁卫军将军韩约一起去。韩约走到门边，神情紧张，脸都变白了。仇士良发现这情况，正问韩约，忽然一阵风吹来，吹动门边挂的布幕，仇士良发现了里边的埋伏着兵士，马上逃回殿上，劫夺唐文宗进入宫内。李训见阴谋失败，出京逃命。仇士良等入宫，派出神策兵，分路搜捕李训和他的徒党，宰相李训、王涯等以下千数百人被杀，郑注也被杀死。经过这次所谓“甘露之变”，朝廷大权全归北司。文宗也被宦官严密监视起来，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自称受制于家奴，比周赧王、汉献帝还不如。过了五年，公元840年，唐文宗病死，仇士良立文宗兄弟李炎即位，就是武宗。

在穆宗时，唐朝廷内又发生了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牛李党争，这个党争前后又延续了四十年之久。历史上叫“阴党之争”。

还是在宪宗时候，朝廷考选敢直言讽谏的人，当时有两个下级官员参加考试，一个叫李宗闵，一个叫牛僧孺，两个人在卷子里批评了朝政。考官们认为这两个人合乎选拔条件，就推荐给宪宗。可是士族出身的宰相李吉甫，本来就瞧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况且这二人出身低微，竟敢批评朝政，很是生气。宰相嘛，当然说话顶数，就降了考官的职，也没有提拔他二人。

李吉甫死后，他的儿子李德裕仍记着这件事。唐穆宗即位，又举行进士考试，李宗闵有个亲戚应考，被选中了。当时有些人说是考官钱徽徇私舞弊，李德裕也这样说。唐穆宗就降了钱徽的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到外地。李宗闵非常怀恨李德裕，牛僧孺也同情李宗闵。从这以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人称牛党；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人称李党。两党争斗的很激烈。

唐文宗时，李宗闵走了宦官的门，当了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做了宰相。两人打击李德裕，就把李德裕外调为四川（治所在四川成都）节度使。那时，四川附近有个吐蕃（bo播）将领投降，李德裕乘机收复了重镇维州（治所在今四川理县）。

可是牛僧儒却跟文宗说：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上算。朝廷就下令叫李德裕把维州退还吐蕃。李德裕气得要死。后来，有人告文宗说：这是牛僧儒打击李德裕，退出维州实是失策。唐文宗受宦官控制，没有主见。一会儿用李德裕，一会儿又用牛僧儒，两派就象走马灯似的上上下下，一派掌权，一派就遭殃。没主见的唐文宗说：“去河北贼（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牛党、李党都勾结宦官，与宦官狼狈为奸，表现了统治集团的腐朽。李德裕因宦官杨钦义替他说话，武宗即位，就当上了宰相。可是他办事专横，武宗在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病死，宦官立他叔父李忱即位，就是宣宗。宣宗第一天就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过了一年又贬谪到崖州（今广东海南岛），死到崖州。

文宗时，牛李两党并用，每遇议政，争论不休。武宗时，李党当政，牛党主要人物被贬逐岭南。宣宗时，牛党当政，李德裕贬死崖州。四十年的朋党之争方告结束。

三十八 黄巢起义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争吵，再加上皇帝昏庸，特别是懿宗、僖宗一味追求奢侈荒淫的生活，腐朽已极，整个封建统治糜烂不堪，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唐朝末年，土地兼并的现象达到惊人程度，“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地”。大官僚、大地主韦宙的庄园里积存的谷子有七千堆，称为“足谷翁”。宰相路岩的亲信官吏边威的家产，可供唐朝军队两年给养。唐王朝宦官贪污成风，加以赋税繁重，农民倾家荡产，逃亡他乡的越来越多。农民们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只有起来进行武装斗争。

懿宗咸通元年（公元860年），浙东发生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七月，又发生了以卢贽为首的桂林戍兵起义，队伍曾发展到二十万人。这些起义虽都被镇压下去了，但预示着更大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濮州（治所在今河南范县）王仙芝，聚集了几千农民，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侯都统”。同年七月，冤句（今山东曹县北）人黄巢也起兵响应。王仙芝和黄巢都是武装贩运私盐的头头。当时盐税特别重，奸商又抬高盐价，人民穷困，买不起盐，只好吃淡饭。有些穷苦农民，就贩运私盐，日子长了，就结成邦伙，也不时与官兵斗争。所以王仙芝与黄巢和人民有一定联系，并有武装斗争经验。

说到黄巢，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小时读过书，还几次参加过进士考试，却都没有考中。他气愤唐朝的腐败和黑暗，曾写过一首咏《菊花》诗，寄寓自己要起来进行斗争，推翻唐王朝的思想：“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两支起义军不久在曹州会师之后，转战山东、河南一带，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十月，一举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活捉宰相王铎堂弟、汝州刺史王铎

兵锋直指东都洛阳。唐朝廷急调重兵防守洛阳，不料起义军突然挥师南下，在汉水、淮河流域横扫千里。这年年底，兵临蕲（qí）州（今湖北蕲春）城下。

唐王朝图穷计划破产，转而采用诱降手段来分化瓦解起义军。通过王镣的穿针引线，后来派宦官到蕲州见王仙芝，封他“左神策军押衙兼监察御史”。王仙芝“得之甚喜”，准备接受。黄巢听说非常愤怒，他质问王仙芝说：“当初起义，共同立下大誓，要同心协力平定天下。现在你竟然投降当官，叫我们弟兄哪里去？”黄巢越说越气，举起拳头把王仙芝打得鼻青眼肿，广大将士也一拥而上，群情激昂地大声斥责。王仙芝自知理亏，只好认错，赶走唐朝派来的宦官。

怒斥王仙芝无耻叛变行径之后，黄巢和王仙芝毅然决裂，分兵作战。王仙芝流动在江、汉之间，黄巢率军打回山东、河南，所向告捷。唐王朝一面派兵再“追剿”，一面又向王仙芝展开诱降活动。王仙芝再度表现动摇，一时谣传甚多，军心涣散。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春，王仙芝和他率领的五万起义战士，在黄梅（今湖北）被唐军打败，他也被杀死。

王仙芝死后，其余部同黄巢率领的一部合并，在亳州（今安徽亳县）会师。黄巢被推为领袖，称“冲天大将军”，并建立年号“王霸”。

黄巢利用藩镇割据，不相统属的形势，率领起义军开始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山东，打河南，渡过长江，进入江南地区。一举攻下虔（qián）州（今江西赣州）、信（今江西上饶）等州；又开凿仙霞岭山道七百里，转入福建，攻克福州。乾符六年（公元879年），越过大庾岭，到达岭南，攻克广州。在广州发布北伐檄文，宣布唐王朝罪行。

起义军在广州经过短期休整，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十月开始了北伐。在桂州（今广西桂林）编制了数千个大木筏，乘湘江水涨，顺流而下，直抵潭州（今湖南长沙），一天就攻下州城。起义军渡江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转战江西、安徽、浙江，从采石（今安徽当涂）渡长江，进入淮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九月，黄巢率全军渡过淮河，十一月进驻洛阳。十二月，六十万大军开赴潼关，义旗遍野，欢呼声震动河山。攻下潼关，唐王朝吓破了胆，僖宗和宦官头子田令孜（zī）等又学着玄宗的样子逃往成都去了。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五日，起义军将士头系红绸，身披黄甲，手持武器，簇拥着黄巢，浩浩荡荡开进长安，人民夹道欢迎。大将尚让当场宣布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受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起义军入长安后，拥戴黄巢为皇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

但起义军对逃窜的唐僖宗没去追击，使唐朝得到喘息机会。僖宗在成都纠集藩镇力量，又召来沙陀贵族，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向长安反扑。中和二年（公元882年）黄巢部驻守同州（今陕西大荔）的大将朱温，竟又叛变降唐。长安城被包围，形势开始恶化。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四月，黄巢撤退到河南。黄巢在陈州（河南淮阳）外围掘五道壕沟，集中全力展开攻坚战，击战三百天。朱温、李克用沙陀兵来援陈州，起义军与李克用沙陀兵在中牟激战失败。中和四年（公元884年），黄巢率起义军千人，

退到山东泰山狼虎谷，英勇牺牲。

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奋战十年，行程几万里，席卷大半个中国，一度占领唐首都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这次农民战争，虽然被唐镇压，但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瓦解了唐王朝的统治，基本摧垮了魏、晋以来的士族势力。从此以后，出现了“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新情况。士族势力的消灭，有助于历史进步。

三十九 “李天下”和“儿皇帝”

唐朝镇压了黄巢起义以后，分裂形势更严重了。当时在黄河流域争夺最激烈的割据势力是沙陀族李克用和农民起义军的叛徒朱温，在南方的一些节度使也拥兵自立。朝廷内部宦官和官僚分别勾结藩镇为外援，展开尖锐斗争。

唐僖宗病死，昭宗李晔想依靠朝臣反对宦官，结果昭宗被宦官软禁起来。宰相崔胤勾结朱温尽杀宦官，但从此朱温却拿了大权，唐昭宗日子更不好过。朱温挟持昭宗从长安迁都洛阳，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朱温杀昭宗，另立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李祝做傀儡，就是昭宣帝（哀帝）。朱温又把三十几名朝臣集中起来杀掉，扔到黄河里。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为皇帝，国号为梁，历史上称为后梁。历时290年的唐朝结束了，出现了五代十国各自独立的局面。

朱温建立了后唐以后，李克用气得要死，他把儿子李存勖（xù）叫到床边，可吟说：“朱温是咱的冤家，不说你也知道；刘仁恭是我保举他上去的，可是他投靠了朱温；契丹曾和我结为兄弟，结果撕毁盟约，翻脸不认人。这几口气没出，我真是死不瞑目。”亲手交给李存勖三支箭说：“这三支箭给你，你要牢记这三个仇人，给咱家报仇。”

李存勖和朱温打了几次大战，把五十万梁军打得大败，朱温又羞又气，一病而死去。接着李存勖又攻破幽州，活捉刘仁恭和其子刘守光。又过了九年，大败契丹耶律阿保机。朱温死后，李存勖又跟梁打了十多年仗。公元923年，李存勖灭梁，统一北方，建立了唐，史称后唐。李存勖就是唐庄宗。

唐庄宗认为敌人已经消灭，就贪图享受起来。他最喜欢看戏，自己也常常粉墨登场，称帝后仍与优伶同台唱戏，还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李天下”。有一次在台上演戏，他连呼“李天下、李天下”，一个优伶上去打了他两个嘴巴，大家都吓坏了。这个优伶笑嘻嘻地说：“理（李）天下的人只有一个，你怎么叫两个。”他挨了打反而高兴，厚赏了这个伶人。伶官出入朝廷，在宫内与皇帝戏耍，侮辱朝臣，群臣愤恨，不敢作声。最受宠信的伶官名景进，替李存勖探听宫外事情。李存勖依靠伶官作耳目，所听见的多是颠倒的事物。他使宦官、伶官去掠夺民间美女，他从魏州回洛阳，用牛拉着抢来的美女一千多人。他还任用伶人作刺史和亲兵的指挥官。唐庄宗用伶官和宦官作耳目心腹，所有朝官、武将以及军心都和他分离了。他对人民重敛急征，加以连年战争，民不聊

生。后来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受到将士拥护，唐庄宗开始意识到自己失去人心，想用钱收买军心，卫士们说：“太迟了，谁也不会感谢你。”他的亲军指挥使郭从谦，原来也是个伶人，因唐庄宗曾杀死郭从谦的叔父郭崇韬，就发动亲军政变，攻进皇室。一支流箭正好射中了他，“李天下”死了。李嗣源在公元926年做了皇帝，就是唐明宗。

唐明宗有两员大将，一个是他儿子李从珂，一个是他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明宗死，从珂当了皇帝，就是唐末帝，两人矛盾公开化、尖锐化。李从珂派几万人攻打石敬瑭的晋阳城，石敬瑭抵挡不住。有个叫桑维翰的人就给石敬瑭起草了向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求救信。表示愿认比他小十岁的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为父亲，并在打退唐军后，把雁门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省北部）土地献给契丹。石敬瑭的无耻卖国活动，使他的部将大惊。刘知远说：“向契丹求救，称臣还说得过去，拜他为父亲，未免过份；再说，答应给他们一些金银财宝还不要紧，不该割让土地啊！”石敬瑭听不进去，急急忙忙派桑维翰带了卖国条件去见耶律德光。契丹早就想夺取河北，但无夺取实力。石敬瑭出卖十六州给契丹，从此河北大平原无险可守，河东也仅存雁门关一处险要，契丹显然占据了地理优势。以后契丹，女真、蒙古统治者相继取得南攻的胜利，先占十六州有重大作用的。石敬瑭卖国的毒，一直流了四百年。

石敬瑭依靠契丹的支持，带兵南下攻打洛阳。李从珂意志消沉，不敢抵抗，竟在宫里烧起一把火，带着一家老少投火自杀。公元936年，石敬瑭进了洛阳，正式做了皇帝，国号晋，史称“后晋”，并由洛阳迁都开封。他做了七年儿皇帝就病死了。他的儿子石重贵对契丹耶律德光称孙，不称臣。耶律德光认为这是不敬，又带兵进犯中原。公元947年，耶律德光打进汴京，自称大辽皇帝。辽兵到处抢劫，叫做“打草谷”。中原人民纷纷组织义兵反抗辽兵。耶律德光害怕了，才又退回去。这时刘知远在晋阳称帝，国号汉，史称“后汉”，刘知远就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乘辽军北退，率大军从晋阳经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新绛），只用了二十一天，进入洛阳，又八天，进入开封。

汉政治更混乱，立国不足五年，就为后周所代。后周在公元951年立国，建国者为郭威，就是后周太祖。梁，是武夫做皇帝，继之而起来的唐、晋、汉三个小朝廷，都是沙陀族，也都是武夫做皇帝。朝政十分混乱。只有后周郭威，还较为留心收拢人材，李谷管财政，魏仁浦、王浦、苑质参与机谋，取帝位和治国，多赖文人相助。改革了过去好杀的蛮风，对朝政有些初步改革。郭威无子，公元954年死后，义子郭荣（本姓柴）继位，就是周世宗。周世宗在周太祖革弊的基础上，一面继续改善政治，一面训练军队，开始进行统一战争，推动历史又前进了一步。但他也只在位六年就死了。周先后只有十年，但却开辟了统一全国的道路。

自公元907年梁太祖称帝，至公元960年周亡，先后五十四年，经历了五个朝廷。梁十七年，唐十四年，晋不足十二年，汉不足五年，周不足十年，说明政权极不稳定。此外在南方存在过吴、南唐、吴越、闽、楚、南平、前蜀、后蜀、南汉等九个割据政权，再加上山西中部的北汉，共有十个割据政权。所以这一时期称为“五代十国”。

四十 黄袍加身和杯酒释兵权

后周世宗在公元959年病死，他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才七岁，实际大权集中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手中。

公元960年春节，后周朝正在举行朝见大礼的时候，忽然接到边境送来的紧急战报，说是北汉主和辽国联合，出兵侵犯边境，大臣们慌作一团，宰相范质作主，派赵匡胤带兵抵抗。

赵匡胤奉命带领禁军从汴京出发，跟随他的有他弟弟赵匡义和赵普。当天晚上，大军到了离京城二十里的陈桥驿，赵匡义和赵普与将士们商量，要赵匡胤做皇帝，并马上派人告诉留守在京城的大将石守信、王审琦等。

赵匡胤一觉醒来，只听得外面人声嘈杂，接着，就有人打开房门，高声呼喊：“大家要请点检做皇帝啦！”赵匡胤还没来得及说话，几个人就把黄袍披到赵匡胤身上。众将士们又跪下叩头，高呼“万岁”。接着，又推又拉地把赵匡胤扶上了马，要他回京城。赵匡胤坐在马上，开口道：“大家既立我做天子，可能听我命令？”将士们齐声回答：“听陛下命令。”赵匡胤发布命令说：“到京城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准抢掠国家仓库。执行命令的重赏，否则严办。”赵匡胤带军回京，一路上军容整齐，秋毫无犯。到了汴京，又有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作内应，自然一切很顺利。接着就安排了一次仪式，周恭帝让位，赵匡胤做了皇帝，国号为宋，历史上称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赵匡胤做了皇帝，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昭义节度使李筠（yún 匀）反宋。六月，宋太祖亲自领兵攻下泽州，李筠在泽州自杀。接着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据扬州在九月起兵反宋。石守信率禁军往讨，十月，宋太祖又领兵出征。攻破扬州，李重进投火自杀。宋朝政局稳定了，宋太祖又对赵普说：“自唐末以来，换了五个朝代，战斗不止，不知什么原因？我要使国家长久，有什么办法？”赵普回答说：“这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藩镇权力太大，如果夺了他们的权，控制他们的钱谷，收他们的精兵……”赵普还没说完，宋太祖就急忙说：“你甭再说了，我已经懂了。”后来赵普又几次对宋太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兵权太大，还是调离他们离开禁军好。”

一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酒宴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饮酒。酒过几巡，宋太祖命令太监退出。他端起酒来与大家干杯，然后说：“我要是没你们帮助，不会当皇帝。但是你们却不知道，做皇帝真难啊，不如作节度使快乐，我整夜都睡不安稳！”石守信等说：“陛下怎么说这话，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宋太祖说：“你们虽没异心，可是一旦有人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想不干，能行吗？”石守信等感到大祸临头，连忙跪下磕头，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有想到这点，请陛下可怜我们，指

引一条出路。”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不如你们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多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连声说：“陛下为我们想得也太周到了。”

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送上一份奏章，说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了兵权，赏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做节度使去了。

上面说的就是陈桥驿“皇袍加身”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事情。

后来宋太祖又解除了各节度使的兵权，又从政治、财政等方面采取了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北宋王朝稳定了下来。

宋太祖的地位基本巩固了，便开始进行周世宗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北宋建国三年之后，就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按照赵匡胤的计划是先消灭南方的几个王国，然后再北向削灭北汉，收复燕云等州。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出兵灭荆南。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灭后蜀。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灭南汉，开宝八年（公元975年）灭南唐。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宋太祖死，他的弟弟赵光义继位，就是宋太宗。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纳土归时。对北汉，在太祖时曾三次出兵，均因遇到辽对北汉的援兵无功而还。到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赵光义亲率大军出击北汉，才灭掉了北汉，完成了中原和南方的统一。至于燕云十六州，北宋没有力量战胜辽，所以无力收回。

四十一 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四川农民起义，发生在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距北宋建国仅三十多年。这是为什么呢？唐末农民起义的烽火没有燃及川蜀地区，五代时期，这里先后建立过前蜀和后蜀两个封建割据政权，长期没有战争，封建地主经济继续膨胀。根据北宋前期记载，四川地区土地集中情况特别严重，客户数目高达全境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豪强地主役使着几十几百乃至上千家的“旁户”（佃客）。地主对待旁户，几乎是和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的。地主每年应向政府交纳的课税，都直接由旁户负担。宋太祖灭蜀之后，对四川农民这种处境不但未有任何改变，还加强了对他们的剥削。蜀地素以出产丝麻、布帛、茶叶闻名，北宋在那里设置“博买务”，垄断商业贸易；地主、大商人也趁机投机倒把，鱼肉乡民，劳动人民濒于死亡边缘。乾德三年（公元965年），蜀兵就起义抗宋，前后近两年。乾德三年至四年（公元965至966年）阆（lang浪）州（在四川北部）农民起义。乾德四年初，有渝州（即恭州，今重庆市）农民杜承袭为首的起义。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正月，有渠州（在四川东部）农民李仙领导的起义。到宋太

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是永镇军青城县（今四川灌县）人，和他的妻弟李顺，都是靠贩茶叶谋生的。茶叶实行专卖，地主商人从中投机取利，茶农生活艰难。公元993年二月，王小波聚集一百多个破产茶农起义，王小波宣告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个口号反映了农民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要求，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响应，起义仅十天左右，参加的人群就达好几万人。起义军一举攻下青城，又攻入彭山（今四川眉山北）。把贪污害民的县令齐元振大蠢（mao矛）贼处死，把县署所存金帛散发给群众。起义军更受到农民拥护。

王小波带兵北上进攻江原（今四川崇庆东），杀死宋四川都巡检使张玘（qi启），他自己也中箭，负伤过重，壮烈牺牲。起义军拥戴李顺做首领。攻下蜀州（今四川绵庆）、邛（qiong穷）州（今四川邛崃）。第二年正月，起义军胜利地占领四川首府成都。这时革命队伍已扩大到几十万人。李顺即位称王，国号大蜀，年号应运。他们实践了“均贫富”的口号，没收地主富豪的财产分散给农民。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起义军每占领一地，就立即召集当地的“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家口）足用外，一切调发（没收），大赈贫乏。”这在我国农民革命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创举。李顺整顿人马，四出征战，革命力量北到剑州（今四川剑阁），与剑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剑门）相距很近，东到巫峡，震动了北宋王朝。

宋廷立即派遣两路大军，分别从长江和剑阁向成都进攻。起义军想在宋军未到之前先把剑阁夺取到手，阻截宋军于险要关口之外。然而攻夺战没有成功，起义军伤亡惨重，北宋军遂得长驱入川。其后，李顺又调动二十万起义军围攻梓州（今四川三台），和宋军相持两个月，受到宋军夹击，遭到失败。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五月，从剑阁攻入四川的宋军围攻成都，成都城破，有三万起义军英勇战死，李顺坚强不屈，光荣献出生命。李顺死后，成都以东，夔（kui奎）州（今四川奉节）以西农民军，继续坚持战斗，一直到至道元年（公元995年）。

这次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成都博买务从此取消了，这说明北宋王朝受到起义军的沉重打击。“旁户”（佃客）这一称呼从此也再不见了，这又说明在四川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上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调整。特别是“均贫富”的口号，标志着我国农民起义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说明农民的斗争由反徭役、反暴政已进入反贫富不均的阶段，集中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是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一个重大发展。

四十二 澶（chán馋）渊之盟

宋太宗赵匡义统一了中原和南方以后，为了收复石敬瑭割让给契丹族辽的燕云十六

州，在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亲自率兵向辽进攻。宋军曾包围了辽的南京（今北京），最后却失败了。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又分兵三路再次伐辽。当时西路军副将杨业在出兵两个月内就收复了山西一带的四个州，取得很大胜利。可由于东路军作战失败，致使西路军陷于孤立。宋太宗下令让杨业和西路军主将潘美撤退。在退军过程中，潘美没有按照事先的约定配合杨业作战，杨业退到陈家谷口（山西朔县南）的时候，无人接应，身陷重围。由于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宋军伤亡很大，杨业受伤几十处而被俘，绝食三天而死。他的儿子杨延玉和部下一百多人也战死了。

此后二十多年中，辽不断派兵南下掠夺，北宋只得采取守势。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闰九月辽萧太后和辽圣宗亲领二十万大军南下侵宋，经保、定二州，直趋靠近黄河的澶州（今河南濮阳），正面威胁汴京。

辽军南下告急文书雪片一样飞到北宋朝廷，君臣惊慌失措。参知政事（副宰相）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今南京市）；参知政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宋真宗犹豫不决，召见新任宰相寇准，问他该怎么办。寇准看见两边站着王钦若和陈尧叟，心里已经有了数。他声色俱厉地说：“是谁出的迁都主意？应当斩首！‘放弃汴京南逃，人心动摇，敌人必会乘虚而入，国家难保；要是皇帝亲征，士气得以鼓舞，一定能打退辽兵。’”杨延昭这时也上疏给宋真宗，主张乘辽大兵南下之际，袭取幽、易诸州，胆怯、动摇的宋真宗，在大敌压境和广大军民积极要求投战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表示赞同亲征。但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和与战两派斗争十分尖锐，十一月当宋真宗到达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时，主和和大臣又重弹迁都金陵老调，宋真宗又犹豫不决。寇准说：“今敌骑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竭力主张赶快进入澶州，他认为辽骑兵不可怕，宋真宗才勉强进入澶州。这时，辽兵也已赶到澶州城下，发动三面围攻。

宋军在澶州要害地方设下弩箭，辽军主将萧挞览亲自带先锋军攻城，正好进入宋军伏弩阵地，威虎将军张瓌发弩射敌，萧挞览中箭丧命。辽萧太后见主将阵亡，士气受挫，孤军深入，给养困难；又见宋皇帝亲自率兵抵抗，士气振奋，所以就向宋求和。

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在寇准、高琼文武大臣护卫下，于十一月末，渡过黄河，到了澶州北城。这时各路宋军均已集中澶州，将士们看到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声雷动。萧太后派使者到来行营议和，胆怯、动摇的宋真宗真是高兴，就找寇准商量。宋真宗说：“辽国要我们割让土地，那是不行的。如果他要点金银财帛，我看可以答应他们。”寇准说：“他们要议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失地，怎能给他钱财。”但是宋真宗一心要和，不顾寇准反对，派使者曹利用到辽营谈判。曹利用临走前问宋真宗，可以给辽多少银绢宋真宗表示：“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寇准听说之后，就对曹利用说：“虽然皇帝许诺银绢百万，如果你答应辽邦超过三十万赔款数目，回来时，我就杀你的头。”曹利用知道寇准厉害，到了辽营，费尽口舌，于景德元年十二月（公元1005年1月）宋辽双方达成了和议。主要内容：北宋每年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这笔巨额赔款，长期成为北宋人民的沉重负担，历史上把这次的和议叫“澶渊之盟”。

再说说说宋真宗的怯懦和无耻形象。曹利用回营时，宋真宗正在吃饭，不能马上接见。真宗急欲知道谈判结果，就叫小太监出来问曹利用，曹利用不愿告诉太监，一定要面奏。太监一定又要他说个大概，曹利用设法，只好伸出三个手指头做了个手势。太监回报真宗，以为是三百万，不禁惊叫“这么多？”可是他又觉着，“能够了结这样一件大事，三百万也算。”他吃完了饭，曹利用面奏了详情，宋真宗一听三十万，又不禁高兴起来，直称赞曹利用会办事，特予厚赏。辽兵得了银绢，胜利回师；宋以屈辱妥协，暂退敌兵。真宗还自作《回銮诗》与群臣唱和，庆祝“了事”的胜利。

澶渊和议以后，宋辽之间战争少了些。

现在附带说一下宋和西夏的关系。西夏是党项族（羌族）建立的政权。公元990年西夏首领李继迁接受了辽封号，称夏国王，又接受北宋封号和官爵，称节度使。仁宗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李继迁孙元昊自称皇帝，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为国都，宋夏之间发生了多次战争。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双方达成和议，元昊表面上放弃皇帝称号，受宋册封为夏国王。但北宋每年必须“赐”给夏十五万三千匹绢，七万二千两银，三万斤茶。又给北宋人民增加了一项巨大的负担。

四十三 四大发明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在世界上有光辉的历史。最为人们所称誉的是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造纸术是东汉时期发明的，其余三大发明都在北宋时期。

这里所说的纸，是现代所用的纸，即用植物纤维纸的涵义说的。这是东汉和帝永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在劳动人民已经发明并且使用的基础上改进并扩大生产的。本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西汉时期已经有了植物纤维纸。1933年，在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出一张西汉宣帝时（公元前73年到前49年）的纸；1973年至1974年，在甘肃省额济纳旗地区发掘出一张不晚于宣帝时的麻纸；1957年五月，在西安灞桥一座古汉墓中更发掘出西汉早期的纸，被称作“灞桥纸”，是用大麻和苧麻等原料制成的，时间不晚于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年到前87年）。据科学工作者研究，这种纸的制造主要工序，已经具备了现代造纸的基本流程。

“灞桥纸”是目前我国以至世界上最早的纸。不过这些纸粗糙，纸的表面有较多的未被打散的麻筋，纤维组织松散，分布也不均匀，不利于书写；发掘出的纸面上也无文字。所以这还是造纸术的萌芽和开始阶段。到了东汉，纸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这也可用出土的东汉纸来说明。如1901年，先后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发现的两张东汉纸；1942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的东汉的烽，燧遗址中，又发现两张东汉纸；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也发现的一张东汉纸；1974年，在甘肃武威县一座汉墓中更发现的一张东汉纸。

这些纸比之西汉纸质量有明显进步，上面都有字迹，有的是书信、诗钞，也有的是日常文书。

为什么人们都说“蔡伦造纸”呢？蔡伦，字敬仲，东汉时期桂阳（今湖南耒阳县）人。小时入宫做太监，和帝时为中常侍兼尚书令，负责皇宫手工作坊。因为工作的方便，他广泛研究了民间造纸经验，创造性地使用树皮、麻头、旧布、旧渔网等植物纤维做原料造纸。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把他监造的第一批纸献给和帝，受到和帝称赞。蔡伦因此被封侯，所以把这种纸叫“蔡侯纸”。这样，这种造纸方法推广到全国各地后，纸就取代了笨重的木简和昂贵的缣帛，成了主要的书写工具。公元七世纪，我国造纸术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八世纪传入阿拉伯，后又传入欧洲。十四世纪初叶，欧洲人才开始使用破布造纸，要晚于中国一千四百多年。

这里所说的印刷术，是指活字印刷术。早在晚唐、五代就流行雕版印刷，宋代雕版印刷最发达，但印一页书，要刻一块版，既费时，又费钱财、人力。到了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至1048年），平民出身的毕升，首次发明了先进的活字印刷术。毕升在雕版印刷业中心之一的杭州做刻字工人，他曾用木头来作活字，但木活字因受木纹疏密的影响，沾水以后就会膨胀，以致版面高低不平；木活字加蜡和松香等固着剂后，更会粘连，不易取下来。因之又改用胶泥来作活字。他用粘土做成一个个小方块，每块刻一个字，用火烧硬，成为陶制的字。一个字刻好多少，平时用木格贮藏，按音韵次序黏标排列；用时在敷有松脂、蜡和纸灰等固着剂的带框铁板上排版。排版后，用火烘烤，待固着剂稍稍熔化时，即用平板按压版面，使之平整。通常要准备两块铁板，一板在印刷时，另一板就排好字，交替使用。印完书后，再用火把固着剂烤化，用手轻轻拂动，泥活字就自行从铁板上脱落，然后按韵放回原来木格保存。

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对后代影响很大。到元朝出现了锡活字、木活字。宁夏所出的西夏文木活字佛经，就是元初印刷的；敦煌千佛洞发现过维吾尔文木活字。至于利用金属材料来制定活字，宋、元之际也已开始，元初王桢就提到锡活字。明朝由锡活字发展到铜活字和铅活字。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对世界印刷术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朝鲜十二世纪有铜活字，十五世纪初有铁活字。日本又从朝鲜间接传入活字印刷术，时间约在十四纪。活字印刷术又经由新疆传到波斯和埃及，再传入欧洲。目前所知欧洲活字版制造是德国人谷腾堡，他于1444年至1448年间，首创用铅、锡、锑的合金制成欧洲拼音字母的活字，比毕升整整晚了四百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指南针，是在我国古代“司南”的基础上改进发明的。战国时期，我国人民发现磁石指南的特性，用以制定辨别方向的仪器，叫做司南。司南由一把光滑的磁勺和刻着方位的铜盘组成，使用时，用手转动勺子，当勺子静下来时，勺把所指的方向，就是南方。到了北宋，由于航海的需要，人们就又发展为用磁针指南。起初，把磁针搁在碗边上。后来，把磁针装在罗盘上，制成指南针，又叫罗盘针。用于航海事业。这种指南针最早见于宣和年间（公元1119年至1125年）朱彧（yà部）写的《萍州可谈》，记载

其在广州目睹的情况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同时代的徐兢作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中也指出，在海洋中如遇天气阴晦，“则用指南浮针以授南北”。

由于宋代航海事业的发达，促使指南针的出现；指南针的发明，又大大便利了航海事业的发展。南宋时，使用指南针的中国商船，经常来往于我国和南洋群岛、印度之间。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经常搭乘中国大海船，他们也学会了使用指南针。阿拉伯和欧洲各地，到十二世纪末或十三世纪初也懂得了使用指南针。指南针在航海上的普遍使用，大大推动了中外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我国和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火药是我国古代一些炼丹家，在炼制丹药时发明的。唐医学家孙思邈最早记下了用硝石、硫磺、木炭混合制成火药的方法。到了唐宋、五代时已经把火药应用到军事方面。到北宋初期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冯继升等首次发明制造火药箭的方法。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北宋就用这种火箭、火炮作攻灭南唐重要武器。咸平三年至五年（公元1000年至1002年），又有唐福和石普二人，先后献给政府火箭、火球和火蒺藜等新式火器。火箭是运载火器，把一个装火药的筒捆在箭支前部，利用火药燃烧时空气向后喷射的反作用力，推动箭支前进。现代的火箭，用的也是这个原理。北宋政府在汴京建立了制造火药的作坊。北宋末年，金兵包围开封，宋军就用火箭和火炮来抵御。李纲主持城防时，还使用过用火药、石灰、和纸管制成的“霹雳炮”，一度打退金兵。但不久金兵也学会了制造火箭和火炮，并用来攻城。元朝时，火药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在十三世纪阿拉伯人的兵书中，提到“中国铁”或“契丹花”，把火枪的枪头叫“契丹火箭”，还有一种叫“契丹火轮”的火器。“契丹”是当时阿拉伯人对中国的一种称呼。欧洲人在十三世纪后期，从阿拉伯人知道了火药，但真正能制造火药、火器，是在十四世纪初。恩格斯说：“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二〇六页）。

四十四 王安石变法

北宋到了中期，统治阶级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禁军八十多万，不仅老弱残废者很多，且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战斗力很弱。官僚机构臃肿，许多官僚机构只拿俸禄，不干实事。庞大的养兵、养官费用和对辽、夏每年的贡纳，使北宋政府财政困难。为了填补财政亏空，只好拼命增加赋税和徭役剥削。地主阶级，有的享有免役特权，有的利用权势瞒产漏税，最沉重的赋役负担都落到了农民头上，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全国十分之七的土地，又都集中在皇室、贵族、官僚和地主手里，农民无地、无粮，地主阶级又利用高利贷手段盘剥农民。农民大批流亡，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宋仁宗（公元1023

年至1063年)时,欧阳修曾上书说:“农民暴动”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天下祸患,岂不可忧?”王安石也上书,要朝廷接受“汉之张角”“唐之黄巢”起义的教训,实行变法,以挽救危机。仁宗就任用范仲淹实行改革,历史上称这次改革为“庆历新政”(庆历,是仁宗年号)。不料到新政刚一推行,就受到权贵们的反对,并诬蔑范仲淹等交接朋党,滥用职权。仁宗也就动摇起来,范仲淹外调陕西边境,新政全部废止。仁宗死,英宗即位,才三年又死了。太子赵顼(xù)即位,就是宋神宗。

神宗即位时才二十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青年,常在他身边的一个官员叫韩维,向神宗推荐王安石。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又做了二十年地方官,很有政绩。他在鄞县(今浙江鄞县)当县官时,灾情严重。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每逢青黄不接时,他就打开官仓,借粮食给农民,秋收后,人民加上官定利息偿还,这样豪富不能重利盘剥农民,农民生活就好过些。宋神宗把王安石从江宁调到京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实行变法。王安石认为国家不富,是因为社会生产不丰富,为丰富生产,就要采取措施,限制大地主对农民的恣意剥削,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来实现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的目标。他的新法主要内容有:

(一)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颁行。鼓励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扩大圩田和淤田。大规模水利建设,由官府借钱。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以后的六年间,全国修水利一万零七百多处,灌田三十六万多顷。

(二)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八月颁行。规定每年九月丈量土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按照土地肥瘠,分等级规定税额。结果丈量出大批官绅地主隐瞒的田产,纠正了大地主“有田无税”的现象。

(三) 青苗法

各地政府在夏、秋收之前,借钱米给主户,主要是贷给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收成之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钱。以防止豪强大姓在青黄不接时高利盘剥农民。

(四) 募役法(免役法)

由国家出钱雇人服役,按户等收免役钱,乡村四等以下的户不纳,原来可免役的官户却要交纳半数,称为助役钱。

(五) 均输法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颁行。由政府派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财赋,统一采购物资,防止富商大贾操纵,力求“国用可足,民财不匮”。

（六）市易法

在汴京设市易务，以一百八十万贯作流动资金，控制商业贸易，收售物资，调节物价。市易法后来从开封推行到各地，打击了富商大贾对商业的垄断，使北宋政府获得了商业利益。

（七）将兵法

在西北的泾、渭、仪、原四州驻军中设负有专责操练军队的将官，选武艺精良的军官充任，分番教阅戍守当地的军队。后又向黄河流域各地推行，更后又向全国推行。在此之前，百万职业兵，饱食安坐，毫无战斗力。将兵法实行后，军队素质有所提高。

（八）保甲法

各地农村住户，无论主户客户，每十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有两丁以上，出一人做保丁，选取其中有物力、有才能的人充保长、大保长、都保长，农闲时集中练习技艺，夜间轮流值班巡查。使壮丁受到军事训练，就可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且用什伍之法把人民编制起来，固着在土地之上，社会秩序可以稳定。

（九）保马法

在开封府界和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推行民户代养官马。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家产高者两匹。马户皆免其征役，“民皆乐从”。

（十）军器监

在开封城内设监以监督军器制作。此后，兵器衣甲的制作，产量加多，质量也改善。

王安石的新法，其中心环节是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达到富国目的。新法前后实行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基本上都收到预期效果，增加了政府收入，解决了北宋财政困难，也加强了军事力量。由于新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大官僚利益，也由于新法为某些贪官污吏所利用，反而起了扰民作用，因此，被一些守旧朝臣抓住其弊端而攻击。可是王安石是不怕的，他曾经说过三句有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反映了王安石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大无畏的革新精神。

王安石把新法的推行寄托在宋神宗身上，由于神宗的妥协动摇，所以王安石两次辞去宰相职务。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受灾地区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纷纷上书说这是由于变法触动了天怒。王安石反驳说：“水旱是常事，尧、汤所不免。应当更修人事，以应付天灾。”但遭到神宗的驳斥说：“这不是小事，所以这样恐惧，正是人事未修。”光州司法参军、监安上门（东

京城门)郑侠给流民图送呈神宗,并上疏说:“去年大蝗,秋冬大旱,今春不雨,都是大臣辅佐不以道所致。”建议将新法罢去,如再有十天不雨,情愿斩首。知青州滕甫上书说:“只要陛下宣布‘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悉罢’,就会‘民气和,天意解’”。一时之间,攻击新法之风大盛,后族也大力攻击新法,神宗动摇,变法派内部也分裂,王安石陷于空前困境。两个皇后对神宗流涕,极力指责新法,说“王安石变乱天下”。王安石在围攻中无法执政,上章求去。四月中,神宗下诏,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安心休息”。王安石罢了相,神宗以韩絳代王安石,王安石荐以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新法仍继续推行。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韩絳请神宗召王安石复相。二月,神宗派使臣持诏去江宁府召回王安石复相。王安石再度入相,又受到围攻。十月间,天空出现彗星,又成为攻击王安石一个借口,两个皇后又出来反对。王安石说:“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不止,上下得会,岂能没有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他主张对不附新法者治罪,“不然,法不行”。但神宗拒绝。王安石只好称病居家,神宗派宦官去慰问,一天达十七次之多,给假十天,又迫使王安石再次出来执政。可神宗在保守派包围下更加动摇。至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春,王安石又上章请罢相归田,连上四、五次,至十月间获准罢相,出判江宁府。此后,再没有回朝。

王安石离开朝廷后,宋神宗还把王安石定下的大部分新法维持了将近十年。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死,哲宗立,由太皇太后处理军国大事,建号元祐。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后又升尚书左仆射(左宰相),尽废新法。

王安石的变法,只是为了缓和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只是在不动摇封建制度的前提下作些改革,这些改革还是通过十分腐朽的官僚机构来实施,从一些反对新法推行的奏章和文件中,还可看到某些新法为某些贪官污吏所利用,反而起了扰民作用。这些材料虽有所夸大,但也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王安石把新法的推行又完全寄托在宋神宗身上,旧势力反扑力量大了,宋神宗动摇了,革新派内部也分裂了。宋神宗一死,新法也就全部被废止了。这一历史经验证明,封建地主阶级的任何改良都不能解决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农民运动的革命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四十五 靖康之耻

王安石变法失败,北宋封建统治更加腐朽反动。宋徽宗时,任用蔡京、童贯、王黼(fǔ)、梁师成、朱勔(miǎn)、李彦六人,他们结党营私,荼毒人民,人民痛骂他们是“六贼”。

蔡京、童贯等在苏州、杭州设立“造作局”、“应奉局”,制做木丝织等奢侈玩物,搜罗各种花石树木,供皇帝建造花园玩赏。强令农民到深山江湖采集奇石异石,还派人带兵闯进民家,看中一石一木,就令士兵毁墙拆屋地抢走,把大量花石装船运往京

师。每十船组成一纲，叫做“花石纲”。一块大石运到京师，竟耗费三十万贯钱财。

宋王朝对人民的残酷压榨，终于激起各地农民起义。其中较大的起义有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在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的方腊起义，和宋江等三十六人在山东、河北一带的起义。起义军虽然被镇压下去了，可是对北宋王朝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宋王朝越来越腐朽了。这时居住在我国东北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的女真族却兴起来了。

女真族在周时称为肃慎，唐时称为黑水靺鞨（mòhè末合），唐政府曾在此设黑水都督府。五代以后才称女真族。十世纪，女真族在辽统治下，十世纪中叶女真族中的一支完颜部渐趋发展，十一世纪末，完颜部统一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公元1115年，阿骨打在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称皇帝，国号金。阿骨打就是金太祖。

金崛起后，辽统治者越来越腐朽，皇帝奢侈享乐，人民不断起义。全军乘辽衰弱，占领了辽许多土地。公元1123年，金太祖阿骨打病死，由其弟吴乞买继位，就是金太宗，本名完颜晟（*sèu*胜）。他继续进行对辽的战争。公元1125年，金军俘虏了辽的天祚帝，辽灭亡了。

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冬，金又大举进攻北宋。西路由完颜宗翰（粘罕）率领的金兵在太原遭到当地军民的反击；东兵由完颜宗望（韩离不）率领的军队长驱直入，于次年渡过黄河，包围了开封。把宋徽宗吓坏了，赶快把皇帝让给他儿子赵桓，即宋钦宗。宋徽宗自己却伙同蔡京、贯童等，以“烧香”为名，逃出汴京，直奔镇江。统治集团分化为投降、抗战两派，在人民坚决支持下，抗战派将领李纲主持汴京防务。一时士气旺盛，多次打退金兵进攻。各地援军二十多万也纷纷抵达京城。这时金兵不过六万，粮草又不能持久，可宋钦宗胆小怯懦，无视抗金的有利形势，竟派大臣向金乞降。完颜宗望要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匹、衣服一百万匹。还要宋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及这三镇所辖全部州县给与金人。北宋王朝投降派张邦昌、李邦彦，竟主张完全接受。宋钦宗派康王赵构和宰相张邦昌出使金营，接着又罢免了李纲。宋王朝这种卖国行径，激起汴京人民极大不满和反对，数万群众包围皇宫，其中有陈东等带头的一批太学生。他们上书说：“李纲勇不顾身，是社稷之臣；李邦彦、张邦昌等不顾国家，是社稷之贼。”愤怒的群众，当场击毙几十名宦官。并要求惩治蔡京、童贯，全力抗金。陈东等人上书要求砍蔡京、童贯等人的头，“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宋钦宗被迫下令杀了童贯等人，蔡京被流放，死到半路。

当金军包围北宋首都时，黄河以北许多重要城镇还是宋兵驻守着，他们完全有可能切断金军归路。还有许多起义军也把斗争锋芒转向金军，原在青州的张仙起义军已自动开到开封近郊，要乘机袭击金兵。李纲和钟师道等人也建议增兵扼守黄河，断绝敌军粮道和归路。可是北宋最高统治者完全看不到这些有利形势，竟然答应金人割款地要求，而金人呢？却感到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情况之中，所以没有等待勒索的金银足数，就不得不尽早撤退。

金兵撤退了，宋徽宗感到没事了，就又回到都城做太上皇了。

女真的南侵军撤退之后，河北人民展开了保卫乡土斗争，金人不能靠北宋皇帝的诺言而劫取到三镇二十州的土地和人民。金又向宋施加军事压力，北宋朝廷对割让三镇与否问题，意见分歧。宋廷议论未定，金又分两路于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同时南下。这时宋朝已把各路勤王之师和民兵遣返原地，大河两岸也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金兵在无抵抗的情况下，渡过黄河，攻破开封，把太上皇徽宗和皇上钦宗先后扣押到金营，并尽量把开封各个府库所存以及官户民户的金银币帛加以搜括。到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初一，金人俘虏了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皇女以及宗室贵戚等三千多人北去。北宋朝廷上的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铜人、漏刻、所收藏的书籍、天下府州县图，以及伎艺工匠和倡优等，都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去。岳飞《满江红》说：“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就指的是这一段历史。

北宋灭亡了。就在这一年，宋钦宗的弟弟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做了皇帝，后来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赵构就是宋高宗。

四十六 南宋与金的对峙

宋高宗赵构即皇帝位，用抗战派李纲为相。李纲为了领导、组织和使用在河北抗金的忠义民兵，推荐张所河北招抚使，王瓌（xié壁）、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宗泽为开封留守，共同筹划收复河东和河北失地。宗泽积极沿黄河南岸修筑防御工事，募集军队，加以训练，联络、组织各地农民起义军，和河北忠义民兵，特别是王彦领导的“八字军”进行联系，准备过河收复失地。但由于高宗与汪伯彦、黄潜善等投降派的阻挠和破坏而使抗战派的策划不能实现。李纲任相七十几天即被罢免，宗泽虽仍在开封留守任上，但他的出兵过河计划一直不得高宗允许，宗泽因愤成疾，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秋，在三呼“过河”之后，含恨死去。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秋，金兵又分路向山东、河南、陕西三地进发。其取道山东的一路，在建炎三年春初攻下了徐州，渡过淮河，直指扬州。当时宋皇帝赵构住在扬州，见状就仓皇把朝廷迁往杭州。到了九月，金兀术的军队又分两路渡过长江，连破建康等重要城镇，进逼杭州。赵构这个皇帝，又从杭州出奔，经越州（今浙江绍兴），转明州（今浙江宁波），最后逃到定海，把南宋政府的人员和文物装入几只楼船中，避难于台州、温州等沿海各地。金兵另一路从湖北进军江西，隆裕太后（赵构伯母）由南昌仓皇出走，到造口（今江西万安西南）弃舟登陆，逃往虔州（今江西赣州市）。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在今江西赣州市西南贺兰山上）下清江（即赣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句即指此段历史。金兵为严州的乡兵击败于桐庐县牛山下。金兵受挫之后，宣布“搜山检海”已毕，在杭州等地大肆虏掠一番，于建炎四年

(公元1130年)春北返。在黄天荡(长江下游一段,在今南京市东北)辽阔的江面上,被韩世忠军截击,受阻四十八天方得通过。此后,金军再不渡江了。金北撤之后,赵构才回杭州,并把南宋都城定到杭州。

在金兀术南侵同时,金兵又侵入关中,占领了长安等地。金为了集中全力经营和镇抚华北,又在大名(今河北大名东)立宋叛臣刘豫为傀儡皇帝,建立了伪齐政权。

金兵在黄河以北及河东路全境实施野蛮残酷统治,任意霸占汉族人民的土地、金帛和子女,搜捕壮丁当兵,或作为奴隶,标价出卖,或驱往黏糒和西夏交换战马;甚至有成千的人被粘罕下令活埋在云中府(今山西大同市)郊外;如发现各乡村有一人有抗金活动,就把全村老幼男女全部屠杀;如有人据城抵抗,则城破之后屠城。各州县牢狱关满囚犯,道路以及郊野积尸狼籍。还强迫人民剃发结牌,改从女真人装束。后奈,竟下令“以人口折还债负”,就是强制一些负债人都去做债务奴隶。

金国统治者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武装反抗。河东路各州县人民,结为忠义社,用红巾作标志,以相识别。忠义军曾长期阻截粘罕军于太原城下,泽潞忠义社几次袭击粘罕的大寨。河北、山东等地忠义民兵开展壮大起来,有以下几支:一支是五马山寨义兵,由赵邦杰、马扩和一个冒充信王赵榛之后的赵慈领导,聚集在河北庆源府五马山,结为朝天、铁壁等寨,人数达十万以上。散处在河北以至河东的忠义社,大都都和五马山寨互通信息,相为声援,并打着信王旗号,总计不下几十万人。另一支是八字军,由王彦领导。王彦本宋政府中统制官,宋高宗即位初就率领岳飞等十几个小首领和七千士兵,到河北去组织忠勇军民抗金。他们在面部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所以叫八字军。人数总计在十万以上。他们团结太行山一带义军,千方百计邀击金人。王彦原想到太原去建立抗金根据地,后因金军“扫荡”未能实现,就率领一部分队伍随同南宋南下了。还有一支是张荣领导的梁山泊水军。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金军南侵,曾受到梁山泊水军上万船只邀击,第二年金将粘罕再次南侵北返途中,也遭到这支水军截击。因为金兵几次“围剿”梁山泊,张荣带领全部人兵顺清河转移到楚州(今江苏淮安)。抗金义军虽多,可南宋小朝廷不予支持,不肯协同作战。义军在组织、指挥、武器上都不如金军,所以不能给金以致命打击。虽然如此,也给了金军很大威胁,使金在中原的统治不能稳定,金军南下也受到很大牵制。北方人民抗金斗争,持续了一百年之久。

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不知亡国恨。抗战名将岳飞与投降派赵构、秦桧之间展开了斗争。岳飞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收复了建康。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驻屯江州(今九江),与河北忠义民兵保持密切联系。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开始,岳飞负责从江州到江陵的沿江防务,在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从伪齐和金国联军手中收复了襄阳、郢、随、唐、邓、信阳六个州郡。屯兵于鄂州(今湖北武昌县)。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攻克了伪齐新设的镇汝军,前锋深入敌境,收复了魏州的卢氏县和长水县,大军抵达蔡州城。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家军收复颍昌(今河南许昌东)、陈州(今河南淮阴)和郑州。金军统率金兀术在汴京大为恐慌,他和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带大军进攻虢城。岳飞

派他的儿子岳云带领一支精锐骑兵打先锋。岳云带头冲上阵去，奋勇拼杀，大军紧随，杀得金兵大败。金兀术调用他的“铁浮图”反扑。“铁浮图”是兀术专门训练的一支骑兵，以三个编成一队，披着厚的铁甲，居中冲锋，又用两支骑兵从左右两翼包抄，叫做“拐子马”。岳飞令将士带着刀斧，弯着身上阵，专砍马腿。马倒，兵将跌下马来，一刀一个，把铁浮图（拐子马）打得落花流水。兀术遭此大败，痛哭流涕地说：“从起兵以来，全靠拐子马打胜仗，这下完了。”兀术又亲率十二万大军反扑，岳飞部将杨再兴带领三百名骑兵正在前哨巡视，立即投入战斗，杀伤敌两千多人，杨再兴中箭牺牲。岳飞部将张宪从后面赶上，又杀退金兀术。金兀术郾城大败，又攻颍昌，岳飞派岳云带八百骑兵驰援，金人竟没人能抵挡。宋军步兵和义军分左右两翼包围，金兵又大败而逃。这时，聚兴率领的太行山义军和黄河两岸义军纷纷响应，打起岳家军旗号，吓得金兵心惊胆战。岳家军节节胜利，一直打到距汴京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岳飞鼓励将士说：“直抵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与诸君痛饮耳！”岳飞的胜利，迫使金军准备从开封撤军。

可是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害怕胜利，更害怕人民力量威胁到自己的统治，竟无耻地向金求和。他们下令岳飞班师回朝，并尽先撤回驻屯在东路军队，使岳家军陷入正侧两面受敌的严重局势之中。岳飞这时也只能“忍令十年之功德于一旦”的愤怨，含恨从前线班师。军民一片悲愤。岳飞撤军后，许多地方又为金兵占领了。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四月，宋高宗明令解除岳飞、韩世忠、张浚三大将兵权，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几个宣抚司。金兀术知道南宋政府已自动摧毁其国防力量，又对南宋进行军事威胁，他通知宋高宗说：“已会诸道大军，水陆并进”、“问罪江表”，并且说：如真肯降顺，必须把淮水以北土地和人民割归金国，必须把力主抗金的岳飞杀掉。宋高宗、秦桧按照金人授意，在绍兴十一年岁末，（公元1142年一月）把岳飞和岳家军重要将领岳云、张宪一齐杀害。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南宋投降派和金国签订了屈辱投降的条约，其主要条款是：（一）南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二）宋金两国，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境内）为界，这以北土地统归金所有。（三）每年奉送金二十五万两白银和二十五万匹绢帛。这就是所谓“绍兴和议”。

在金太宗（公元1123年至1135年）统治时，金还是以会宁府为首都。“绍兴和议”后，准备迁都关内，金熙宗还没来得及迁都，便被完颜亮杀死。完颜亮夺取帝位后，于金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三月改燕京为中都，同时宣布迁都燕京。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完颜亮领了号称六十万的兵马分四路南侵。宋在淮东、淮西军队不战而溃，撤退到江南。宋高宗又想“解散百官，浮海避狄”。幸而在采石（即牛渚，今安徽当涂县西北）渡江的金军，被虞允文迎击于江中，金军撤退，宋高宗浮海之计未实行。

中原、华北人民趁金军南侵后方空虚之时群起反抗，如在泰山有耿京、辛弃疾领导的二十万人；在辽东有赵开领导的十多万人；在大名有王友直领导的十多万人。此外，

“潼关以东，淮水以北，奋起者不可胜计”。金后方不宁，严重地影响了金军的南侵。同时，完颜亮安置在大名的屯田军万余人也自动退回辽阳。辽阳留守完颜雍于公元1161年乘机自立为帝，并从辽阳进据燕京，是为金世宗。完颜亮这时已自采石退向扬州，及听说完颜雍称帝，乃急欲北归，追令将士三日内渡江，从而激起部将叛变，起来杀死了完颜亮，并派人至南宋议和后，就引军北还了。

从此，南宋和金的对峙局面稳定下来。

四十七 钟相杨么起义

南宋一开始就就是一个腐朽政权，对内镇压，对外妥协。在江南，南宋王朝残酷的掠夺人民，一斛米的赋税增加到五、六斛，一千钱的捐税提高到七、八千。南北广大人民，既反对女真贵族的侵略，也反对南宋王朝的压迫，两者结合在一起，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奴役、反封建的斗争。南宋大臣王居正对宋高宗说：“自方腊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完全显露了南宋王朝的狰狞面目。人民忍无可忍，就不断起义，钟相、杨么（yao腰）起义，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蕲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北宋末年就在洞庭湖酝酿起义。他继王小波、李顺后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政治口号。他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就概括了农民在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均分财富的愿望。这个口号振奋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精神，周围几百里的穷苦农民纷纷投奔钟相。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春，钟相领导起义，很快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国号大楚，年号天载。起义军称钟相为“老爷”，参加起义叫“拜爷”，相互之间称“爷儿”，表示不分高下。斥责南宋法典是“邪法”，焚烧官府、杀死官吏是“行法”；把地主豪富土地夺回到农民手中是“均平”。仅仅十多天，起义军就攻占了洞庭湖周围十九个县的广大地区，农民们势如潮水，从四面八方起来响应。

南宋王朝任命孔彦舟为荆南湖北路捉杀使，联络当地地主武装，镇压钟相起义。孔彦舟派人伪装请求“入法”，混入起义军，里应外合。起义军失于防范，未识破奸计，钟相及其子钟昂不幸被俘，壮烈牺牲。但洞庭湖畔革命烈火并未因钟相牺牲而灭息，起义军又推杨么领导继续战斗。

起义军在龙阳（今湖南汉寿）境内，依山靠水，结营扎寨，“兵农相兼”，“陆耕水战”，平时从事农耕，官兵前来袭击就登舟作战，在战斗中，他们制造了一种“车船”，车船”装置踏轮，拨水前进，航行如飞。船旁按置撞竿，用来撞击敌船。这种车船”，机动灵活，便于水上作战。起义军不断壮大，坚持斗争一年之后，控制着洞庭湖一带广大地区。

金军伪齐刘豫妄图收买起义军，约起义军配合，共取南宋首都临安，但每一次派来

水寨的人受到起义军怒斥，“沉尸于江中”。

从绍兴二年以来，南宋先后派遣程昌禹、王夔、折彦质等率领大军前来镇压。王夔非常残酷，“纵其部曲，捉杀农夫，剽劫杀伤，莫知其数”。绍兴三年冬的淞江（今沅江）之战，王夔的崔增、吴全两支水军全军覆没。尽管如此，终因南宋兵力众多，洞庭湖外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已渐次失落。因而“兵农相兼”，“陆耕水战”的办法渐不能行。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南宋政府从抗金前线抽调岳飞的精锐部队开抵鼎州。岳飞对水寨中的起义军进行利诱和经济封锁。周伦、杨钦等叛徒投降了岳飞，“因敌人之将，用敌人之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很快地攻破了全部营寨，就在这一年的六月，杨么被俘不屈，被岳飞杀害。

秦末农民起义，陈胜、吴广以“天下苦秦久矣”为号召，高举“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帜。汉末黄巾起义，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公开宣布要以新政权代替旧政权。瓦岗军起义，在檄文中直呼隋炀帝为“昏主”，历数十大罪状。杜伏威与辅公祏两支义军合并时，辅公祏指出：“今日苦朝政，各兴大义”。所以说封建前期的农民起义所提的口号只是“反暴政”，也就是“反压迫”的斗争。唐末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侯都统”，虽然有“平均”财富的意思，但不明确，黄巢称“冲天大将军”，说明其首要奋斗目标是推翻旧王朝。到了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又正辞严地宣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钟相、杨么起义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鲜明地反映了贫苦农民反对封建制度，要求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这说明我国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水平的提高。

四十八 元统一中国

蒙古族是我国境内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原是春秋战国时东胡的一支，在唐时叫蒙兀室韦。先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的额尔古纳河上游，约在八世纪时开始西迁，游牧于斡（wò）握（鄂嫩河）、克鲁伦河（均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流域，逐渐散布到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

十一、十二世纪时，今蒙古草原上及草原周围，大小部落很多，其中有个蒙兀部（即蒙古部），还只是一个部落的名称。到了蒙古部统一了各部落之后，就成为草原各部的总称了。蒙古族人过着游牧生活，“以黑车白帐为家”，“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能飞奔马上射箭，射中远处走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奴隶社会。

蒙古孛儿只斤部的贵族铁木真，在长期作战中壮大了自己力量。公元1206年铁木真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蒙古国，在斡难河源召开大会，铁木真做了蒙古大汗，被各部尊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推行“领户分封制”，把他所属的亲兵和归

附的各部首領分封为万户那顏、千户那顏、和百户那顏，按照等級賜給牧地和牧民。此外，大汗、皇后、太子、公主、宗族以下“各有疆界”，牧民向政府及封主繳納羊、馬及其他畜产品，并担负軍役和各种雜役。沒有封王許可，不得任意遷徙。成吉思汗从各万户、千户和自身人（一般牧民）的子弟中，选“有技能，身材壯”的充“怯薛”軍，即护卫軍。怯薛軍有一万人，是蒙古最精銳部队。怯薛軍的设置，加强了大汗威力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成吉思汗还頒布了法典《大扎撒》；用畏兀儿字拼成蒙古国书，蒙古族从此有了通行的文字。他采取的各种政治、軍事措施，都順应并加速了当时蒙古社会的发展。

成吉思汗发动了大规模战争，从公元1205至1209年，三次对西夏用兵，迫使西夏向他納貢求降。吐蕃、畏兀儿先后派人朝見成吉思汗，表示臣服。从公元1211年起，又南下攻金，占领了黄河以北土地。公元1213年又分三路攻金，破金九十余郡。公元1214年圍金中都，金宣宗遣使求和，蒙古軍威胁日甚，金被迫迁都到开封。次年，燕京为蒙古軍攻占。公元1217年灭西夏。成吉思汗在灭西夏前夕病死于六盘山。成吉思汗死后，他儿子窩闊台为大汗。窩闊台约南宋出兵夾攻金，商定灭金后黄河以南归南宋。公元1234年金在蒙古和宋联合夾攻下灭亡。

金灭亡后，南宋進軍开封和洛阳，希图按协定收复黄河以南土地。但宋軍刚进入洛阳城，就受到蒙古軍袭击，宋軍大败。此后，蒙古軍分别进攻四川、襄汉、江淮地区。公元1251年蒙哥继汗位后，兵分三路南侵，西路攻四川，东路打鄂州（今湖北武昌），中路进逼襄阳和樊城。公元1253年，成吉思汗孙忽必烈攻占大理（大理，原名南詔，在九世紀晚期，改名为大礼。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又改名为大理。統治着云南和四川西南部地区。是以白族为主体的封建政权，前后存在三百多年）。对南宋形成环攻形势。

蒙古軍的进攻，遭到南宋軍民坚决抵抗。宋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王堅在合州（今四川合川）駐守，組織民工十七万，把合州东南的钓鱼城修整加固。次年蒙古軍圍攻钓鱼城，九个月不下，蒙哥被炮石打伤，死在軍中。但南宋宰相賈似道反而向进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应每年給蒙古軍銀絹各二十万两匹，并商定以长江为界。这时，蒙哥战死，蒙古諸王策划拥立其弟阿里不哥。忽必烈聞讯急忙赶回去争夺汗位，就允許了和议。賈似道反而隐瞒了屈辱的和议，向南宋皇帝谎报說蒙軍败退。从此，南宋统治者仍然过着荒淫生活，不做防守准备。

忽必烈回到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东南），于公元1260自立为大汗。1271年，正式定国号为元。1272定大都（今北京）为国都。忽必烈就是元世祖。忽必烈打败了以阿里不哥为首的一派，又大举进攻南宋。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宋恭宗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元軍分兵三路。包围临安。公元1276年，临安陷落，太皇太后（谢太后）領年幼的恭帝投降了元朝。

临安陷入元軍之手，各地抗元斗争仍继续进行。南宋丞相抗战派將領文天祥和張世杰、陸秀夫等人在福州拥立皇太子趙昰（shì是）为帝。在江西零（yá于）都大败元

军，收复赣州、吉州一些属县。转战于江西、福建、广东一带，坚持抗元斗争。公元1278年，文天祥转战到广东海丰北的五坡岭时，因寡不敌众，被元军俘获。元军劝他投降，他把被俘后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出作答。诗的最后两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了他宁死不屈的爱国决心。他被押到大都囚禁了三年，在狱中作了《正气歌》。歌中说：“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表达了他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最后，他慷慨就义。

公元1278年，宋帝赵昰死。张世杰、陆秀夫又立八岁皇子赵昺（bing丙）为帝，迁往广东新会南面小岛崖山，继续抗元斗争。公元1279年，元军攻崖山，陆秀夫坚贞不屈，背着赵昺投海而死。张世杰也溺死于海中。南宋灭亡了，元统一了中国。

元朝的统一，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发展，民族融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进入黄河流域的契丹族，女真族等，同汉族人民长期接触，不断融合，到元朝时已经称“汉人”了。唐宋以来，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到我国经商，在一些城市定居下来，被称为“回回人”。他们同汉、蒙古、维吾尔等族长期杂居共处，互通婚姻，到元朝时逐渐成为一新的民族——回民。

现在再补充讲一下蒙古西侵的历史。蒙古西侵前后有三次：（一）公元1218年到公元1223年，成吉思汗亲自率领第一次西侵，把蒙古的国土扩充到中亚细亚地区。（二）、公元1235年到公元1241年，窝阔台在灭金后，派遣拔都、拜答儿、贵由、蒙哥等率军第二次西侵，军锋直通东欧的孛烈儿（今波兰）和马扎儿（今匈牙利）等地。（三）、公元1253年到公元1258年，蒙哥派旭烈兀率军第三次西侵，力量发展到西南亚。蒙古军几次西侵，烧城市，杀居民，破坏农业生产，各地人民遭到巨大损害。其西侵结果，出现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汗国。这个汗国客观上在进一步沟通中西交通、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这个汗国只是一个不稳固的军事统治，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不久就分裂成几个独立的汗国。

四十九 元末红巾军起义

元世祖忽必烈死后，元成祖铁穆耳继位。再以后皇室贵族间时时发生争夺皇位的流血斗争。从公元1308年元武宗到公元1333年元惠宗（也叫元顺帝）的二十多年间，就换了八个皇帝。这些皇帝都腐朽昏庸，大权落在蒙古权臣手中。贪污成风，竭力压榨人民，“贼作官，官作贼”，“官人与贼人不争多”（差不多），人民极痛痛苦。最后一个皇帝元惠宗，更是荒淫残暴。人民实在受不了了，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民间广泛流传一首歌谣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终于在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

从公元1343年，黄河决口，洪水泛滥。有人建议，在黄陵冈（今河南兰考东）开挖河道。公元1351年四月，元王朝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夫二十五万人，到黄陵冈开河。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起义。他派了一些会徒去做挑河民工，在工地上传播一个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一天，在黄陵冈真的挖出一个石人来，仔细一看，正是一只眼。这正应了歌谣，这是天意叫“造反”了。于是刘福通又说：中国人民痛恨元朝的压迫，还在想念宋朝，打上宋朝的旗帜，号召力会更大。韩山童就宣布说，自己本姓赵，是宋徽宗的八代孙；刘福通是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代。他们就杀了一匹白马，一头黑牛，祭告天地。韩山童号称“明王”，元至正十一年五月，在颍州颍上（今安徽阜阳、颍上）发动起义。以“复宋”为号召，打出“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号。起义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起义军都信弥勒佛，每天烧香拜佛，所以也称“香军”。正在歇（shà）杀血立誓时有人走漏了消息，韩山童被捕牺牲。山童妻得儿子韩林儿逃武安（今河北武安）。刘福通逃出包围，率领起义农民，攻占了颍州，朱皋，在朱皋开仓帑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九月，红巾军就占领了汝宁（今河南汝南）、光州（今河南潢川）、息州（今河南息县）和信阳（今河南信阳）等地。

不久，徐寿辉、彭莹玉（彭和尚）也在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黄冈）起义，很快占领了武汉等长江中游地区。郭子兴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东）起义，朱元璋参加了这支队伍。此外，还有萧州（今安徽萧县）李二（芝麻李）、南阳（今河南南阳市）王权（布王三）、荆州（在今湖北江陵）、樊城（今湖北襄樊）孟海马起义。他们也都称自己为红巾军。

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浙东方国珍、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张士诚在高邮（今江苏高邮）起义。牵制了元朝的军力，壮大了红巾军的声势。

红巾军以燎原之势向四面八方发展，革命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元政府派遣也先不花率领三十万军向刘福通扑来，但慑于红巾军声威，元军夜惊，直呼“阿卜，阿卜”（阿卜是走的意思），尽弃军资器械逃走。公元1352年八月，元丞相脱脱出兵徐州，残酷地镇压了芝麻李的一部；西翼的布王三、孟海东也先后被镇压。脱脱又率百万大军镇压占领高邮的张士诚，但这时元朝廷内部发生内讧，公元1354年，元顺帝把脱脱撤职，百万元军失去统帅，不战自溃，四散逃奔，还有一些投降了红巾军的。元军溃散之后，刘福通联络河间北方各路红巾军，建立根据地。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二月，将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接到亳州（今安徽亳县），建立红巾军政权，国号宋，年号龙凤，韩林儿称帝，号小明王。

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红巾军分兵三路北伐。东路由毛贵率领，一直打到柳林、枣庄，离大都不过百多里，因受到元军阻击，又撤回山东。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率领，直驱塞北，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十二月攻占了上都，烧毁了“富夸塞北”的蒙古宫阙，转战于辽东各地。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率领，李喜喜入四川，余部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同年五月，刘福通攻占汴梁，以汴梁为都，造宫阙，易正朔，红巾军反元斗争至此达到高峰。

元政府为解除红巾军威胁，先下令要把汉人一概捕杀，并把蒙古、色目人迁谪在外者全召还京师；后又为收买汉族地主，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界限，凡起兵镇压红巾军者，都给以万户、千户、百户的爵赏；并收买、招抚方国珍、张士诚接受元官号，转而与红巾军为敌。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察罕贴木儿在颍州沈丘组织地主武装，答失八都鲁也在襄阳起兵攻红巾军。答失八都鲁军在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被刘福通歼灭。但察罕贴木儿的军队却日渐壮大，分兵镇守关陕、荊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成了红巾军的凶恶敌人。

大江南北的红巾军没有统一指挥，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虽有发展，可彭莹玉在战斗中牺牲。公元1360年，徐寿春也为其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自立为皇帝，国号大汉。北伐的三路大军缺乏统一布置，也无联系，给了地主武装以各个击破机会。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八月，察罕贴木儿的地主武装攻占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兵走安丰（今安徽寿县），这时，毛贵在山东被部属赵君用所杀，察罕贴木儿乘机进袭山东。山东丢失，安丰孤立，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张士诚围安丰，城破，刘福通遇难牺牲。

刘福通、韩林儿的红巾军失败了，但前后十三年，大小数百战，从根本上摧毁了元朝的统治，所以刘福通虽然牺牲了，可是元王朝也灭亡了。

五十 朱元璋起义和建立明朝

朱元璋，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人，小时家境贫穷，先给地主放牛，十七岁时入皇觉寺当和尚。五十天之后，庙里也无法存身，只好做游方僧。三年之后，他又回到家乡。这时红巾军点燃起的革命烈火已燃遍大半个中国，郭子兴据濠州起义。朱元璋就在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朱元璋打仗很勇敢，又有计谋，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郭子兴有个好朋友姓马，在他起义时病死了，马公临死时把孤女托郭子兴照顾，郭子兴就认马氏为义女。郭子兴很爱见马氏女，也赏识朱元璋，就把马氏许配朱元璋为妻，大家都称呼朱元璋为“朱公子”。

郭子兴军，共有五个元帅，平起平坐，时间长了，内部矛盾尖锐起来，其他四人都想谋害郭子兴，亏得朱元璋得到消息，才救了郭子兴。朱元璋看到要有所成就，先得有一支得力的人马，他就回到老家招募兵马，得到了大批生力军。有个李善长很有学问，也来投奔朱元璋。李善长建议朱元璋学习汉高祖刘邦，要气量大，能够任用人才，不乱杀人，才能统一天下。朱元璋就一心一意学习汉高祖。公元1355年春郭子兴病死，小明王韩林儿封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朱元璋为副元帅，因为朱元璋有基本力量，所以实权掌握在他手里。六月，强渡长江，占领安徽重镇太平。明天二月，进攻集庆（今南京市），郭天叙战死（一说被叛徒杀死），朱元璋就做了这支起义军名副其实的元帅。集庆城五十多万军民投降，朱元璋把集庆改名应天府。从此，他以应天府为根

据地，向江南一带发展。在应天府北有刘福通，西为徐寿辉，东是张士诚，只有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驻守着元兵，势力也较弱。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胡大海于公元1357年分别攻占宁国、徽州、池州，明年，又亲自率兵攻克婺（wù）州。公元1359年，继续攻占衢州、处州，皖南、浙东的东南部地区为朱元璋所占有。

这时，陈友谅已杀徐寿辉，建立汉国。他占据着江西、湖南和湖北，地广兵多，一心想吞并朱元璋。公元1360年，陈友谅率军直攻应天府。朱元璋听了刘基的计谋，先着部下康茂才（康与陈是旧识）写信投降，约陈友谅到江东桥接应。陈友谅果然中计，率军队到了江东桥，朱元璋部徐达、常遇春等伏兵一齐杀出。陈友谅两万兵士，一百多战船，被朱元璋军俘获。陈友谅抢了一条小船，逃命而归。公元1363年，陈友谅又带了六十万大军进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亲带二十万大军援救洪都。陈友谅兵撤鄱阳湖，朱元璋封锁了鄱阳湖口。陈军有大批高大的战船，排下十多里长；朱军尽是一些小船。双方连续打了三天，朱军连吃败仗。朱元璋接受部将郭兴建议，用七条小船，满载火药，每条船尾又带一条轻快小船。那天傍晚，正好刮东北风，朱元璋派出一支敢死队驾驶七条小船，乘风点火，直冲陈友谅大船。风急火烈，把陈军大船全部延烧起来。陈友谅军将士不是被烧死，就是被俘虏。陈友谅向鄱阳湖口突围，朱军一阵乱箭，把陈友谅射死了。第二年，其子陈理投降。至此，朱元璋消除了西方最大的威胁。这就是有名的鄱阳大战。

公元1365年，朱元璋又把兵锋转向张士诚。他先攻占高邮、淮安，又东向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其主力，然后进围苏州。公元1367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三吴平定。割据庆元、温州一带的方国珍也遣使归降。后朱元璋又分别派将攻取广东、福建。至此朱元璋已奄有东南半壁河山了。

为什么朱元璋能以消除江南各割据势力呢？主要的是，他占据应天以后，用几年时间，控制了皖南、浙东地区。他罗致了浙东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如刘基、宋濂、叶琛、章溢、朱升等，朱元璋对这些人非常倚重。例如前面所说他听取李善长意见，立志效法刘邦，“成帝王之业”。朱升向他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他也很赞赏。朱元璋很注意恢复农业生产，公元1358年，他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在各地修筑堤防，兴修水利，预防旱涝，经营农田。又设管理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选拔壮丁，农时种地，闲时习武，作为后备兵力。还多次免征田赋。这些措施，不仅使他控制地区人民生活安定，得到了人民拥护，且保证了自己军粮供应，有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公元1363年，他又把韩林儿接到滁州（今安徽滁县），借韩林儿的声威号召各部红巾军。可是在他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军后，就感到韩林儿无用了，且对自己有些碍手，就在公元1366年，派人在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趁小明王过江时，暗暗凿沉了船，害死了韩林儿。

这时的元朝呢？更加腐化堕落。元顺帝信任喇嘛僧，朝夕逸乐，宫廷政变时有发生，军力一蹶不振。扩廓帖木儿守河南，李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守关中，彼此之间，连年交兵，到处掠夺屠杀，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至正二十七年（公元

136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万大军北伐。宋濂等人草拟的讨元檄文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和“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檄文中责备扩廓、李思齐“假元号以济私，持有众以要君”，相互吞并，是人民巨害。并申明蒙古、色目人“愿为臣民者”，皆与汉人同等对待。朱元璋要求其军必须做到：“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北伐军在山东、汴梁、潼关等地，打败扩廓、李思齐、张思道军队。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连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顺帝带后妃、太子和一部蒙古大臣于八月二日从大都北逃。九月十四日，朱元璋军攻克大都。随后又进占了东北、西北和西南各地，完成了全国统一。

在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里，一些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混了进来，他们利用农民起义军做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朱元璋在地主阶级的拉拢腐蚀下，也蜕化变质，由农民起义军领袖，蜕化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皇帝，国号明，改元洪武，朱元璋就是明太祖。

朱元璋在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把他的儿子分封到各地为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闰五月，朱元璋死。可是太子朱标早在洪武二十五(公元1392年)就病死了。朱元璋死后，就由皇太孙朱允炆(wén文)继位，改元建文元年。朱允炆即位后，为巩固中央集权，推行“削藩”政策。明太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以“清君侧”的名义，率军南下，号称“靖难”之师。燕王一直打到南京，建文帝在宫中自焚死。朱棣登上皇帝宝座，是为明成祖。公元1403年，改元永乐。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明令迁都北京。第二年五月，正始开始北京城的修建，历时十三年，至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完工。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改称京师。

北京城由三部分组成。里面的一重是紫禁城，皇宫设在紫禁城中，所以也叫宫城，有许多宏伟精美的宫殿。宫殿外面是皇城。皇城的南部，东边是太庙、太社稷。皇城的西部，有西苑、海子和西宫。皇城的外面是京城。京城周围四十里，有九个门。京城里有宽广笔直的大街，规模宏大的仓库，高耸的钟楼鼓楼，还有许多民房、店铺、庙宇。北京城布局严整，建筑壮丽，是古代城市建筑杰作。

成祖迁都北京后，以南京为“留都”，并称“南北两直隶”。南京诸司的设置仍存在，称为“留守”。原诸司印信移到北京。北京从此成为明朝首都。

五十一 郑和下西洋及驱逐倭寇的斗争

郑和下西洋 明朝初年，国家富强。我国和亚洲及南洋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与政治接触频繁。为进一步加强同海外各国联系，明成祖派郑和出使“西洋”。“西洋”，指的就是今文莱以西的南洋群岛和印度洋一带。

郑和是云南回族人，小名三保，是个太监。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他第一次奉命出使西洋，至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前后二十九年，共七次下西洋。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他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港出港，所到的地方有：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满刺加、吉兰丹、彭亨（今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阿鲁、南勃里（今印度尼西亚）、锡兰山、瀾山（今锡兰）、榜葛刺、琐里、加异勒、柯枝、古里、南巫里（今印度），忽鲁谟斯（今波斯湾口），祖法儿、阿丹（今阿拉伯半岛）、卜刺哇、竹步、木骨都束、麻林（今非洲东岸索马里和肯尼亚）。

郑和的远航队规模很大，他每一次的船队有大船六十三艘，其中最大的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有十二面帆，需要二、三百水手驾驶，可容一千多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郑和率领官兵、翻译、采办、工匠、医生及水手二万七千八百多人，带着大量金银、丝绸、瓷器、铁器和布匹等。船队云帆高挂，出长江口以后，进入东海，向南航行。用指南针引航向，观察日月星辰判断方位，迎击狂风恶浪，智绕暗礁险滩，所到之处，备受欢迎。他们拜见当地国王，赠送礼物，表明友好往来，邀请他们派使节来中国。与当地官府和商人进行贸易，销售船队带去的货物，收购宝石、珍珠、珊瑚、香料等特产及少量钢铁等生产物资。在马来半岛满刺加还盖了仓库，船队从西洋各国回来，先在那里会齐，整理包装货物，待到五月南风起，再返航回国。有些国国王或派使臣，搭船到中国访问。他们带着鸵鸟、狮子、斑马、长颈鹿等珍禽异兽和其他礼物。明廷热情接待，回赠礼物，并在下次出航时，送他们回国。扩大了我国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我国人民同这些国家的友谊。

郑和七次远渡重洋，表现了我国人民英勇无畏的精神和高度的航海技术。这是世界航历史上的壮举，比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在十五世纪末，首次从欧洲航海绕过好望角，经东非沿海到达印度的远航，要早半个世纪，比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十五世纪末，从欧洲首次航海到达美洲的远航，也早半个世纪。

驱逐倭寇 十四世纪以来，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日本西南的封建诸侯，联合内战中一些溃兵败将，及一部分浪人和商人，组成海盗集团，携带武器，在海上进行掠夺抢夺。十五世纪下半叶，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争着来与明通商，他们有时竟在中国土地上厮杀，明世宗嘉靖初年，他们就在我国国土上发生了所谓“争贡之役”。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明采取闭关政策，可日本海盗就与沿海一带土豪、奸商勾结，进入内地，进行抢劫。嘉靖中期，倭寇更攻陷州县，烧杀淫掠，成为沿海人民极大祸害。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朱纨（wān丸）为浙江巡抚，认为倭寇之患在于“闽浙大姓”，就逮捕了一部分豪富、奸商，并积极训练海防军，堵击倭寇。但触犯了在朝的闽、浙官员，反被朝廷撤职查办，朱纨被迫自杀。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倭寇更大规模地侵扰上海、苏州及江北的南通、泰州各地。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又侵入徽州、南京。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倭寇攻掠福建长乐，城崩二十馀丈。虽然当地居民都纷起抗倭，并多次击败倭寇，但终未能驱逐倭寇。在此期间，爱国将领俞大猷（yóu尤）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三月，取得抗倭的“普陀山之捷”，烧毁了倭寨。第二年，又在“王江泾大捷”中歼敌一千九百多名。可是因为总督张经被奸相严嵩陷害，俞大猷也被牵连坐牢。倭寇就又猖獗起来。

戚继光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被明政府由山东调入浙江防倭。戚继光自幼就痛恨倭寇，他十六岁时曾慷慨赋诗说：“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立志保卫海防。戚继光决定训练一支精锐部队以击倭寇。他认为“第一可用”的是“乡野老实之人”。他到义乌募兵，选拔农民出身的矿工三千人，以每队二十人为一小队来编制队伍，进行严格训练。按照年龄大小、身材高低、分别使用滚铳（xiǎn显）、长枪、叉、刀等不同武器。作战时，紧密配合，人人发挥各自的长处。他并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研究了阵法。规定了严格的军纪，赏罚严明。擂鼓进军，虽前有水火，也不能退缩；鸣金退军，就是前有金银，也不能往取。这支部队扩大到二万人，战斗力特强，人称“戚家军”。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倭寇侵袭台州（今浙江临海）。戚继光带军赶到台州，九战九捷，全歼倭寇。第二年另一支倭寇，又到福建骚扰，戚继光又驰援福建。宁德的横屿岛是敌老巢。戚继光察看了地形，了解水道不宽不深，当晚潮落时候，戚继光命令士兵各带一捆干草，到了横屿对岸，扔干草到水里。几子捆干草，竟铺出一条大路。戚家军踏着草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进倭寇大营。神兵天降，盘据在岛上二千多倭寇全部被歼。攻下横屿，又转移至牛田。戚继光故意扬言：远路进军，人马疲劳，先就地休整。牛田倭寇信以为真，放松戒备。戚家军夜袭牛田，倭寇败逃兴化。戚家军跟踪追击，连放下六十多营寨。

戚继光回浙后，倭寇又于嘉靖四十一年攻陷福建兴化、平海卫等。这时俞大猷已出狱，并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副总兵官。俞、戚二人与广东总兵官刘显授军会师，先破平海卫之倭寇，又攻兴化，大败倭寇。不久，俞大猷调南赣，戚继光任福建总兵官。连攻敌寇，福建基本平定。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俞大猷调广东总兵官。大破盘据海丰之倭寇。第二年，戚、俞二军配合，大败盘据南澳的奸奴吴平率领的海寇，吴平企图逃往安南，被击溃。到这时，横行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寇，全被消灭或驱逐出去了。

五十二 资本主义萌芽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时间问题，史学界中分歧较大，一般讲是在明中叶，即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代（公元1522至1627年）的百多年内，由于明前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扩大，商品经济发展，在某些地区某些工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

明中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提高，商品经济有了发展。棉花、生丝、烟草、棉布、绸缎、纸张、瓷器、铁器和粮食等大量投入市场，成为交换的商品。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线，出现了三十多个较大城市。松江是纺织业的中心，景德镇是制瓷业的中心，成都是著名茶市，武昌是著名木材市城，扬州是食盐集散市场，广州、宁波、泉州和福州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大批货物从这里运销日本、南洋等地。这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资本主义关系也稀疏出现。纺织业，在我国长期以来是农民的一种副业。在唐、宋时出现了以纺织为生产的机户，明代中期以后，这种机户大量存在。苏、杭是以丝织业著称的大城市，苏、杭、嘉、湖境内的盛泽、震泽、濮院、王江泾、双林都是丝织业名镇。各个机户拥有织机若干台，雇机工数十人。苏州城里机工几千人，他们一无所有，只靠纺丝织技术，为机户雇佣。有固定工作的长工，也有临时工。临时工每日清早，聚集几处固定桥头巷口，等待雇佣。机工每天劳动到深夜，深受机户残酷剥削，一旦失业，就要挨饿。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应天巡抚曹时聘给明神州的奏疏中说：“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千数人，机房罢而机工散者又数千，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同时期的常熟人将以化说：“我吴市两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饷（yǒng庸）殮（sūn孙）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xiāo消，肚子饿），两者相资为生久矣。”机户掌握生产资料，剥削机工剩余劳动力，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丧失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是早期雇佣工人。他们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景德镇是我国的瓷都，在明代，方圆十来里，人口逾十万，陶户和铺店占十分之七八。这里有朝廷官窑厂，称“御窑厂”，也有民窑厂。官窑厂最多时有五十八座，民窑厂到明代后期有二三百座。民窑厂窑身大，容量多，生产快。每座窑烧瓷器千餘件，他们拥有大量的雇佣工人。据说神宗万历时“每日不下数万人”。窑户和陶工间是一种按时支付佣值的雇佣关系。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乐平县陶工为向浮梁窑户讨还佣值，曾爆发一场流血斗争。

在江南地区的浆染业、造纸业、榨油业、铸铁业也有类似情况。例如万历时，嘉兴的石门镇已有二十家大油坊专门榨油生利，油坊的内部已有一定的分工。所雇佣的油工“二十

家合之八百人，坊類數十人”，油工的工資是“一夕作值而二株”。

這些靠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工，是“自食其力的農民”，他們和機戶、客戶、作坊主的关系都不像是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或是宗法关系，已經是“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商品貨幣关系，已經從人身依附上自由了。按照明朝政府法令上規定：“有受值微少工作只計月日者以凡人論”，可知他們在法律上獲得了較自由的地位。雖然，在明代出現的這種生產关系还是很微弱的，但總算資本主義已開始萌芽。

在手工業中，已有比較細密的分工。如造紙業“一槽四人，扶頭一人，舂確一人，檢擇一人，焙干一人”。煉鐵業“煇者、看者、上礦者、取鈎（礦）砂者、煉生者而各有其任，晝夜輪番，約四五十人，若取炭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在蘇州紡織業中，有車工、紗工、織工、織工，在織綢時，也要經過“打綫、染色、改機、挑花”等分工。這種手工業部門分工日益細密的情況，已不像自然經濟中把手工業做為副業生產那樣一攬子的生產法了，它標誌著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加強。

不過明中葉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仍占全國主要地位，但商品經濟的發展，都市的繁榮，資本主義生產关系的出現，手工業生產分工的細密，都說明資本主義在我國已處在萌芽狀態。雖然資本主義發展很緩慢，但總說明封建社會已開始走向衰落。

由於有些大城市產生出資本主義萌芽，明政府也派了許多宦官到各大城鎮徵收稅的稅監。這些稅監苛收稅銀，還和流氓地痞，土豪劣紳勾結一起，撇開地方官府，另設稅署，敲榨人民，因此激起一些城市的反稅監鬥爭。這是資本主義萌芽後，在封建社會里，階級鬥爭的新現象。

五十三 明代的宦官專權

明太祖朱元璋時為防止宦官專權，不准宦官與外廷大臣交往，並在宮門內豎立三尺高石碑，上刻“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但由於明成祖朱棣在從他侄兒手中奪取皇帝寶座時，有些宦官立過功勞，因此，他開始信任宦官。到了宣宗時，宦官權力就更大了。司禮監秉筆太監，可以根據內閣所擬字樣，按皇帝的意旨，用朱筆批行，稱為“批紅”。到了明中葉以後，宦官權力日益膨脹，這裡舉四個權力最大也最壞的宦官說說。

（一）王振與土木之變

王振，是明英宗時的司禮太監。英宗朱祁鎮九歲即位，王振誘使英宗每日追求玩樂，唆使英宗用殘酷刑罰對待大臣，把朝廷的用人權、行政權、司法權及軍權和特務機構都掌握在王振等一伙宦官手里。王振以“周公”自比，英宗稱他為“先生”，公侯勳

咸称他为“翁父”，大臣们见了他都要下跪叩头。这时我国北方蒙古族瓦剌（la辣）部强大起来，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四路南犯，大同告警。大同离王振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州）不远，王振在蔚州有大批田产，他怕瓦剌侵占蔚州，就胁迫英宗亲征。兵部尚书郕野（kuang ye旷爷）和兵部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充分准备，不能亲征。王振不听，就调动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开往大同。这次出兵本无准备，军纪涣散，粮食缺乏，路上又遇大风暴雨，还没见敌兵，将士就已叫苦连天。到大同城边，前锋部队被瓦剌军杀得全军覆没，王振又急急下令撤回北京。可笑的是王振在撤退中又劝英宗到蔚州住几天。往蔚州跑了四十里，王振又怕家里庄稼遭受损失，复折往宣化，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西南）时，被瓦剌也先包围。这时禁军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这个祸国殃民的权阉，抡起大铁锤，朝着王振脑袋砸去，结果了王振性命。樊忠冲向瓦剌军拼杀了一阵，牺牲了。英宗看着没了办法只好跳下马来，盘腿坐在地上等死。瓦剌兵赶上来，俘虏了这个皇帝。这一仗，五十万明军，损失大半，也先很快兵临北京城下。兵部侍郎于谦采取紧急措施：第一，请郕王朱祁钰监国，这就是后来的明景帝；第二，宣布王振罪状，诛其余党；第三，反对南迁，坚决保卫北京。十月，也先驱兵到北京城下，被于谦打退。

（二）汪直设西厂

明代宦官掌握着厂、卫特务机构，明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正月，设西厂。西厂“所领提骑倍东厂”，专门在南北两京侦察异已，并对人民秘密结社进行严厉的镇压。汪直经常带领校尉出外侦察，把大小政事，以至衍谈巷语；都秘密报告宪宗。对百姓以至朝臣任意栽赃，陷害无辜，致使人人自危，道路侧目。他自己霸占民田，祸害百姓，占田竟达二万余顷。汪直深得宪宗信任，进退文武大臣，“势得天下”。在成化期间，西厂先后共存在六年，枉死人无数。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八月，御史徐鏞上疏说：“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自相表里。……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渐成羽翼，可为寒心。”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汪直用事》说：“有中官阿丑善诙谐，恒于上前作院本，颇有讽谏风。一日，丑作醉者酩酊状，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酩酊如故。又曰：‘驾至。’酩酊亦如故。曰：‘汪太监来。’醉者惊迫帖然。旁一人曰：‘驾至不惧，而惧汪太监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双斧趋跪而行。或问故，答曰：‘吾将兵，惟仗此两钺耳！’问钺何名，曰：“王越、陈钺也”。从此宪宗始轻汪直，后罢斥汪直，人民都拍手称快。

（三）“八虎”之首刘瑾

武宗正德时，有八个作恶多端太监：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人称“八虎”。刘瑾是“八虎”之首。刘瑾直接操纵内阁。内阁首辅等人甚至亲自到刘瑾家中处理政事。大臣们的奏章，都要写成两份，先用红本送刘瑾，再用

白本送武宗。刘瑾用马永成掌东厂，复设西厂，由谷大用掌管，在东、西厂之上，更设内行厂，他亲自掌管，连东、西厂特务也在他侦察范围。刘瑾声势煊赫，残害朝臣，进退大臣，祸害人民。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刘瑾在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正月，以神机营中军二司内官太监管五千营，至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八月伏诛。查抄其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升，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貂裘带二束，金汤合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裘，牙牌二匣，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袈裟八，爪金龙四，玉琴一，玉璫印一，盔甲三千。冬月团扇饰貂皮，扇中置刀二。衣甲千餘，弓弩五百。这些金银财宝甲衣，不仅表明刘瑾敲榨朝臣人民之多，更表明蓄意谋夺皇帝宝座，尤可笑更可畏者，当刘瑾被交刑部审讯时，他竟说：“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刑部尚书刘璟听后竟噤不敢声，可见其威焰之大了。当刘瑾被凌迟后，被害诸人，争买其肉啖之，有一钱易一膏者。又可见人对其痛恨之心。

（四）九千岁魏忠贤

魏忠贤是熹宗天启时可礼太监，在皇宫内罗织了支一万多人的宦官武装。魏忠贤与乳媪客氏勾结一起，二人狼狈为奸，把持皇宫朝政，内外大权全归魏忠贤。他有一群羽翼，内竖有王体乾、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多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有崔秀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煊主谋议，号“五虎”。武臣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襄、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还有一些小喽罗，都有“十孩儿”、“四十孙”等号。这些人结为“阉党”，在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亲信死党。他们排除异己，专权擅政，荼毒人民，无恶不作。内阁首辅顾秉谦“曲奉忠贤，若奴役然”。当时京城内外，遍布阉党暗探，只要有人说魏忠贤一句坏话，就会立刻惨遭捕杀。熹宗好亲作木工，魏忠贤奏事时，熹宗多不受管，只是说：“朕已悉矣，汝辈好自为之。”所以魏忠贤成了实际皇帝，“岁数出，辄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饶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袴握刀者，夹左右驰。”随从万人。所过处，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而魏忠贤看都不看一眼。客氏在宫中，胁持皇后，残虐妃嫔。全国各府、州、县，到处给魏忠贤建立“生祠”。臣民入祠必须跪拜，否则就要杀头。直到熹宗死后，崇祯帝即位，大臣们纷纷上书劾魏忠贤祸国乱政。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十一月，滴置去凤阳。魏忠贤行至阜阳，锦衣卫又赶来拘其入京。这时魏忠贤与干儿李朝钦对哭一场，双双解带，自缢身亡。客氏也拘至浣衣局，掠死杖下。

明朝廷中后期宦官专政之烈，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这也是明朝政治腐朽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自朱元璋建国以来，就依靠特务机关来统治臣民。锦衣卫与东厂等（简称厂卫）是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个办理刑狱衙门之外，执掌“诏狱”的特务机构。这些

特务机构，都是由宦官掌握。他们刑讯、杀人不遵守明的刑律，朝野臣民，只要“一入狱门，十九便无生理”，冤狱累累，人们称它为“冤容”。特务遍布朝野之间，连人民的生活琐事，家庭口角，特务机关也都能掌握。据说在京师有四个人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大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吓得不敢出声。这个人的骂声还未停，就忽有隶役进来，把四个人逮捕。魏忠贤褫夺了骂他的那个人，赏了其余三人钱。可见特务统治之严了。宦官掌握着特务机关，任意杀戮，朝野臣民，有谁不怕。特务统治与宦官专权相始终，愈演愈烈，直到明亡。

五十四 明末农民大起义

明自成祖以后，宦官专权，特务横行，政治一天比一天腐朽。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兼并日益激烈，到了后期，土地集中已到了空前程度。在四川，一个普通的地主就占有几十家佃户，在浙江和福建，有田的占十分之一，为人佃作食力的占十分之九；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地的绝大部分的肥田，都被王公勋戚地主豪绅侵占。明朝封建国家赋税也很沉重，多次借口辽东战事，无止境地加深“辽饷”，并强征了银、滥派差役，使贫苦农民沦为佃农、雇工、奴婢或流民、饥民。社会危机已到了无法挽救地步。明末，陕西北部连年发生灾荒，农民吃野草、树皮，吞白石粉，成千上万的农民的被饿死。封建官府却仍严刑拷打农民，催逼租税。终于激起了农民大起义。

明熹宗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白水王二首先起义。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府谷王嘉胤、安塞高迎祥和王左卦、汝南王大梁起义。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张献忠在延安起兵，称八大王。还有神一元、不沾泥、红军友、点灯子等都纷纷在陕北起义。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各支农民军转移山西、号称三十六营，部众二十餘万，并先后拥立王自用、高迎祥为盟主。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冬，高迎祥领导农民军冲破明军包围，履冰强渡黄河，乘胜向河南、湖广、四川等地进发。这时，高迎祥称“闯王”，农民起义军已发展为十三家，七十二营，五十多万人。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明军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山东，从两面夹击农民军。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会于河南荥阳，商讨作战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李自成（当时还是高迎祥部将）起了重要作用。他排除了张献忠和老回回在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提出“分兵定所向”，即联合作战，分兵迎击的战略方针。把军队分为四路，北、西、南三路以防御为主，东路积极进攻，突破明军包围。这就是有名的荥阳大会。说明农民军已懂得联合作战的必要性，改变了过去分散作战的方式，似这样集中各支起义军，共同商讨作战方针，组织大规模联合作战的做法，是以往农民战争所没有过的。

荥阳大会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率领主力部队，突破敌人东部防线，千里行军，直取安徽凤阳，焚毁明朝皇帝祖坟，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高迎祥在战斗中

被俘牺牲，李自成被拥戴为“闯王”。后来，起义军主力又分为两支，李自成率领的一支转战于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河南一带，张献忠率领的一支活动于湖北、四川一带。

现在简单补充介绍一下李自成。李自成（公元1606年——1645年），陕西米脂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小时为地主放羊，年青时因为欠下豪绅的债，被县令抓去带枷游街，他逃跑出来，奔往甘肃当边兵。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率领兵士起义，打回陕西，参加了高迎祥的起义军。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明兵部尚书杨嗣昌调集十省兵力，称之为“十网”，从四面八方对起义军进行“围剿”。在明王朝强大的军力下，几支起义军战败了，个别领导人投降叛变了。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十月，李自成在潼关战败，与刘宗敏等潜入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隐蔽下来。张献忠也在湖北“受抚”；还有一些农民军也“受抚”。但大量的农民军退入山区隐蔽，待机再起。起义军形势一时转入低潮。明政府也因要集中兵力抵抗满洲的侵犯，放松了对农民军的继续镇压。

明朝廷因军费短缺，在“辽饷”之外，又加派“剿饷”和“练饷”，农民真负担不了。加以崇祯十二、十三年间河南、山东、河北遭受旱灾和蝗灾，饥民揭竿而起者甚众。这些对李自成起义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湖北郧城重举义旗。李自成得到张献忠再举义旗消息后，也打出商洛山，先到湖北西北部，又折回陕西东南部，由小路攻入河南，各地饥民争相依附，不出几月，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一个更大的革命高潮出现了。

这时，有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牛金星、宋企郊、李岩、宋献策等也参加了李自成的起义军，李自成很重用他们。他们为李自成出了一些好主意。如杞县举人李岩，按照李自成的主张，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已经发展到要求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水平。起义军每到一处，打土豪，夺土地，分给农民，并且宣布“闾（juān）捐”免钱粮，五年不征，农民们唱着“迎闯王，不纳粮”，“早早开门迎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的歌声，欢迎闯王，投奔义军。李自成大力整顿部队，严格纪律，禁止将士私藏金银，禁止占住民房，禁止踏坏田禾，禁止杀害百姓，要“平买平卖”公平交易。以上这些口号和行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李自成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原来分散在河南、山东的袁时中，一斗粟、瓦罐子等农民军也加入了李自成年。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攻下洛阳，处死了贪暴的福王朱常洵，把王府数百万石粮食和数十万两金银分给农民。又大败傅宗龙、汪乔年、丁启睿率领的明军，占领河南全省，接着南攻湖广，破襄阳和湖北很多州县。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同年九月，在河南汝州歼灭孙傅庭的明军，乘胜破潼关，下西安，迅速占领全陕。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改西安为西京。建立官制，铸“大顺钱币”，造甲申历，废八股文取士，采用散文体的策论考取天下官吏。

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親率百萬大軍，強渡黃河，進山西，占太原，然後分兵兩路，一路由劉宗敏率領，經保定北上，一路由李自成統率，經大同，入居庸關。三月十七日南北兩路大軍會師於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攻破內城。就在這一天，崇禎帝在煤山吊死。住在彰義門（今北京廣安門）里的閩族人民，為起義軍打開城門。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命令起義軍整隊入城。劉宗敏率領大軍，首先從宣武門浩浩蕩蕩開進城內，北京人民張燈結綵，熱烈歡慶。中午，李自成頭戴毡帽，身穿青布衣，騎着黑花大馬，由數百騎精兵護衛，從德勝門進城。街道兩旁，人山人海，歡聲雷動。李自成穿過歡迎重圍，禁入紫禁。

這時，長江以南還有五十萬明軍思報“君父之仇”，山海關還擁有吳三桂帶領的兵，關外滿洲貴族正虎視眈眈就想侵入中原，占領區的地主武裝，也在暗中窺機破壞。這些都是李自成的大順王朝應當認真慎重對待的。可是農民軍一部分將領，被勝利沖昏頭腦，滋長了驕傲自大，和平麻痹思想，有的甚至追求生活安逸，喪失了農民軍本色，農民軍內部因此發生了分歧與不團結現象。從而，不能應付當時的形勢。李自成曾派人到山海關招降吳三桂，但吳三桂聽說李自成的將領劉宗敏拘禁了他的愛妾陳圓圓等家口三十餘人，便勃然大怒，竟退回山海關，向清兵乞師求降。打着為報“君父之仇”的招牌，接引滿洲軍入關，“沖冠一怒為紅顏”，“丹心已為紅顏改”。李自成聞訊後於四月十二日親征，大順永昌元年（1644）四月二十三，李自成與吳三桂激戰於山海關，李自成大敗。四月二十六日撤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即皇帝位，三十日撤離北京，向陝西敗退。

李自成退出北京後，一直退到陝西，又退到湖北，處境極其困難。清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四月，李自成來到湖北通山縣九宮山，閏六月察看地形時，遭到地主武裝襲擊，壯烈犧牲，年僅三十九歲。李自成死後，其餘部繼續戰鬥，並與南明政府合作抗清。直到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才告失敗。

張獻忠率領的一支起義軍，長期在長江中游作戰。明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進北京，張獻忠也占領成都。張獻忠在成都建國稱帝，國號大西，建元大順。清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冬，張獻忠迎擊清軍於川北西充的鳳凰山，遇到伏擊而死。張獻忠死後，余部繼續戰鬥，並與南明桂王政府合作，繼續抗清。

長達十八年的明末農民革命戰爭，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統治，但終因本身沒有擺脫小生產者的束縛，沒有建立穩固的根據地，長期採用“流寇主義”的作戰方式，特別是進占北京後，因勝利而驕傲輕敵，最後終於被滿漢強大的敵人鎮壓下去。這一次農民大起義雖然失敗了，但起義軍所提出“均田免糧”的革命口號，繼承並發展了宋以來農民起義軍“等貴賤，均貧富”的思想，豐富了農民革命反封建鬥爭的內容。起義軍轉戰南北，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統治，打擊了清朝的統治，推動了歷史發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五十五 清朝的建立

清朝是满洲族，满洲族的前身即宋时的女真族。金亡后，留在内地的女真人同汉族融合了。留在东北的女真人，分为海西、建州和野人三部。明洪武时，在辽东设立了辽东指挥使司；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又在东北设置了奴儿干都司，还先后设了一百八十四个卫所，来统治东北各少数民族。女真建州部在明初住在牡丹江上游长白山东南一带。永乐时，明封建州部首领阿哈出为建州卫都指挥使，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左都督。猛哥帖木儿就是后来清皇室的祖先。后建州部受野人部压迫，几经迁徙。明武宗正统以后，来到了赫图阿拉地方（今辽宁新宾县境），这时，明仍封其首领为都指挥。

十六世纪后期，隆庆、万历间，建州部人民学会了炼铁技术，生产也逐步发展起来。女真各部首领，为夺取奴隶、财产和土地，互相进行战争，这时明奴儿干都司下属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齐，积极为明防守东北边疆，明政府封他为龙虎将军。从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起，努尔哈齐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在统一的过程中，他把所辖的军民编成“八旗”。公元1601年，努尔哈齐改女真族原有的“牛录”制为“固山（旗）”制，建红、黄、白、蓝四旗，公元1615年正式建立八旗制度。增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每旗辖五参领（甲喇）、每参领辖五佐领（牛录）。牛录是编制的基本单位，一个牛录三百人。八固山（旗）约有六万人。这是一个军政合一的社会制度，满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平时耕猎，战时出征。皇太极时，又就降附的蒙古人和汉人编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与“八旗满洲”共同构成八旗的整体。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齐宣布自己做汗，定都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建立了金国，史称后金。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起，努尔哈齐就一直带军进攻辽东的明军，夺取了辽河流域大片土地，将都城迁到沈阳。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齐率兵攻宁远卫，明袁崇焕英勇抗战，金兵大败。努尔哈齐阵前受重伤，不久死去。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汗位，改女真族为满洲。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皇帝，改金为清，皇太极就是清太宗。皇太极逐步统一了全东北，从鄂霍次克海到贝尔加湖，从外兴安岭到日本海，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属于清政权统治范围。清与明成了两个并立政权，两家不时进行战争。清曾经打入长城，在河北、山东等地大肆掠夺。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打进北京，驻守山海关的明总兵吴三桂，向清摄政王多尔衮（这时皇太极已死，福临继位，多尔衮为摄政王）“乞师”，共同镇压农民军。清军进入山海关，李自成农民军退出北京。五月一日，清军进占北京。同年九月，清世祖福临从沈阳迁来北京，定北京为清朝首都。这一年为清顺治元年。

崇祯帝虽然死了，明首都北京虽然成了清政府的首都了，但明朝的一些文臣武将却建立了南明政权。1644年五月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在南京建立了福王政府。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春清军攻打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坚决抗战。但史可法受福王政府牵制，当时江北四镇兵力不听指挥。四月，清军围扬州，史可法困守孤城。清军统帅多铎给史可法写了五封劝降信，史可法却一直没有启封。四月二十五日，清兵破扬州，史可法战败被俘，不屈牺牲，清兵进入扬州，大肆屠杀抢掠了十天，人民悲痛地称清朝这次屠杀行动为“扬州十日”。扬州失陷了，清军于五月二十四日占领南京，福王被俘。接着江南苏松所属各城镇也为清占领。

顺治二年六月，清政府下令江南人民剃（tì）发。汉族人民以头发“受之父母”，蓄发是民族传统风俗，坚决不予接受。清军入关时，曾在北方下令剃发，三河县人民进行过坚决斗争。这次，江南人民也纷纷起来反抗，江阴、嘉定人民斗争最为激烈。清江阴知县方亨威胁人民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全城人民坚决回答说：“头可断，发决不可剃。”四方农民也拥进城内，一同杀死了方亨。江阴人民推周应元、陈明遇为领袖，同二十四万清军苦战了八十一天。嘉定人民也组织起来，据城不降。在江阴、嘉定在相继失陷后，又一次遭到清军的大屠杀。

顺治二年（公元1645）六月，明官绅张国维等又迎立鲁王于绍兴。不久，礼部尚书黄道周和郑芝龙等又立唐王于福州。他们虽抗清意志坚决，却不能合作对敌。清政府先后诱降了鲁王政府的方国安和唐王政府的郑芝龙。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六月，两浙失守，张国维自杀，鲁王逃亡海上。接着，清兵又打败黄道周，消灭了唐王政府。这时，张名振、张煌言等奉鲁王在浙江沿海一带继续抗清。瞿式耜（qí）、丁魁楚又在肇庆拥立了桂王。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九月，清军分三路向西南进攻。就在这紧急时刻，李自成部将李过、高必正、郝摇旗率领的农民军出现在湘鄂战场，他们和驻守湖南的明将何腾蛟联兵，挫败了清军的攻势。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清兵陷广州，攻肇庆，桂王政府辗转奔逃两广间。郝摇旗护桂王居柳州，并出击桂林清兵。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郝摇旗、李过与何腾蛟、瞿式耜等，连续大败清兵于岳州、全州，收复了衡阳、长沙等地。广东、四川一带农民军起而响应，已降清的将领，如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又叛清；清军后方的榆园军、吕梁山起义军和关中农民军也起而响应，陕甘回民也在米喇印、丁国栋领导下举行起义。抗清形势达到高潮。可是桂王政府内部却在这时出现了分裂局面，从而给了清军以喘息的机会。顺治六、七年（公元1649—1650年）间，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战役中被俘不屈而死。以后李过病死亡。李过子李来亨和郝摇旗、高必正、刘休纯等被迫率农民军回到巴东荆襄等地，组成夔东十三家军，独立进行抗清活动。

桂王政府正在困难时，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张献忠余部李定国、孙可望向桂王表示愿意联合抗清。李定国出广西，下桂林，反攻湖南，南入广东，前后败敌数

十万人，取得桂王政府空前大捷。同时，刘文秀出兵四川，大败吴三桂，克复川南各州县，并与夔东十三家军取得联系。活动在东南一带的张煌言、张名振也开始反攻。形成第二次抗清高潮。

正在这时，孙可望与李定国二人发生分歧，孙可望发兵进攻李定国，兵败降清。李定国独立坚持抗清斗争。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吴三桂攻下云南府城，桂王逃缅甸。李定国倾其全军埋伏于磨盘山，想一举歼敌追兵。伏兵计划被内奸泄露，结果失败。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吴三桂入缅甸，桂王被俘。李定国在勐腊（今西双版纳东南地区）忧愤而死。李定国反抗民族压迫斗争在明末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夔东十三家于康熙三年（公元1664）在清兵围攻下失败，李来亨全家自杀，这支农民军全部壮烈牺牲。至此，清政府镇压了农民军，消灭了南明政府，完成了统一大业。

五十六 郑成功收复台湾和台湾回归祖国大陆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南宋政府在澎湖建官设治，隶晋江县（在今福建省南安县东沿海泉州湾内）。元代，在澎湖设立巡检司。明政府继承元朝办法，设立澎湖巡检司，作为管辖台湾、澎湖地区的地方行政机构。明政府还派出使者巡视平嘉山（澎湖山）、钓鱼屿（钓鱼岛）、黄毛屿（黄尾屿）、赤屿（赤尾屿）等岛屿，把那些地区列入明政府的海防范围之内，行使对那些岛屿的管辖权。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荷兰人侵入台湾，在安平修筑城堡。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西班牙人又侵占了北部的基隆，不久又扩大到淡水。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荷兰人打败西班牙，西班牙退出台湾北部，荷兰人霸占了全岛。

南明政府桂王于公元1658年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第二年郑成功一直打到南京近郊，占领了四州、三府、二十四县。但后来为清军所败，郑成功退回厦门。这一形势，促使郑成功定下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人的计划。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初，郑成功大修船舰，准备进入台湾。四月二十一日除留一部兵士守卫厦门、金门外，郑成功亲率大军二万五千人，从金门出发，第二天到澎湖，二十九日在台湾南部鹿耳门内禾寮港登陆。五月初，歼灭荷兰携一派来的乌镇兵数百人，赤崁楼守将投降。但揆一还死守赤崁。郑成功致信揆一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尔归。”揆一不听，郑成功围攻赤崁城，断绝揆一守军接济，并击退从爪哇来的荷兰援军。荷兰殖民军被围攻九个月，士兵死伤一千六百余人。揆一于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二月一日向郑成功投降。揆一半残兵败将及官吏、商人，狼狈退出台湾。郑成功在台湾设置府县，建立行政机构，招徕大陆移

民，屯田垦荒，又派遣汉族农师向高山族传播先进生产技术，加速了台湾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绩，受到后世人民的崇敬。

但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仅八个月就病死。其子郑经、孙郑克塽世袭延平郡王，继续统治台湾共二十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康熙帝又收复台湾，台湾回归祖国大陆。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台湾为根据地，进行抗清斗争。郑成功死，清王朝统一了中国大陆。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清攻取闽、粤沿海，郑经丧失了在全国、粤沿海地方。从此，郑经日趋萎靡，嬉游为乐；他的几个弟弟也恃势欺压人民。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郑经死，他的儿子郑克塽立，年仅十二岁，只是权臣手中的一个傀儡。郑经时，曾向清政府表示愿称臣入贡。所以郑氏占据台湾的性质，已变成一个割据性的政权了。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清政府就派人与台湾郑经多次谈判。郑经提出：

（一）“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可以对清政府称臣入贡，象琉球、朝鲜那样，只同清保持藩属关系；（二）郑氏世袭台湾统治权。（三）不剃发，不登岸。康熙帝反驳说：郑经是中国人，台湾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既称臣，就必须听朝廷调遣。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闽浙总督姚启圣在漳州设“修来馆”（又名“招来馆”），对郑氏集团起义归来将士隆重、热情接待。瓦解了郑氏集团，台湾“兵心已变，不可收拾”，陆续从台湾来归的文武官员及士兵有好几万。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夏，清在澎湖海战中击败郑氏主力部队，清军统帅施琅执行了优待郑氏俘虏政策，并派反正人员去台湾谈判，力争台湾和平回归祖国大陆。台湾郑氏集团已无力抵抗，有人主张逃归日本，建立流亡政府。提督刘国轩说服掌大权的郑克塽外祖父冯锡范与郑克塽，同意回归祖国大陆。台湾派冯锡圭等与施琅在澎湖谈判，达成协议。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中秋节前两天，清军入台；中秋节后三天郑克塽正式率台湾文武官员向清方缴册印归降。郑克塽及其部下多人被迎送到北京，受到清朝廷优礼相待。康熙帝特授郑克塽为正黄旗汉军公；并下令说：郑成功、郑经不是“乱臣贼子，归葬南安”，授刘国轩为正黄旗汉军伯，天津总督，并特赐宅第。从此，台湾又复归祖国大陆。

台湾回归祖国后，施琅建议说：台湾“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渔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地俱植修竹”。它不仅是富饶地区，又是东南数省屏蔽，在国防上处于极重要地位。“曾为红毛住处，无时不在凝贪。……若为红毛所有……窥窃道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清政府认为施琅说得切合实际，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在台湾设置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并在台湾驻兵八千名，澎湖驻兵二千名。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在原诸罗县境内增设彰化县及淡水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又设噶玛兰厅。据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时统计，台湾有人口二百万三千八百六十一人。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台湾回归祖国，祖国实现了大统一。台湾文化、经济得到大发展，巩固祖国海防，保障了祖国东南门户。

五十七 鸦片战争

禁烟运动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使一个独立的、封建的中国，逐步的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清自嘉庆以来，政治日趋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支绌，危机四伏，国力显著下降。清政府日趋衰弱，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正处在上升阶段。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正疯狂地在世界各地寻找市场，向外扩张。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就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可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资本主义工业品的侵入有顽强的抵抗力，清朝限制对外通商的政策，即所谓闭关政策，也起着保护封建经济的作用。英国的棉布、呢绒等工业品，很难在中国市场销售。但英国还要购买中国的茶叶、生丝，外贸上中国一直居于出超地位。为改变这种情况，英商把大量鸦片运销中国。这样，中国的白银源源外流，鸦片战争前的十多年，白银外流数目达一亿两。官、兵吸食鸦片，身体衰弱。精神萎靡。正如当时爱国官员湖广总督林则徐向道光皇帝上书中所说：“如听任鸦片输入，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为此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林则徐到达广州，与英商务监督义律进行了坚决地不妥协的斗争，追令义律交出鸦片两万多箱，重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六月三日，林则徐把收缴的鸦片集齐虎门，在海滩挖好两个大销烟池，先把鸦片倒进水池，然后抛进大量石灰，以铁耙翻搅，霎时石灰熔化，池水沸滚，浓烟满天。焚烧二十多天，全部烧尽。虎门销烟，向全世界人民表示了中国人反侵略启无惧斗志，给侵略者以无情打击。公元1839年六月三日，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值得纪念的日子。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第一幅巨型浮雕，就是虎门销烟的壮观场面。

英国发动侵略战争 英国在林则徐销烟之后，借口保护通商，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六月，英兵舰进犯广州。林则徐严密防守，并发动群众侦察敌情，协同作战。英军见广州有备，转攻福建厦门，闽广总督邓廷桢率军抵抗，打退了敌人。八月，兵舰驶向天津海口。穆彰阿和琦善等投降派，攻击林则徐“禁烟过激”，宣扬英军“船坚炮利”。昏庸的道光帝撤了林则徐，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请英军同意到广州谈判。琦善一到广州，就撤毁了防御设备。公元1841年双方正在谈判时，英军突然袭击，攻破虎门外两个炮台。琦善在惊怕中妥协投降，同英国签订了割香港、赔烟价的《穿鼻草约》。

道光帝认为割地赔款有损尊严，决定对英作战，派皇侄奕（YI）山到广东主持军事。奕山未到，英军又攻虎门。守将关天培率四百多将士与敌死战。琦善拒发援兵，关天培与将士弹尽力竭，壮烈牺牲。奕山到后，日夜饮酒作乐，毫无作战意志。五月，英军进逼广州城，奕山在城上竖起白旗投降。

中国的人民在敌人面前是不会屈服的，中国人民与敌人有血战到底的精神。英侵略军在广州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遭到人民的抵抗，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五月二十九日，英军到广州北郊三元里奸污妇女，当场被打死八、九人。三元里人民为抵御英军再来侵扰，组织了起来，以三星旗为令旗，庄严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当天下午集一〇三乡代表开会，决定向英军进行战斗。五月三十日诱英敌至牛栏岗，七、八千群众包围了英军，恰逢大雨，人民群众愈战愈勇，英军在泥水中被长矛、大刀杀死二百多名，伤者无数，活捉十多名。从此英军龟缩炮台之内，再不敢耀武扬威了。三元里人民的反英战斗写下了反侵略斗争的英雄史诗。

英政府对《穿鼻草约》还不满足，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九月再次进兵，又攻陷浙江定海，占领镇海、宁波。第二年六月，又进犯长江门户吴淞。七十岁的老将陈化成奋勇抵抗，亲自点燃大炮，击伤英舰，七处受伤，血染战袍，毫不后退。后终因英敌包抄，又无援兵，全部将士英勇牺牲。英军占吴淞、窥上海，犯镇江。八月，英兵舰进至南京江面。至此清政府向英侵略者屈服了。

英侵略者发动无耻的鸦片战争，林则徐抵抗于前，关天培、陈化成血战于后，三元里人民奋勇战斗，使敌人丧胆退缩。但清皇帝昏庸怯弱，卖国贼无耻投降，致使战争失败。

《南京条约》及其附约 英军兵舰驶进南京江面，清政府连忙派人到军舰上去求和。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英国贼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同英国殖民主义分子璞鼎查，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接着，英国又强迫清政府于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七月二十二日在香港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同年十月八日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作为《中英南京条约》的补充。《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主要内容是：

- 1、割香港给英国；
- 2、中国赔偿英国鸦片烟价六百万两，高欠三百万两，军费一千二百万两，共计二千一百万元；
- 3、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的货税、餉费”，须“秉公议定则例”。实际是控制了关税；
- 4、开放广州、福建、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英国在五处派驻领事，每处派军舰一艘驻守；
- 5、英国商人可自由与中国商人通商；
- 6、凡为英效劳的汉奸，一律免罪，已被监禁者“加恩释放”；
- 7、中英商民之间发生纠纷，英国人由英国处理，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这就是领事裁判权；
- 8、中国以后给其他国的权利，英国可同样享受，这就是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十分跟红。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二月，美国政府派国会议员顾盛为专使，随军舰前来中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两广总督耆英与美谈判，于七月三日在澳门附近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美国不费一兵卒，就获得英国在《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中所夺取的除割地、赔款以外的全部特权，还有些地方超出了《南京条约》的范围。扩大了领事裁判权，连美侨与任何外国侨民在中国发生诉讼，都要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不得过问”，更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权，中国改变关税，必须得到美国领事同意，美国兵舰可以任意在中国各港口巡查，进一步侵犯了中国的领海权，美国还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和医院。

同年，法国也派专使刺尊尼来中国，胁迫清政府于十月二十四日，在广州附近黄埔的法国军舰阿吉默特号上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中法《五品通商章程》）。获得了除英美两国在条约中规定的侵略权益外，也有些地方超出了上面两条约。条约规定法国人在五口通商口岸居住，无论人数多寡，清政府都必须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不受限制。本来，这一条款并没提出租界问题，可是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英国在上海设立英租界之后，法国侵略者起而效尤，并无理地把上述条款作为勒索和扩大租界的借口；又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口岸建造教堂、医院、学校、坟地，如中国人“触犯毁坏”，中国地方官要“严拘重惩”。

鸦片战争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丧失了独立的地位。继英国占领香港之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葡萄牙强占了澳门。英、美、法等国先后在上海等地开辟“租界”，并取得“租界”中的行政、司法、警察权，把“租界”变为“国中之国”，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第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我国的领海主权、司法主权，都遭破坏。允许建立和保护教堂的规定，使披着传教士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可以到处进行政治、文化侵略和间谍活动。海关主权的丧失，使中国开始变成世界共同宰割的对象。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情况更加严重，五十年代每年输入的鸦片由四十年代的四万多箱增至六万多箱。鸦片贩子每年从中国掠夺走一千万以上的白银。白银不断外流，银价不断上涨，劳动人民负担大大加重。资本主义工业品开始倾销中国市场，以英国输入中国的棉纱棉布为例，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后三年增加了一倍半。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对外贸易，也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可是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主权都已遭受严重损害，中国的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附属品。中国的社会经济开始具有半殖民地封建性质了。中国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解体了，小农经济逐渐破产，民族资本主义却也发展不起来。

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战前，主要是农民和地主两大对抗阶级。战后，买办和买办商人在外国侵略者培植下成长起来，为外国资本家服务。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国土上任意横行，欺压中国人民。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鸦片战争不仅使着中国社会性质转变了，而且也使中国社会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的最主要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4页）从此以后，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就是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因此，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五十八 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中国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历史（近代史部分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段历史）。在近代史上被称为革命的三大高潮是：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清政府为支付战费和赔款，加紧搜括民财，赋税增加了几倍，白银继续外流，银价不断上涨；政治腐败，各级官吏贪污成风；又加以连年水旱灾害，大批人民无衣无食。农民反抗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到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的十年的时间内全国人民起义有一百多次。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终于出现了强大的革命风暴，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金田起义前的准备时期 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在村塾中当过教师。道光十七年、二十三年（公元1837、1843年）两次到广州应试，都没有考中。他决心抛弃科举，准备起义。在广州他看到基督教的《劝世良言》，便与同学冯云山等研究，附会书中词句，说自己接受了上帝的天命，创立了“拜上帝教”又称拜上帝会或上帝会。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传教，农民百余人入教。第二年，冯云山转入桂平县紫荆山向矿工宣传，洪秀全回花县作传教文书。洪秀全先后作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党世训》三文。《救世歌》提出：“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在政治上人人平等。并指出“嗜杀人民”的统治阶级如“草寇”，人民杀“草寇”完全是正确的。《醒世训》提出：满洲贵族、地主、官吏等都是“反上帝之真道”的“妖魔”必须杀逐，才能“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引述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为大同”一段话，要实现“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上德”的太平世界。这种经济上追求平等的要求，是一种主观的农业社会的想法。《党世训》指出

了战斗目标，他指清朝皇帝为“阎罗妖”，一切政府官吏都是“阎罗妖之妖徒鬼卒”，把上帝与人间皇帝对立起来，说“他是何人，敢居然称帝，妄自尊大”。要人民向“阎罗妖”——皇帝战斗。这三篇论文，奠定了太平天国的理论基础；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就是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要求平等的民主思想。洪秀全在要求农民起来敢于与阎罗妖战斗的口号鼓舞下，号召组织了人民，发展壮大起义力量。

冯云山在紫荆山以传教为名，秘密组织群众。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发展了两千多人参加拜上帝教。烧炭的贫苦农民杨秀清、肖朝贵，地主乡绅韦昌辉、石达开都参加了拜上帝教，成为领导骨干。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洪秀全去广西和冯云山等开始秘密商讨发动起义。这年冬，桂林地主团练拘捕冯云山，拜上帝教同地主武装发生激烈的斗争。由于拜上教的营救，冯云山被释放出狱。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前后，广西连年发生荒灾，饥寒交迫的农民不断起来抗粮抗租。革命时机已经成熟。

金田起义和定都天京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七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会众于十一月四日前到紫荆山金田村集合。集合后受到清政府的阻挠，于十二月大破清军。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公元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诞辰，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太平军从金田出发，攻入武宣东乡。洪秀全在东乡称天王。九月二十五日，攻占永安城，在那里制订官制，颁布军律和历法，分封诸王。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各王都受东王节制。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四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向桂林进军，北上占领全州。在全州战役里，冯云山中炮牺牲。六月，进入湖南，在道州一带有四、五万农民和大批挖煤工人参加太平军。九月，包围长沙，肖朝贵中炮牺牲。十一月底，从长沙撤围，向湖北进军。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一月攻取武汉。当时太平军已发展到五十万人，战船一万只。二月，分水陆两路，沿江东下，向南京挺进。三月十九日，占领南京，改名天京，作为太平天国都城。从1850年七月在金田集合，1851年1月11日起义，到1853年3月，仅两年多时间，就占领了南京。这是太平天国革命形势飞跃发展阶段。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清军在南京东孝陵卫扎营，建立江南大营，在扬州城外扎营，建立江北大营。并让汉族地主举办团练武装，镇压太平天国。这样，湖南湘乡官僚地主曾国藩的湘军产生了。

《天朝田亩制度》 洪秀全定都天京后，颁发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了改革土地制度办法和其他社会改革措施。提出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突出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但是这种绝对平均分配土地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太平天国仍旧采用“照旧交粮纳税”的办

法，允许地主收租交纳赋税。《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并设有女馆，让女子学习技能，女子可以参加考试、做官、作战。还废除买卖婚姻，禁止妇女缠足。他们把妇女看作姐妹，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妇女，提高了妇女地位。

北伐与西征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四月，洪、杨派林凤祥、李开芳率两万多人北伐。五月，从扬州出发，战安徽、河南、山西，进入直隶，逼近天津。但北伐军孤军深入，武器和粮食供应不足，又缺乏冬衣，斗争十分艰苦。十一月，进攻天津时失利。第二年南撤，太平军援军，也在山东临清被击溃。五月，北伐军分两路，林凤祥一路留守直隶连镇，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三月初，连镇被清军攻陷，林凤祥在突围中中箭被俘，在北京英勇就义。另一路由李开芳率军南下，退守山东茌（chí）平县冯官屯，五月，清军引运河水灌冯官屯，李开芳全军淹没。北伐军浴血奋战两年，驰驱六省，转战五千多里，震撼了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鼓舞了北方人民斗争。但由于太平天国领导在战略上失误，孤军深入，后援不济，结果全军覆灭。

要确保南京，必须占有长江上游武汉、九江、安庆三大据点，关键就在于武汉的得失。太平军与反革命湘军长期战争，实际就是这三大据点的争夺战。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与北征军出发同时，洪秀全又派出西征军。六月，胡以晃攻克安庆，不久，西征军又攻克九江，占汉口、汉阳，取武昌。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八月，曾国藩破岳州，占武汉，攻九江，石达开守安庆，援九江，破曾国藩军。第二年一月，石达开领导胡以晃、罗大纲在鄱阳湖击败曾国藩水军，夺得曾国藩座船，曾国藩曾经投水寻死，被小船捞起。石达开乘胜攻克武昌。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初，石达开以数千兵力，自率敢死队夜袭樟树镇湘军，湘军畏石达开如畏虎，竟不战而溃，从此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多县为太平军占领。曾国藩此时率湘军的四分之三兵力与西征军争武汉，两军正在肉搏紧张时刻，却由于公元1856年9月太平天国发生了杨韦内讧，石达开被洪秀全自武昌洪山召回南京，湘军于十二月攻陷了武昌。

上海天地会起义 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后，人们预料太平军必攻上海，上海有广东人八万，福建人五万，准备响应。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九月，广东天地会匕首党（小刀会）首领刘丽川等攻占上海城，用“大明太平天国”名义出布告。在美国教士家中发现冯云山幼子，立即欢迎入城，可见天地会对太平天国的拥护。刘丽川给洪秀全上奏摺自称“臣”。但奏摺半路被清军截获，太平军也未派兵支援刘丽川。清军在租界外国侵略者的援助下，围困上海十七个月。起义军军粮断绝，突围而走。上海又被清军占领。

太平军击破清江南、江北大本营 此时江南、江北大本营加紧围攻南京，太平军形势危急。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四月，李秀成击破江北大本营；六月，李秀成、陈玉成进攻江南大本营向荣部队，石达开率军来援，李、陈、石及镇江来的太平军三面奋击，大破

向荣军。张国梁扶向荣逃往丹阳。三、四年来围困南京的江南大营，一战瓦解。

太平军金田起义，直取南京。可是在错误的战略指导下，北征失败，西征虽屡取胜利，却因杨韦内讧，武汉又陷湘军之手，上海天地会起义，未去支援；江北、江南大营被击破后，围困南京之敌虽已撤去，却内部斗争开始，产生混乱，从此，革命逐步由防御、退却走向失败。

太平天国内讧 洪秀全于永安封王时，封、杨秀清以东王节制各王的权力，杨秀清权力日大，洪秀王退居闲散，成为名义上的领袖，而大权却在杨秀清手中。加上两个人在南京，大兴土木，制作仪礼，严格等级秩序的做法，从而越来越脱离群众。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太平军破江南大营，向荣率领的清军大败后，南京之围已解，杨秀清威望日高，竟“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为万岁”。洪秀全虽被迫应允，却命令韦昌辉从江西回南京密商对策。韦昌辉立带三千人回南京，于九月一日深夜冲进东王府，杀死杨秀清全家及其部下两万多人。十月，石达开从湖北驰回，责韦昌辉杀人太多。韦昌辉又想杀石达开，石达开逃安庆，韦昌辉杀了石达开全家。韦昌辉又图谋杀害天王洪秀全，激起太平军将士的愤怒。洪秀全号召“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人心乃定”。这一场大杀，大大损伤了太平军元气。

韦昌辉之乱平定后，石达开回天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洪秀全却有不乐之心，专用安（洪仁发）福（洪仁达）两王、安、福二王“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固）执”，众人“甚不欢悦”，石达开处处受“挟制”，终“被忌挟制出京”。在这种局势下，石达开带领五、六万人，脱离洪秀全，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等省，处处失利，力量日弱。一些将士要求返回天京，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吉庆元等脱离石达开回天京，受到洪秀全嘉奖。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五月，石达开带部在四川大渡河边陷入清军包围。六月，石达开被杀死，全军覆没。

太平天国的防御战 杨韦内讧，石达开出走，太平军力量削弱。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五月，九江失守，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南京又处于包围之中。洪秀全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将领，担任军事工作。八月，陈、李等大会于安徽枞（zongqun）阳，议定先破江北大营。九月，陈、李攻破江北大营。十一月，陈率军在庐州三河镇大败湘军，围安庆，清军逃窜，稳定了天京上游战局。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四月，洪仁玕从香港来天京。洪秀全当即封为干王，总理朝政。同年，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第二年五月，陈、李又大破江南大营。陈玉成又进行了安庆保卫战，李秀成则开始率领东征军向清军进攻，从而全力打破了清军对南京的进攻。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五月，李秀成奉命率兵东征。克常州、无锡、苏州，占浙江嘉兴，不到两个月，江浙大部富庶地区被太平军占领。东征军开辟了江浙根据地后，决定西上夺取江西、湖北。九月，太平军开始第二次西征。洪秀全命陈玉成部从北路，由安徽入湖北；李秀成部从南路，由江西入湖北。约定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四月两军会师武汉。三月，陈部逼近武汉，可李部因过高估计湘军实力，改道从徽州往浙江，转入江西，直至六月才到达武汉外围。由于会师误期，安庆告急。四月，陈玉成被迫回救安庆。在安庆外围，陈玉成与湘军展开激烈战斗。九月，安庆失陷，陈玉成退守庐州（今安徽合肥），湘军包围庐州。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四月，庐州失守，陈玉成率残兵往寿州（今安徽寿县），被团练苗培霖诱获，献给清帅胜保，敌人诱逼他投降，陈玉成大义凛然地回答：“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六月，陈玉成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六岁。这个太平军后期的两大支柱之一的军英王，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帝国主义这时也与清政府紧密配合，疯狂镇压太平军。美国人华尔组织了洋枪队，英、法、美三国在上海成立了反动武装；俄国送给清政府一批枪炮；李鸿章的淮军，也由帝国主义帮助从安庆运到上海，进攻太平军。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四月李秀成猛攻上海，在太仓、嘉定、青浦等地连毁敌营一百三十多座，打伤英海军上将何伯，打死法海军上将卜罗德、活捉“常胜军”付统帅美人法尔思德。但在上海城下受到洋枪队猛烈阻击，又因天京危急，不得不回救天京。

天京保卫战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春，中外反动派分三路围攻太平军：一路由曾国藩率湘军主力从安庆进攻天京；一路由李鸿章淮军伙同英人戈登的洋枪队进攻苏州、常州；一路由左宗棠率湘军从江西进攻浙江。曾国藩驻守安庆，策应三路。六月，曾国藩逼近雨花台，围攻天京。李秀成同湘军大战四十天，没有打退湘军。第二年六月，雨花台失陷，天京危急。十二月，李鸿章与戈登洋枪队攻苏州，屠杀太平军和人民十多万。李秀成劝洪秀全放弃浙江，向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发展，洪秀全不听，李秀成只好独身保卫天京。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天京成了一座四面受敌的孤城。洪秀全于六月三日逝世。七月十九日湘军猛攻天京，火药轰塌城墙二十多丈，清军蜂拥而入。太平军与敌展开巷战，决不投降。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壮丽诗篇，为中国历史增添了光辉。李秀成带着十六岁的幼天王，从城壕缺口冲出，但出城不久，就被敌冲散。李秀成被俘，他在曾国藩的威逼利诱下无耻地写了一份自供。在写完自供当天晚上，就被曾国藩“凌迟处死”。幼天王洪福逃往湖州，同洪仁玕会合。在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坚持斗争，但都先后被俘牺牲。洪仁玕就义时，在绝命诗中写道：“天国祚虽斩，光复待来年”。表现了革命者坚贞不移的气节。

太平军余部与捻军继续战斗 南京失陷了，洪秀全、李自成及其他太平军英雄们牺

牲了，太平天国灭亡了，但并不等于革命消灭了。太平军余部和捻军继续奋战达四年之久。侍王李世贤在同治五年（公元1866）被镇压下去。遵王赖文光与捻军在山东曹州杀死僧格林沁，同治五年（公元1866）在河南许州分为东西两支，赖文光率东捻军转战山东，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一月，不幸被捕牺牲，东捻军失败。西捻军转入陕西，到八月最后失败。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与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主要是其领导人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和纲领，在前期胜利后，保守思想滋长，进取心减退；特别是安乐思想支配了领导者。洪秀全深居宫中，不见群臣，生活腐化。这点中外各书记载大体相同，是可信的。在领导集团中，又发生了争权夺利，宗派相斗，终于演成流血的内讧。太平天国由于这些本身的弱点，加以中外反动派的强大，终于失败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的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坚持战斗达十四年之久，势力发展到十八个省，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它是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战争不断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我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出现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对后来的农民革命斗争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有很大影响。

五十九 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发动侵略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对其既得利益还不满足，当时又正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高潮时期。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夏，英、法、美三国提出修改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公使驻北京等，并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作为交换条件。清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侵略者就准备发动第二次侵略战争。这时，沙俄也派兵船七十多只，闯入黑龙江，在下游一带屯兵筑垒，实行军事占领。清政府提出抗议，沙俄不仅置之不理，且继续扩大侵略活动，强占了黑龙江上游、中游北岸和下游两岸大片土地。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十月，广州水师在珠江上扣留了一艘走私鸦片的中国船“亚罗号”，逮捕了十二名中国水手。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借口这船在香港领过登记证，硬说是英国船，发动武装挑衅。在此之前法国一个私人广西内地的传教士神甫马赖被杀，也以此为借口进行挑衅。英、法两国就发动了侵略战争。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十月二十三日，英国派军舰闯入珠江，炮轰广州，并一度攻入广州城，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击，才不得不从城内退出。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七月，英国额尔金率英侵略军抵达了香港；同年十月，法国葛罗率法侵略军也抵达香港，英法共同组成英、法侵略联军，共约五、六千人。美国没有正式出兵，

但也派列卫廉为全权公使，同英、法配合行动。沙俄也派普提雅廷到北京，迫使清廷承认其在黑龙江一带强占的土地归沙俄，清政府拒不接受，普提雅廷便取道南下，与英、法携手，想借英、法侵略军进攻中国的机会，达其侵吞中国领土的罪恶目的。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十二月，英、法联军向广州发动进攻，并占领了广州。三元里和广州一带人民坚决抵抗。英法联军又于第二年四月北上大沽口。俄、美两国公使假装调停，随同北上。五月，英法联军轰击大沽口炮台，炮台失陷，侵略军占领天津。清政府在害怕中与英、法及俄、美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春英法两国又借口来中国换约“受阻”，再次发动战争。八月，派军舰闯进大沽口，占天津。十月初，攻到北京西郊。咸丰皇帝急急逃奔热河。

英、法联军到北京西郊，闯进圆明园。圆明园规模宏大，建筑华丽，宫殿里收藏着无数的艺术品和珍贵的图书文物。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十月六日，英法侵略军把圆明园抢劫一空，能拿走的全抢走，拿不动的任意破坏、践踏、棒击，必粉碎而后快。英国《泰晤士报》说：“被劫掠和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英镑。”士兵们真是眼花了，也不知该拿什么，“为了金子只好仍掉银子，为了镶有珠玉的時計和宝石，又把金子丢掉。……许多人掠得三、四十磅纯金，无价的珍珠和宝石。”抢劫完了，为了消灭罪证，额尔金一道命令，火烧圆明园。十月十八、十九日，三千五百名野兽般地侵略军奉命放火，大火三日不熄。

璦琿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五月，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时，沙俄趁火打劫，率兵舰直趋黑龙江爱琿城，向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威胁，要求签订条约。五月二十八日奕山和俄国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中俄璦琿条约》。主要内容是：

1、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片中国领土划归给俄国，仅江东六十四屯仍由中国人民“永远居住”，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中俄“共管”，俄国可以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航船往来，并在三江一带自由贸易，在《爱琿条约》签订后四个月，马克思就指出“俄国获得了黏靛海峡和贝尔加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恩格斯也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英法联军进入天津后，清政府去天津向侵略者议和。俄国假借“调解”“有功”，又抢先强迫清政府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六月十三日，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主要内容：1、俄国在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广州、台湾、琼州七口岸通商；2、在上述七口岸享有设领事、停泊兵船、购置地产、建立教堂的权力；3、俄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4、两国派员查勘边界，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

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清政府又同英法两国分别签订了

《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六月十八日，清政府为了酬谢“调解”“有功”之国又同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同年十一月八日和二十四日，又在上海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通常所说的《天津条约》，就是上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总称。《中俄天津条约》内容已如上述，现在再把其他者综合叙述如下：

1、增开十个通商口岸：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潮州、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淡水（后来实际开埠时，牛庄改为营口，登州改为烟台、潮州改为汕头）；2、外国侵略者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3、开放长江；4、实行所谓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制度；5、邀请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6、洋药（即鸦片）贸易合法化；7、赔偿英国军费、商亏共四百万两，赔偿法国军费二百万两。

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奕訢与额尔金、葛罗分别交换了《天津条约》文本，并订立中英、中法《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主要内容：1、把《天津条约》中的赔款，各自增加到八百万两，由海关税收内扣交。为监督中国海关收入款项，应成立中英、中法混合委员会，逼迫清政府在公元1861年任命英国人李泰为海关总税务司。从此半个世纪，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总是由英国人担任；2、增开天津为商埠；3、割九龙尖沙嘴给英国。

俄国本已攫取了我国广大土地，但仍不满足。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十一月十四日，俄国又趁英法联军攻进北京之时，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续增条约》，即《中俄北京条约》。主要内容：1、霸占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中国领土；2、俄国商人可在边界地区免税贸易；在库伦、张家口行销货物，盖房居住；3、开新疆喀什噶尔为商埠，对在喀什噶尔经商的俄国人，清朝给他们建造住房、仓库、教堂、坟莹和提供放牲畜的土地；4、俄国在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5、沙俄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十月，清政府在俄国武力威逼下又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俄国又霸占了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丧失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更多的主权。从此，侵略者的侵入势力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并且深入到中国内地。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那拉氏发动政变和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些贵族大臣仓惶逃往热河行宫（河北承德郊外）。咸丰十一年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故，临死前遗诏让他的六岁的儿子载淳（chān纯）继位，这就是同治帝。让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

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被尊为慈禧太后，也就是西太后。那拉氏是个具有野心的人，她一心想夺取最高统治权，因此和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发生矛盾。她暗里联络奕訢，拉拢拥有驻扎于京津一带重兵的兵部侍郎胜保和御史董元醇（chén醇）等人。

在公元1861年十一月二日发动了宫廷政变，免除八大臣的赞襄政务大臣的职务，逮捕处死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任命奕訢为议政王。她又叫大学士周祖培等人策动许多人上奏，要求垂帘听政。于是清廷正式宣布，由东太后（慈安太后）和西太后共同听政，实际上是西太后掌权。

从西太后联络奕訢发动政变开始，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了。正如英国公使普鲁斯说，外国驻华公使“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北京条约》刚一签字，法俄两国向奕訢表示，愿意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那拉氏、奕訢无耻地投靠外国侵略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二月，清政府发布上谕说：“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商酌”，令有关的官员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从此，中外反动势力就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六十 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

洋务运动 中国的近代工业，概括有三类：一为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的工厂，二为官僚资本，即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兴办的军事工业，三为民族资产阶级办的工厂。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掀起一个洋务运动，从事洋务的人，被称为洋务派，他们标榜“自强求富”，开办军事工业，也有一些跟民用有关的近代工业。他们除官办外，还吸收一些官僚、地主和买办商人资金，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

洋务派先在各地办起一批军火工厂。主要的有：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修造枪炮的军械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军火工厂。第二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制炮局。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虹口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枪炮、弹药、轮船。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这个厂又迁到高昌庙扩建新厂，是当时最大的军事工业。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局，是当时设备齐全的船舶修造厂。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清政府委派崇厚在天津开办天津机器局，准备制造火药。后来由李鸿章接办并扩充。此外还有一些中、小型军事工业，如左宗棠办的西安机器局（后迁兰州，改为兰州机器局），山东巡抚丁宝楨在济南添口办的山东机器局，瑞麟办的广州机器局，英桂办的福州机器局和张之洞办的湖北枪炮厂（在汉阳）。这些军事工业，经费由政府拨发，经营管理是封建衙门式的，工人来源于士兵，并按军队编制生产。产品一律由政府调拨，这实际上是封建官办工业。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洋务派开始筹划海防。第二年，两江总督沈葆

植、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提出十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海军的倡议。到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大约南洋海军有军船十七艘，北洋海军有军船十五艘，福建海军有军船十一艘，分别由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和福建船政大臣统辖。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奕訢（xū）为总理大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李鸿章将北洋海军扩建成北洋舰队，并逐步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19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派在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创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到九十年代初这样的工矿企业共有二十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李鸿章在上海办的轮船招商局。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开平矿务局，开采开平唐山煤矿。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左宗棠在兰州办织呢局。同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电报总局。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修建唐州到胥各庄铁路，为开平矿务局运煤。同年，清政府在黑龙江筹开漠河金矿。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设广东缫丝局。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又设广东织布局 and 广东制铁厂。同年，张之洞又设汉阳铁政局、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和湖北织布局。这些民用企业有官办的，有官督商办的，有官商合办的。产品基本上是商品，工人是雇佣来的，已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实权都操在洋务派手中，等级森严，经营管理办法腐败，生产效率很低。他们使用的都是外国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不积极培养本国技术人才，因而不能独立自主地吸取和利用从外国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洋务派更仗仗其政治和经济特权，压制民族工业发展。例如李鸿章在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作了十年之内不准本国商人开设同类工厂的规定。

此外，洋务派还举办了一些新式学校。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北京设立同文馆，招收八旗子弟入馆学习，由外国人教授英、法、俄等国文字，后来增设天文和算学。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选江浙一带青年入馆学习。在李鸿章、左宗棠办的工厂内也附设学校，培养翻译人员。同时，还建立了一些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

洋务运动是在不触动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利益上搞所谓“富国强兵”，主要是想借西洋的“兵强器利”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其结果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但是洋务运动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中国出现了一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企业的巨大利润，也吸引着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因此，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多少起了点抵制作用。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开始有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九十年代初，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共有一百多家，雇工近三万人，主要是缫丝、棉纱、面粉、造纸、印刷和火柴等轻工业，也有一些小规模采矿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

在广东南海设立的继昌隆缫丝厂。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朱其昂在天津开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黄佐舜在上海开设的公和永丝厂。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徐润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李宗岱在山东平度开办的招远金矿。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严信厚在浙江宁波开办的通久源轧花厂。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钟锡良在广州开办的宏远堂机器制纸公司。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朱鸿度在上海开办的裕源纱厂等。这些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般规模较小,投资最多的几十万两,一般三、五万两,也有几千两的。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官僚资本压迫和束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就再不准本国商人设立同类性企业;英国公使欧格纳说:“中国开局设厂”,“将有大害于英国工业”。更何况民族企业在各方面都竞争不过外国工厂和官僚企业。这样,就必然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其本身力量又十分薄弱,他们的企业资金很少,规模也小,技术力量弱,又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样既有矛盾,又要依赖的情况,再加上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是从地主、官僚、商人转化而来,有些人还拥有大量土地。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它诞生的时候起,既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又有其妥协的一面。

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没有出现以前就产生了。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在通商口岸外国人开设的码头、船舶修理厂及外国轮船中,已经有了最早的一批中国产业工人。六十年代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中,又有了另一批产业工人。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年龄要大,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中国无产阶级除具有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所具有的基本优点外,还具有其特殊优点。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最厉害,所以他们的革命性也就最坚强。因为他们前身多是贫苦农民,所以是农民革命的天然同盟军。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香港企业中的中国工人,为反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就发动过罢工斗争。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上海耶松船厂工人,为反对工头克扣工资举行罢工;祥生船厂工人,为反对外国监工殴打工人举行罢工。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开平煤矿工人因要求同酬同工而举行罢工。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工人进行过反对延长劳动时间的斗争。不过,当时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处在自发阶段,属于经济性斗争。虽然如此,也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

六十一 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和中法战争

边疆地区的新危机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帝国主义过渡。“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公元1875年，同治帝死去，奕彊的四岁儿子载灃（tjān 甜）继位，改元光绪，拉那氏继续垂帘听政，首席军机大臣奕訢主持总理衙门，负责内政外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参与了外交事务。奕彊为首的顽固派对外交事件动辄主战，而李鸿章洋务派的外交政策是一意主降。这时英、法、俄及美国排植的日本侵占中国邻近国家并侵略中国边疆。顽固派要先战后和，李鸿章要和而不敢战，这样，交织成边疆地区的新危机。

台湾，首先燃起报警的烽火 美国早就阴谋侵占我台湾。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美国公使巴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法占朝鲜、英占舟山、美占台湾”的建议。当时美国军火贩子拉华雷公司等，就肆无忌惮地在台湾地面插上了美国国旗。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一只美国船在台湾海面触礁沉没，美国借口台湾水手在台湾被杀，派军队在台湾南部琅璆登陆，台湾人民奋起抵抗，打死了侵略军头目，击退了侵略军。此后，美国改变策略，支持日本来侵略台湾。日本从公元1868年明治维新后，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它力图向外扩张。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一只琉球国的渔船遇到风暴漂流到台湾，台湾人杀死琉球数十人。这一事件与日本毫不相干，可是到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日本竟以此为借口，向清政府交涉。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日本出兵三千人进攻台湾。当时日本敢于轻率动武，是事先取得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日军被台湾人民击败，退守龟山。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带海陆军到台湾，并奏称日军“必帖耳而去”。可是李鸿章一意主和，在英、美、法公使出而调停下，李鸿章令守台军不准“开仗启衅”。清政府与日本订立了《北京专条》，日本勒索白银五十万两，作为撤出台湾条件。此后日本吞并琉球的行为，日益露骨，琉球君臣向中国求救，李鸿章不理，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废琉球国国王。

烽火又出现于西南边疆。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英国占领下缅甸后，时刻窥伺中国西南。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英国派柏朗上校带兵二百人，组织武装探路队，企图从缅甸入云南。北京英使馆派翻译马嘉理从云南入缅甸迎接，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马嘉理回云南，扬言要进攻腾越城（今腾冲），腾越人民群起杀

马嘉理，把英兵逐回缅甸。云南巡抚岑毓英同意为一行为，调兵防守边境。英使威妥玛威胁清政府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九月，在烟台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主要内容：1、进一步扩大领事裁判权，以前只是说，中、英人之间案件，英国人归英国领事审理，中国人则由中国地方官审理。现在，中国地方官审理这类案件对中国人的审理，英国人也可以在“观审”名义下进行干涉；2、增开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西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英国可派驻领事；长江沿岸的安徽大通、安庆，江西湖口，湖北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六处，准许外国轮船停泊；英国可以派人到四川重庆“驻寓”；3、租界内的外国商品免征厘金；4、外国商品运往内地，不论是外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都只交纳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各项内地税全免。5、广设租界；6、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探访路程”；7、关于“马嘉理案”，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带上“国书”，往英国“谢罪”。8、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起，五年之内，英国可以选派官员到云南大理或其他适宜地方一处“驻寓”；9、清政府应与英国商订“滇省边界与缅甸地方来往通商章程”，也就是说承认英国有权代表缅甸同中国谈判。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英国一支约三百人的武装队伍侵入西藏干坝，遭到人民抵抗，被迫退回。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英侵略军又进攻西藏隆吐山区，藏族军民进行抵抗，打死打伤英军一百多人，英侵略军继续增援，西藏地方政府调集军队一万多人，寺院喇嘛也组成僧兵，准备反攻，清政府却命令驻藏帮办大臣升泰向英国求和。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双方又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拟定了西藏地方和哲孟雄之间的边界。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双方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款》，规定开放西藏亚东为商埠，西藏和印度、哲孟雄边境五年内免税贸易。通过这两个条约，英国取得了进一步侵略西藏的有利条件。

沙俄对新疆也发动侵略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新疆喀什噶尔地区封建主金相印背叛祖国，向中亚细亚浩罕国求助。浩罕派阿古柏侵入新疆，占领喀什噶尔。第二年，沙俄与阿古柏订立协议，规定俄国人有权进入南疆追捕逃人。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阿古柏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自立为汗。沙俄借口“安定边境秩序”，派兵侵占伊犁地区。任意勒索中国各族人民“纳丁畜税银”。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清政府多次向沙俄交涉归还伊犁，没有结果。同年，沙俄竟派人出使南疆，同阿古柏签订商约，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国首领”，阿古柏同意俄国在天山南路设立“商馆”，自由通行，自由经商。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清政府内部发生“海防”和“塞防”争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移塞防费充实海防；湖南巡抚王文韶认为沙俄侵略威胁最大，主张全力注重西北；陕甘总督左宗棠主张海防和塞防并重，力主收复新疆失地。他的意见得到人民支持。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左宗棠奉命负责收复新疆。第二年，进军新疆，先攻北路；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继续进攻南路，节节胜利，到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初，全部收复了新疆。但是沙俄仍占着伊犁。清派崇厚往俄国交涉。第二年十月俄国贼崇厚，擅自签订了丧失大批权益和土地的《里瓦吉亚条约》。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清政府

又于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派驻英公使曾纪泽为使俄钦差大臣，再次进行交涉。沙俄陈兵几万人于伊犁，并派海军到中国海面，企图用武力威胁。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二月二十四日中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主要内容：1、伊犁归还中国，但伊犁西部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却被俄国强行霸去，并要另行勘分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等地的中俄边界。通过这一条约和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沙俄把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到了俄国版图。2、赔款九百万卢布；3、俄国在天山南北两路贸易暂不纳税，货物由陆路运往嘉峪关，比由海路运入的货物减税三分之一等。

至此，俄国通过条约强行霸占了我国一百五十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了，可是还不满足。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又强占了我帕米尔西北部土地；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又侵入帕米尔东部一带，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法战争 公元1873年，法侵略军攻陷河内，越南军民坚决抵抗，驻扎在中越边境的刘永福黑旗军进援河内，打败法军，迫使法军退出河内。公元1882年四月，法军再次攻陷河内，窥视中国云南。清政府派军进驻越南北部的山西、北宁，援助越南抗法。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法侵略者强迫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法侵略者要清政府承认这一条约，并撤出在越南北部的中国军队，还要开放云南边界。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十二月，法国任命孤拔为统帅，率领六千侵略军，向驻在越南山西的清军和黑旗军发动进攻，中法战争爆发了。清军闻风撤退，黑旗军在刘永福领导下，孤军抗法，激战五天，被迫撤离。第二年二月法国派米乐任侵越法军司会，孤拔调任远东舰队司会。三月，法军向北宁进攻，清军又不战而退。北宁、太原、兴化相继被法军占领。卖国贼李鸿章急忙与法国舰长福祿诺，在五月订立了屈辱的《中法简明条约》。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六月，法军又突然到谅山附近寻衅，并打死清军代表，为清军击退。接着要清政府赔偿兵费二亿五千万法郎。八月，法军侵犯台湾，炮轰基隆炮台，为基隆守军击退。法在基隆失利，就把军舰驶入闽江，驻泊马尾。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法军突然袭击福州水师，击沉水师军舰十一艘、商船十九艘；第二天法舰又炮炸马尾造船厂。清政府被迫于八月二十六对法正式宣战。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群情激愤，或监视敌人间谍活动，或拆毁法国天主教堂，或拒为法国修理军舰，或拒为敌搬运煤炭及粮食等物质，华侨捐款回国，各地工人、商人罢工罢市，积极支持与参与抗法斗争。

八月底，敌退出闽江。十月，攻占基隆，台湾守军败散于淡水。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二、三月间，法舰队侵浙江镇海，浙江提督欧阳见利击退法军，法海军司令孤拔受重伤。三月底，法军占澎湖。孤拔死在澎湖。

在越南战场上分东西两线。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十二月，西线清军和黑旗军包围了宣光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三月，法国从河内增援宣光，黑旗

军在半路埋下火药，炸死炸伤法军四百多人，这支援军被迫撤退。东线，二月，法军进攻谅山，谅山清军统帅潘鼎新闻讯就放火烧了谅山城，退到镇南关以内一百四十多里的地方。法军逼近镇南关。这时帮办军务的七十岁老将冯子材率军来到镇南关，他进行了周密布署。三月下旬，法军进犯镇南关，冯子材屡败法军。三月二十四日，法军猛攻关前隘长城工事。冯子材下令死守。当长城即将被冲毁，形势万分危急之刻，冯子材手持长矛，身先士卒，冲出城外。全军将士紧随主帅，向前猛冲，与敌展开肉搏战。清军在冯子材带领下，个个英勇向前，以一当十，法军大败。二十五日，冯子材下令总攻，法军丢下一千多具尸体，纷纷逃跑。镇南关大捷后，冯子材率军追击，迅速收复了谅山和其他阵地。法军主帅尼格里身受重伤，狼狈逃窜。同时，西线黑旗军也在临洮大败法军，乘胜收复了许多州县。

法军大败，法国人民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茹费理内阁”，反对法国继续进行不义战争。当天晚上茹费理内阁垮台，抗法战争胜利了。但这个辞职的内阁，并没放弃侵略野心，在新闻就任前一天（四月四日）与清驻法公使签订了议和草约。草约签订了，上谕四月十五日停战，二十五日撤兵。张之洞希望停战前攻下北宁，李鸿章传旨斥责。四月十五日子刻冯子材等电请张之洞“请上摺诛议和之人”，但又怎能行呢？前线将士撤兵之时“皆扼腕愤痛，不肯退兵”，拔剑斫地，恨恨连声。可是妥协投降腐庸无能的清政府却在法国巴黎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六月九日，卖国贼李鸿章又与法国驻华公使订立了屈辱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承认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同意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胜而屈服，败而获利，这在国际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清政府腐朽卖国的丑脸在这里暴露无遗。

六十二 甲午中日战争

日本侵略朝鲜 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在日本很快发展起来，它和封建经济结合着，表现出特别强烈的侵略性。田中义一奏摺说：“明治大帝之遗策”是第一征服台湾，第二征服朝鲜，第三征服蒙古，第四征服支那，第五征服世界。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清政府屈服，结果日本吞并了琉球。南进政策初步成功，就北向朝鲜侵入，想夺取这个“渡满洲的桥梁”。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日本以武力威胁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取得了通商、租地、领事裁判权和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特权。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朝鲜人民都曾进行了反日斗争。在公元1882年日本又以武力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仁川条约》，除得到赔款外，还取得在朝鲜驻军的权利。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清政府派兵帮助朝鲜国王

镇压了政变，日本就对此对清政府进行要挟。第二年，在天津与李鸿章订立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议定朝鲜如再发生政变或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出兵，要行文互相通知。后来日本就利用这一条款出兵朝鲜，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中日战争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日本阴谋利用这次农民起义，把清政府推向预设的陷阱之中，以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日本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说：“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满以为派兵去朝鲜会得到日本支持，六月五日就派叶志超、聂士诚率准军一千五百人进驻朝鲜牙山。日本也派兵在仁川登陆，并不断增兵，出动了一万多陆军和全部海军。七月二十三日，日军突然攻占朝鲜王宫，挟持朝鲜国王，扶持了一个傀儡政权。七月二十五日，日舰在牙山口外炸沉运送中国援军的高升号商船，官兵七百多人殉难。同时，日军偷袭牙山清军。叶志超已先逃跑，聂士成与日军在成欢驿相遇，孤军作战，初胜后败，被迫退兵。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八月一日，清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时宣战。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史称“甲午中日之战”。

八月初，清军齐集平壤，叶志超冒奏成欢驿初胜之功而被擢升为各军总统。九月十五日，日军猛攻平壤。守卫玄武门的总兵左宝贵誓死抵抗，亲自登城指挥作战，不幸中炮阵亡。日军占领玄武门，叶志超率军逃出平壤，一口气狂奔五百多里，渡过鸭绿江，退驻中国境内九连成。

九月十七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兵舰十二艘，完成护送援朝军队任务，准备从鸭绿江口大东沟返航旅顺。十八日中午，黄海海面西南方突然出现兵舰十二艘，高悬美国国旗，来舰渐近；改挂日本国旗。丁汝昌立命起锚，摆成锐角阵势，准备迎战。战斗五小时，双方互有损伤。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兵舰受伤，弹药尽绝的情况下，临危不惧，命令兵舰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猛冲，想与日主力舰同归于尽。不幸中途中鱼雷舰被炸沉。全舰官兵二百五十人壮烈牺牲。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力战阵亡，全舰官兵二百七十人浴血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中雷炸沉。下午五时，日舰不能支持，退出战场，北洋舰队向旅顺返航。黄海大战，说明双方势均力敌，损失也大略相等。而李鸿章为保自己实力，竟命令舰队退威海港内，不准出海巡洋迎敌。

十月下旬，日军分两路侵入辽东。东路日军渡鸭绿江，占九连城和安东（今辽宁丹东），进攻凤凰城、岫（xiù秀）岩和海城。西路在辽东半岛登陆，进犯大连、旅顺。李鸿章自夸“固若金汤”的旅顺，很快陷于敌手。日军在旅顺大屠杀，只有三十六人幸免于难。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一月，日军出动兵舰二十五艘，封锁威海卫海口，并以陆军两万人，在山东荣成湾登陆。北洋舰队坐困港内，腹背受敌。二月初，日军占威海卫炮台，炮击中国兵舰，并以鱼雷艇入港偷袭。丁汝昌和刘步蟾下令移泊刘公岛海面，继续战斗。炮弹用尽，刘步蟾下令沉船，他自己自杀殉国。这时，民族败类道员牛昶炳等不但不执行丁汝昌沉船和突围命令，且胁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拒绝投降，三月二日服毒自杀殉国。美国顾问浩威起草了投降书。三月，日本陆军占牛庄、营

口，同时日海军攻陷澎湖列岛。清政府急急向日侵略者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中日甲午之战，中国虽惨败于日本，但主要原因是由于清军中一部分战将贪生怕死，不战而退。海军将领虽不乏爱国之士，但在卖国贼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政策下，命令退缩威海卫港内，死死挨打。如果陆军将士能爱国英勇作战，当时当权者西太后和李鸿章能积极抗敌，胜败实难预料，即使败于日本，也不会如此之快，如此之惨。

《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马关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共十一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1、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条约签订后，俄国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有碍它向中国东北扩张侵略势力，纠合法、德出面干涉，迫使日本退还中国，但又勒索白银三千万两作“补偿”）；2、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万万两，（加退还辽东半岛“补偿”费为二万万三千万两）；3、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以后日本不断加紧侵略朝鲜，到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4、日本得在各通商口岸，任意投资设厂；5、增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为通商口岸，其商船可从宜昌溯江以至重庆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6、根据《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七月订立的《通商行船条约》，日本在中国又索取了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

中国军民反对日本强占台湾 《马关条约》签订后，割台消息传到台湾，台北立即鸣锣罢市，群众拥进巡抚衙门，抗议清政府卖国罪行。全台人民严正表示：要与日本“决一死战”，“决不接受日人统治”，并警告台湾巡抚等官吏，不许离台逃跑，不许将抗战所需库银和武器弹药运出台湾。台湾人民发布抗战檄文，怒斥李鸿章“无廉无耻，卖国媚敌”。表示台湾人民反对割台的决心。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五月底，日军在台湾基隆附近登陆，台湾人民在徐骥等领导下，组成义军。与防守台南的刘永福军配合战斗。

六月二日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代表清政府带着美国顾问科士达到台湾，他们不敢登陆，就在基隆口外日舰上处理“过渡”手续。

从五月底到六月初，台北士绅推清巡抚唐景崧为首，以“自主”名义抵制敌人。到六月初，基隆失陷，唐景崧化装全皇内渡。敌军从台北向南进攻，在新竹遭到义军坚决抵抗。八月中旬，战事转入台中，为了保卫彰化，刘永福率军与徐骥义军在大甲溪一带同敌展开激战，日军死伤惨重。

十月，日军进攻嘉义，战争转入台南地区。刘永福军和义军粮饷、弹药十分缺乏。清政府不仅不支援，还下令严禁沿海各省支援台湾抗战。日军海陆联合进攻，台南守军弹尽援绝，十月二十一日失陷。刘永福乘船内渡，徐骥在战斗中受伤，不幸牺牲，临死前豪迈地说：“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

此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五十年里，台湾各族人民反抗殖民统治，要求返回祖国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六十三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甲午战后，中国因巨额赔款，财政日益困难。本来清政府年财政总收入不过八千万两，且入不敷出。这一下子对日赔款加辽东半岛赎金就要二万万三千万两，且有年利五厘，三年付清的规定。清政府真无力负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五月，沙俄勾结法国，以“干涉还辽应有酬劳”为借口，逼迫清政府借款一万万两，英、德两国见此也眼红了，吵着要清政府向他们借款。战后五年，清政府向英、俄、法、德等国共借款三亿七千万两。帝国主义通过借款，不但获得了大量利息，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的银行也增多了。甲午战前，主要有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日本正金银行。战后，沙俄道胜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也都在中国建立了分行。外国垄断资本家通过银行向中国输出资本，贷款给中国政府，控制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汇，还发行纸币，操纵中国的金融。

帝国主义还在中国投资设厂，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公元1895至1897年），帝国主义在上海开办的工厂，主要有英商怡和纱厂和增裕面粉公司，美商鸿源纱厂和美昌机器碾米厂，德商瑞记纱厂，日商上海纺织公司第一厂和第二厂。甲午战后五年中，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达九百多个。这些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在中国从事商品生产，又在中国市场出售，占据垄断地位，并剥削中国人民，排挤中国本国产品。各帝国主义国家又从中国攫取矿山开采权，从光绪二十二年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896到1901年），沙俄占有抚顺煤矿，英国占有开滦煤矿，美国控制了宛平通兴煤矿。俄、英、法、日等国还攫取了新疆、四川、山西、河南、山东的金矿、煤矿、铁矿的开采权。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上采用资本输出的形式，疯狂地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为了保获垄断资本利益，更积极动手瓜分中国，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俄国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五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老卖国贼李鸿章以“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五月初，中俄开始外交谈判，尼古拉二世亲自出马，对李鸿章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李鸿章抱着所谓“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卖国宗旨，接受了沙俄巨款贿赂，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于六月三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一般称为《中俄密约》。主要内容：1、两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同盟”，如日本侵略两国，要将所有水、陆各军尽行派出，互相援助；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并不能自行与敌议立和约；2、一旦发生战事，中国所有口岸，

均准俄国兵舰驶入；3、允许俄国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

在《中俄密约》签订三个月后，即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九月八日，俄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根据这一章程设立了“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即中东铁路公司），负责修筑了“中东铁路”。并规定：1、占地一概不纳地税；2、铁路公司转运货物、搭客、电报等收入，不向中国纳税；3、俄国货物经中东铁路仍然进入俄国境界者，一律免税；如俄国货物由此继续运往中国内地，只征收规定的进口税的三分之二，如再运往内地者，则交纳子口税，即交进口税的一半。

贪得无厌的俄国仍不满足，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又派舰队强占旅顺港，第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and 五月七日，强迫清政府订立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沙俄又获得了旅顺和大连湾及附近水域的租借权，在所租之地及附近海面“所有测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中国军队反“不得驻此界内”。并允许俄国从中东铁路修筑至旅大海口支线。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七月六日，沙俄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正式决定修筑自哈尔滨至旅大的支路（南满洲支路）。并攫取了“在官地树林内自行采伐”，在南满铁路沿线“开采、建造、经理铁路需用之煤矿”和在辽东半岛租地内“自行酌定税则”等一系列特权。

从此，一条全长二千八百多公里，纵横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丁”字形大铁路，成了俄国侵略我东北的大动脉，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凭借这条大动脉，控制了我东北全境，并继续策划着把我东北变为“黄俄罗斯”的狂妄的罪恶计划。

德国，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十一月，借口两个传教士在山东青州被杀，派军舰占领了胶州湾。第二年三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强租了胶州湾，并攫取了山东境内从胶州到济南的铁路修筑权和铁路沿线三十里的开矿权。山东由此成为德国势力范围。

法国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以干涉还辽有“功”，夺占了云南边境上猛乌和乌得，迫使清政府增开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又于光绪二十三年强迫清政府宣布海南岛及其对岸陆地永不割让给别国。并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又强行租借了广州湾，取得了滇、桂两省铁路修筑权和采矿权，还迫使清政府宣布广东、广西、云南不割让给别国。这样，西南三省就成为法国势力范围。

英国 光绪二十三年夺去了中缅边境原属中国的一些土地，强行取得猛卯三角地的永租权，迫使清政府开放西江，开辟广东三水、广西梧州为商埠。光绪二十四年英国又出兵威海卫，强迫清政府答应租借威海卫；随后又强租了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各岛屿及大鹏、深圳两湾。还取得对上海附近和东北一些地方的铁路修筑权。同时还强迫清政府承认，不得把长江沿岸各省和广东、云南割让给别国。从此长江流域成了英国势力范围，广东、云南成为英、法共同势力范围。

日本 光绪二十四年，以福建省邻近台湾，强迫清政府声明不把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别国。福建成了日本势力范围。并且于光绪二十三、二十四年，日本又获得对芦（芦沟桥）汉（汉口）铁路和粤（广州）汉（汉口）铁路的修筑权。

帝国主义争着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当然就要在他们之间发生矛盾。为解决各自之间的矛盾。光绪二十二年英、法两国约定，在四川和云南分别获得的利益共同享受。光绪二十四年英、德两国协议，山东北部到天津的铁路由德国修，山东南部到江苏镇江对岸的铁路由英国修。光绪二十五年英、俄协议，俄国承认长江流域各省为英国势力范围，英国承认长城以北地区为俄国势力范围。

面对这种形势，正如列宁所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

后起的美帝国主义焦急了，它于光二十五年，向英、俄、德、日、法、意六国提出所谓“门户开放”的照会。照会说：在承认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已经取得的赔矿等特权的基础上，其他各国也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使帝国主义国家都有投资权利。实行“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原则。英国由于侵略中国的优势地位开始削弱，首先支持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其他各国也先后表示同意。实际上是各帝国主义间互承认其势力范围，缓和其相互间矛盾，协调侵华力量，更有利于他们对中国的瓜分和侵略。

六十四 戊戌变法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活动 洋务派举办新政，自称求富强，实际是阻遏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中法战争前，以上海、香港为中心，已有进步的知识分子倡导改良主义的变法。如林则徐的门生冯桂芬，就曾提出废八股，开学校，习西学，设船炮局等。香港《循环日报》主笔王韬鼓吹变法，提出急需改革“取士、练兵、学校、律例”四种旧制，并批判洋务运动，只“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福，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他著书多种，影响很大。甲午前后，郑观应、何启、胡礼垣、陈虬（qiú）等著书立说，提倡变法，开设议院，行君主立宪制。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英国广学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光绪帝上了一篇《新政策》长文。光绪帝师傅翁同龢（hé）和、孙家鼐及光绪帝亲信文廷式等受其影响，开始阅读时务书，倾向变法。在此之前，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广东人康有为在京应顺天乡试，就写了一篇《上皇帝书》，请求变法维新。当时正洋务运动发展时，康有为指洋务运动为“奸蠹”、“巨害”，主张从政治上变起。代表官僚、买办利益的洋务派与代表资本主义的改良派，分歧就在对专制政治的变与不变这点上。因此康有为被诬为“狂生”，几次考试都不得中。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著书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宣传维新变法。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正在北京会试。他联络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万言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重点尤在变法。历史上称这次上书

为“公车上书”。在清朝，这一史无前例的士人联合大请愿，把变法运动推动成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这次康有为取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后他又上《变法万言书》、《上皇帝万言书》。八月，由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又称强学会），康有为和其弟子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继续宣传维新变法。并成为强学会中的主要分子。第二年，各地成立的学会和出版的报纸，逐渐增多。上海有《时务报》、《苏报》、澳门、长沙、天津有《知新报》、《湘学报》、《国闻报》。《时务报》、《国闻报》居于南北舆论界领导地位。严复翻译《天演论》在《国闻报》定期发表，阐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进化论观点，在维新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各地还设立了学会和学堂，其中谭嗣同等主持的长沙时务学堂最有名。

变法运动广泛发展，顽固派与洋务派大为恐惧，起而攻击，甚至大肆诬蔑改良派。改良派与之展开激烈论战。顽固派和洋务派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出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声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改良派根据进化论观点，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者，古今之公理”。顽固派和洋务派认为“民有权则君无权”，民权“违反纲常”，将会发生以下反上的大乱，甚至毁灭人类，实行“君主立宪”是高经叛道，“用夷变夏”；改良派指出“能兴民权者，国无可亡之理”，只有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能“无敌于天下”。顽固派坚持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反对西学；改良派说科举制是愚民政策，闭塞人的聪明才智，不能选拔真才实学的能人，只有创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才能培养人才。这一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一次正面交锋，在论战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封建主义束缚。

百日维新和顽固派的反动政变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阴历的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第二天，派康有为充总理衙门章京，许以专折奏事，维新变法开始了。但顽固派也开始筹备政变。那拉氏令光绪帝把翁同龢等人开缺回籍；又谕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必须到地面前谢恩；接着就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于是一方面以光绪帝为首的改良派积极颁布上谕变法，另一方面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则霍霍磨刀，准备扼杀变法运动，两种力量的斗争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从六月到九月间，光绪皇帝连颁上谕，明令变法。其主要内容有：（一）、改革旧机构，裁撤京内外大批衙门、冗员。（二）、准许人自谋生计。（三）、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四）、废八股改试策论，取消书院，改为新式学堂。（五）、准自由开设报馆、学会，奖励新著作、新发明，设立译局，编译书籍。（六）、设路矿总局、银行、农工商总局和各省商务局，提倡商办实业，组织商会。

上面这些新令，根本没有提到设议院，对政权实质也未有变动，但却受到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极力抵制。到九月初，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麟等公然阻挠官员上书，反对新政。光绪帝下令将礼部尚书、侍郎全体革职，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两派之间斗争更趋激烈。

斗争越来越尖锐，九月初（阳历七月下旬）怀塔布、杨崇伊等往天津与荣禄密商。京城盛传预定十月底（九月初）帝、后回到天津阅兵，举行政变，迫光绪帝退位。于是光绪帝密谕康有为设法。康有为、谭嗣同等错误地认为袁世凯可用，光绪帝还亲自面召袁世凯，对其委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之事。后谭嗣同又密约袁世凯，请于阅兵时，救光绪帝出险，诛杀荣禄等。袁世凯“正色厉声”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几天后袁世凯请示回天津，一到天津就向荣禄告密。荣禄听后立即密报那拉氏，那拉氏决定立即发动政变。于是光绪帝被囚禁，那拉氏以训政名义重新掌权，维新运动告于结束。这一改良运动，从六月十一日起，至九月二十一日止，共一百零三天，故称“百日维新”。

变法运动失败了，光绪帝做了囚徒，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英、日使馆的帮助下出亡国外。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人被那拉氏下令斩杀，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就义前大义凛然地说：“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则请自嗣同始。”

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具有救亡和抵制人民革命的双重性质。维新派领袖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哲学和自然科学，反对封建专制的统治秩序，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大大便利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力量弱小，而且又是只想依靠一个没有实力的皇帝来进行维新，没有广泛发动人民大众，脱离群众，因之在反动派的攻击下，很快就被绞杀了。维新派的领袖们本身软弱，又害怕群众，与封建势力、官僚势力及帝国主义势力不敢也不能决裂。因此，虽然在当时进行改良尚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爱国意义，但在维新运动失败，革命力量兴起并逐渐发展起来后，这些改良运动中的领导人又必然走上反对革命的道路。

六十五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各种不平等条约，使豺狼足迹遍于中国大地，瓜分中国的浪潮，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笔下的块块肥肉，无数人民因此家破人亡。外国传教士更为猖獗，到处设教堂，收教徒，企图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仅山东一省就建有教堂一千多所，教徒八万多人。这些外国传教士不仅为其本国进行经济、文化侵略，且勾结劣绅、流氓收租放债，霸占田产，包揽词讼，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及清政府与贪官污吏租税压榨，残酷勒索的中国人民，实在难以忍受下去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不能乖乖地听任宰割。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终于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以反洋教为特点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本称义和拳，它至少有了一百年的历史。义和拳和白莲教有源流上的关系，在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就被清政府禁止，而转为秘密活动。当初以“反清

复明”为宗旨，以设厂练拳为组织群众方法。外国侵略者进入中国后，义和拳的斗争锋芒就主要是指向帝国主义了。参加义和拳者主要是贫苦农民，还有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水陆运输工人等。青少年很多，还有不少妇女，妇女组织叫红灯照。他们宣传说：“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兵法易，助学拳，要抗鬼子不费难。”这里所说“助学拳”，就是神仙助人学拳。

山东义和拳首领曹州人朱红灯，最先曾自称为明后裔。在帝国主义爪牙教堂作恶，欺压平民情况下，他“不惜躯命代为伸理”，改称“义和拳”为“义民会”。山东巡抚镇压不了，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三月，毓贤为山东巡抚。毓贤前做曹州知府，一年中杀拳民二千多人，曾向那拉氏自夸“匪已肃清”。升为巡抚后，毓贤派济南知府带兵“查办”义和拳，却被拳民杀死数十人。毓贤有心请援，可已经夺下海口，有心剿办，又每战必败，真左右为难。这时朱红灯又针对形势，为集中力量反帝反教，改口号为“扶清灭洋”，毓贤也借那拉氏提倡的办保甲团练之机，改“义和拳”为“义和团”，使之成为合法组织。义和团立“扶清灭洋”和“毓”字大旗公开活动，遍设拳厂，仅在（chǐ）平县八百六十余庄，拳厂多至八百多处。运河以西地区尤为发达。传教士认为义和团是“叛逆”，寻机袭击义和团，并渲染事态，逼迫清政府撤换毓贤。十二月清政府遵命撤换毓贤，委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毓贤和袁世凯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不过毓贤是绝对排外的顽固派，袁世凯是绝对媚外的洋务派，所以毓贤在“扶清灭洋”上承认义和团合法，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一到山东，义和团陷入血海之中。

恰恰在袁世凯到任之时，肥城县英国牧师伯鲁克被杀。袁世凯借机大肆捕杀义和团团众，他定出《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凡有练拳或赞成拳厂者杀无赦，告密者，捉被害人家产一半或全部充赏。袁世凯扩充新军马步炮队二十营，联合青岛德军，各教堂武装，协力攻杀义和团。捕获拳民，当堂刀杀。以东光县为例，方圆十里，没有一株树上不挂人头。袁世凯屠洗乡村，毁平拳厂，使人民死于非命者无数，人民痛恨地说：“杀了袁（yuán）蛋，我们好吃饭”。在抚署墙上画红顶花翎大龟，伏于洋人臀后。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初春，义和团从山东北部入直隶境内，在直隶开始大发展。

义和团在直隶的发展 直隶义和拳在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已有零星活动，山东义和团进入直隶后，保定以北和天津以西各县，已为义和团控制。公元1900年五月下旬，义和团在泇水打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副将杨福同，攻占了涿州县城，又进行拆毁芦汉铁路的斗争。这时西路义和团的先锋已逼近北京，东路义和团也到达天津城郊。那拉氏对义和团最初是以剿为主，五月底，形势紧急，她召集王公大臣商讨对策，采用军机大臣赵舒的建议，想“抚用”义和团，“因势利导”，希望“缓急可恃”。她深刚毅到涿州和义和团接洽，把义和团合法化，同时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义和团进入北京后，清政府军队，特别是董福祥的武威后军纷纷加入义和团，宫内不少太监也和义和团通声气，在“扶清灭洋”旗号下，义和团一时掌握了北京城。义和团在北京城张贴文告、传单说：“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

船”。王公大臣住宅被监视，外国教堂被打毁，北京成了运动中心。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进入天津，划界管辖，把守城门和衙门，在府县大堂设立神坛，还打开监狱释放老百姓，天津也全被义和团控制了。这时，河南、山西、内蒙、东北也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南方各地反教会斗争也此起彼伏。一场反帝爱国的群众革命运动在全国形成了。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和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暴行 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俄、日、德、法、英、美、意、奥八国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五月底，英、俄等国派兵三百多人进入北京。六月三日，各国兵舰十六艘在大沽口外挑衅。六月十日，八国侵略军两千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奋起抵抗，拆毁由天津到北京的铁路，狙击侵略军，侵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六月十八日，义和团和清军中的爱国官兵，向据守廊坊车站的联军发动攻击，展开血战。激战两小时多，杀得敌人死伤残重，第二天联军开始后退。六月十六日盘据在老龙头火车站的沙俄侵略军用机枪扫射义和团，义和团伤亡惨重。十七日，敌攻陷大沽炮台，敌军四百多人从塘沽乘火车往天津，义和团和守护铁路的清军进行狙击，打退敌军。清军炮轰租界和火车站，七月初，曹福田率义和团，联合清军，猛攻火车站和法租界。战斗两昼夜，打死打伤敌军一百多人。张德林率义和团进攻紫竹林租界，一度攻入租界。天津人民冒着枪林弹雨，送“得胜饼”和米汤到战场，慰劳战士。

八国联军猖狂进攻，义和团健儿英勇抵抗，清政府无法控制局势。六月十七日，那拉氏又接到列强要她“归政”的谎报，十分惊慌。十九日，大沽口炮台失陷战报传到北京，那拉氏又气又怕，宣布不再保护使馆。照会各国公使，限二十四小时以内，下旗归国。二十一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并下令围攻使馆。义和团出动五六千人，开始包围各国使馆，攻打东交民巷御河桥。清军也参加围攻各使馆。可是在六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又急忙下令停止围攻使馆。义和团却没有服从撤消包围使馆的命令，一直包围了五十六天。同时，又进攻北京西什库教堂，附近居民积极支持，帝国主义分子惶惶不可终日。

六月二十三日，各国侵略军八千人到达天津租界，进攻天津城。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坚决抵抗。可是一些清军受密令，从背后向义和团射击，义和团伤亡严重。七月十四日，天津城失陷。西太后极为恐慌，忙向各国使馆求和。八月四日，敌二万人向北京进攻。八月七日，那拉氏下令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军，向帝国主义乞降。十四日敌占北京，那拉氏带光绪帝急急逃往西安。

西太后逃亡途中，一面命令李鸿章赶快向各国屈膝求和；一面诬蔑义和团为“拳匪”，严令“官兵合力剿办”。各地清军大杀义和团。

八国联军占北京，公开宣布准许士兵“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上没有日期限制。残遭杀害的人数无法统计，抢劫活动更是惊人。英军把抢到的东西，集中使馆，公开拍卖。日军从户部抢走库存银三百万两，抢后还放火灭迹。天主教主教美国梁亲自从一个高级官员家里抢去价值一百万两的珍宝。至于奸淫滥行，更令人发

指。中国珍贵文物遭到空前洗劫。宫中珍贵文物，皆被负责保护的日军捆载而去。颐和园历代宝物，被各国抢运而走。珍贵天文仪器，如直径两公尺的天球、回分仪、也由德、法两国伙分。《永乐大典》丢失三百多册，其他珍贵图书，损失不下四万册。

沙俄兽行更令人发指，他单独出十七万军队侵入东北，十月间占领东北铁路线和主要城市。在黑龙江东岸海兰泡，于七月十五日把数千中国居民，驱到江边，十六日俄兵大杀大砍，未砍死者投水溺死。接着又在江东六十四屯，放火烧屯，并集中居民在几个大房子里，放火烧死。

《辛丑条约》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英、德、俄、法、美、日、意、奥、比、西（班牙）、荷十一国公使组成“公使团”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款，强迫清政府全盘接受，不许有丝毫更改。老卖国贼那拉氏，竟然大喜过望，感激零涕，下令“全行照允”，还丧尽天良，毫无廉耻地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充分暴露了她投降、卖国的奴才嘴脸。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公元1901年）庆亲王奕劻（kuàng瓦）和李鸿章同十一国侵略强盗，在北京正式签订了《辛丑条约》。主要内容真骇人听闻：1、勒索巨额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五两，分三十九年偿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高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以海关、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这项赔款，以俄国分得最多，独吞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多两，占总额百分之二十九。难怪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毫不隐讳地说：“1900年的对华作战，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2、拆除大沽炮台，允许帝国主义国家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铁路线的重要地区；3、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4、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反对外国侵略。

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辛丑条约》彻底制服了清朝反动政府，使它完完全全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人民的驯服工具。《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人民生死不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但也不断地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此更加日益高涨。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 义和团运动是被压迫的中华民族，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义和团的英勇健儿，敢以大刀长矛，甚至赤手空拳，与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格斗，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它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却狠狠地教训了帝国主义分子，使他们认识到中国人民是无法征服的。连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也佩服“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的生气”，哀叹“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的国家，认识到“瓜分一事，实为下策”。法国一议员公开承认：“中国土地广阔，民气坚劲……瓜分之说，不啻（chī赤）梦呓。”义和团运动，也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真面目。对于提高人民用革命力量推翻清王朝，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阶级的自发反帝爱国运动，由于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这一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和历史条件限制，因而不能彻底战

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农民是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主力军，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六十六 辛亥革命

《辛丑条约》后，帝国主义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侵略，清政府更乖地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这“洋人的朝廷”在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一月下了上諭，玩弄手法，实行所谓“新政”。当然，实行所谓“新政”的目的，为要拉拢资产阶级，平息日渐兴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浪潮。但客观现实同他们的想法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终于埋葬了清王朝。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了一个我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他名孙文，字逸仙，光緒四年到十八年（公元1878到1892年）的十四年里，他在檀香山和香港读书，接触到一些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也学到些自然科学知识。公元1892年他在香港西医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以行医为业，宣传革命。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他曾上书李鸿章，要求会见李鸿章，面商国是，遭到拒绝。使他认识到只有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制度，才是中国唯一出路。从此他立志献身中国革命事业。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初，孙中山在香港设兴中会总会，发布宣言。会员入会要宣誓，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要求会员为推翻清政府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兴中会会员以华侨工商业者为主，是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初步形成。

在民主革命运动中，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日本和上海等地办起许多报刊，出版大量书籍，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当时上海有《苏报》、《女子世界》等报刊，东京有《游学译编》、《浙江潮》等杂志，还翻译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史》、《欧洲最近政治史》等。到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翻译出版的哲学、社会政治学和历史书有二百多种，小说有二十多种。在这些书报杂志的大力宣传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也涌现出一些卓越的革命宣传家，最著名者为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

章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原是一个改良派，戊戌变法后避难到日本的。在孙中山影响下，他于公元1900年剪掉了辫子，走上革命道路。1903年他在《苏报》上发表了許多宣传革命的文章，最著名的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邹容，字蔚丹，四川巴县人。公元1901年他十七岁时到日本留学，公元1903年

回上海，写了《革命军》，热烈鼓动革命。《革命军》在《苏报》发表，清政府很害怕，申通上海英租界逮捕了邹容，封闭了苏报馆，制造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公元1905年二十一岁的邹容，在敌人的监狱里因不堪虐待而死。但《革命军》“飞走海内”，几年之内发行一百多万册。它激励人们“拔剑起舞，发冲眉竖”，投身到革命洪流里。

陈天华，字星台，湖南新化人。公元1903年留学日本，参与创办《游学译编》《新湖南》。他写的《警世钟》、《猛回头》重印十多次，真像一只“警世洪钟”，鼓舞着沉睡在迷路上的中国人民，“猛回头”，摆脱“洋人朝廷”束缚，推翻“洋人朝廷”、“万众直前”向封建王朝进攻。

革命团体在革命洪流中也相继成立。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了“华兴会”；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在上海组织了“光复会”；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湖北党人刘静庵、张难先、曹亚伯在武昌组织革命团体，第二年二月正式成立了“日知会”。革命团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

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统一政党来领导革命。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八月二十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它是以太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成员和留日学生为基础，以太中会原有组织为核心组成的。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从分散的活动走向统一领导。成立大会决定在东京设立同盟会总部，全国各地设立支部，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主持总部工作，通过了《总章》、《宣言》把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作为同盟会纲领。后来在孙中山写的《民报发刊词》（公元1905年十月创刊）中又规定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旧三民主义。这个纲领在当时团结了国内各阶层反清的革命力量，大大振奋了人心，使同盟会一时成为资产阶级为革命的领导核心。

同盟会成立后，立即从两条战线出击：一是与改良主义者的君主立宪派进行论战；一是立即着手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在公元1905年到1906年中革命派同立宪派（保皇派）进行了激烈论战。同盟会以《民报》为阵地，康、梁以《新民丛报》来顽抗。通过论战，保皇派惨败，革命派大胜，传播了革命思想，推动了革命思想潮流的进步。革命派对立宪派的论战，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要不要革命。改良派宣传革命要引起“暴动”、“内乱”、招致外国干涉，“瓜分”中国，因此要“爱国”就不应革命。革命派驳斥说立宪派的“国”，是“洋奴”，“爱国”必须推翻清政府。革命是为了建立民主政治，不是争权，不会引起内乱，也不是排外，不会招致外国干涉。第二，立宪派诬蔑中国人民没有能力行使民主政治，连实行君主立宪都不行，还要经过十年的“开明专制”。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说”驳斥了其谬论，指出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出路。第三，改良派宣称地主占有的土地是不可剥夺的，“土地国有”危及“国本”。革

命派从“土地为生产要素”，“本不当有私有者”，指出地主占有土地的不合理性。指出“地权失平”、“人权失平”，必须以“社会革命加以改造，才能使生产事业迅速发展。在论战中革命派胜利了，革命思想得以宣传，深入人心，大大促进了革命的迅速发展。但在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要不要依靠农民群众这两个关键问题上，革命派犹豫回避，态度不明，因之也就不能对保皇派予以毁灭性的打击。

武装起义。 在兴中会时期资产阶级就准备举行广州起义，以推翻清朝，未能成功。同盟会成立后，把武装斗争放在首位。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刘道一准备在湘赣边境起义。同年十二月，江西萍乡和湖南浏阳、醴陵起义爆发。萍乡、安源六千多矿工参加起义，十天内起义军扩大到三万多人，奋战了一个多月，后被清政府镇压下去。第二年，孙中山又在越南河内建立革命机关，先后发动了两广及云南沿边六次武装起义：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五月潮州黄冈起义、六月惠州七女湖起义、九月钦州、廉州、防城起义、十二月镇南关起义、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三月钦州马笃山起义、四月云南河口起义。在镇南关起义中，孙中山亲自参加了战斗。但由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这些起义都失败了。

另外，在光绪三十二年和三十二年（公元1905年和1907年）间，光复会陶成章、徐锡麟和女革命家秋瑾在安徽、浙江联络会党，组织革命力量。秋瑾以绍兴大通学堂为据点，招致金华、处州、绍兴三府所属会党首领，运动杭州军学两界，准备起义。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七月六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警察学堂学生起义，被清军包围，壮烈牺牲。接着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壮烈牺牲。秋瑾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女革命家，她出身“名门闺秀”，毅然冲破封建礼教，投身革命，自号“鉴湖女侠”。秋瑾又是一位诗人，她曾在一首诗中写道：“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尊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表现了她把生命献给民主革命事业的决心。

多次的起义失败，并不能影响革命强者的思想情绪，相反地在斗争中锻炼了人们的意志与能力。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二月，广州新军中革命党人在黄兴等人策动下举行起义，又失败了，三百多革命志士牺牲或被捕。孙中山为鼓励士志，闻讯立即从美国经日本来到马来半岛檳榔屿，召集黄兴等人开会，鼓励大家继续战斗，布置同盟会全部骨干力量在广州发动大起义。会后，在香港设置了统筹部，作为起义领导机关，黄兴任部长，孙中山继续到海外活动，募集起义经费。在广州布置了三十多处联络点，在娶媳妇的花轿、埋人的棺材里都装满了枪支弹药，源源运到各秘密联络点。革命志士争着参加先锋队（敢死队），由五百人发展到八百人，连华侨革命志士也赶来参加了。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四月二十七日（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爆发了。兵分四路，黄兴亲率一路直攻总督衙门，很快打进后堂，两广总督张鸣岐已从墙洞逃跑。黄兴下令焚烧衙门，转攻督练公所。一路上与清军巷战，打死了大批敌人，但由于没有发动群众、敌我力量悬殊、许多革命志士中弹牺牲，最后黄兴受伤而跪地起来，其他三路也遭到重大伤亡。第二天，起义完全失败。广州人民饱含着革命热情和眼泪，冒着

被敌人杀头的危险，收殓了革命志士的遗骸，共殓到七十二具，合葬到广州北门外黄花冈。

武昌起义前的群众斗争 武装起义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群众的抗捐抗税和抢米斗争，却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有一百多次，宣统二年增加到二百八十多次，除西藏、蒙古、青海、黑龙江等边远地区外，人民斗争烈火烧遍了全国大地。在群众性斗争中，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清政府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要把铁路收归国有。四川、湖北、湖南、广东人民强烈反对清朝政府这种向外国借款，出卖主权，侵吞地方股息的行径，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四川各县成立保路同志会赴京请愿，被逮捕押回四川。成都人民罢市、罢课，清政府派端方到四川镇压，总督赵尔丰诱捕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人，并开枪打死请愿群众几十人。荣县、华阳、新津等县人民在龙鸣剑、吴玉章、王天杰带领下发动起义。进行了抗捐抗税斗争，保路运动的群众斗争，使清政府手忙脚乱，穷于应付。一场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

清政府的骗局 乖巧的清政府，也预见 到革命风 暴即将来临，于是开始采取反革命的欺骗手段。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那拉氏就下了所谓“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预备立宪期九年。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在各省设咨议局。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在北京设资政院。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五月，裁军机处，改设内阁。内阁十三人中满族九人，九人中皇族七人，这是地道的“皇族内阁”。这一套办法，其目的完全是如载泽给那拉氏奏折中所说：为了除内乱，保皇位。

清政府的乖巧，哄骗不了革命的人民。公元1911年十月十日爆发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全国响应 由原日知会等成员组成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吸收了 在湖北的新军士兵达五千多人，占全省新军人数三分之一。1911年九月，文学社主要领导人蒋翊（yì）武、刘复基和共进社主要领导人孙武、蔡济民等联合组成起义领导机构。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十月九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爆炸。俄巡警把起义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搜去，孙武受伤入院。蒋翊武当即立断，决定当晚十二时起义。当领导人正在武昌小朝街总部开会时，突然军警赶来，逮捕了刘复基、彭楚藩等二十多人，还搜去革命党人名册，正在外面送炸弹的杨宏胜也被捕，蒋翊武于混乱中逃走。十月十日晨，湖广总督瑞澂杀害了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瑞澂下令照名册搜捕革命党人，参加革命的士兵决心拼死反抗。

公元1911年十月十日晚七点多钟，武昌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革命士兵总代表熊秉坤借机首先发难。当时后队排长陶启圣查营，见士兵金兆龙擦枪装弹，说他“预备谋反”，喝令捆绑。金兆龙反抗，大呼“同志动手”。他身旁的一个革命同志立即举起枪托打死了陶启圣。熊秉坤趁机号召起义，四十多个革命士兵一齐响应。他们打死了顽抗的反动军官，立即向楚望台军火库进攻。楚望台的工程营左队士兵响应起义，一同占

据了军火库。各营党人，听见枪声，齐举义旗。第二天凌晨，攻克总督衙门，瑞澂逃跑，武昌光复。十一日和十二日晨，驻汉阳和汉口的新军起义，光复了汉阳和汉口。这一年是辛亥年，历史上称为辛亥革命。

十月十一日，起义军代表和绅商代表举行会议，成立湖北军政府。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必须借旧官僚的名望来号召，就拉出一个昨天还屠杀革命党人的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立宪派重要人物、原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在武昌胜利形势影响下，湖南、陕西、江西三省首先响应，接着山西、云南，以后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独立不久，又被袁世凯唆使宣布取消独立）、四川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全国二十四个省，到十一月下旬已有十四个省宣布独立。其余各省也酝酿着脱离清政府。不过各省的独立，多是旧的封建官僚摇身一变而已。他们昔日是清政府的官吏，今日是民国的大员，这些人窃取了革命政权，就阻止了革命向前发展。

各帝国主义在革命爆发后，调集军舰与军队，准备进行武装干涉。北京外交使团估计到清政府不行了，要赶快另觅新的代理人。他们看中了袁世凯这个走狗，要请王朝起用两年前被罢黜的袁世凯。十月十四日，清政府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未满意愿，迟迟不出。十一月一日，袁被任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于十一月二日攻占汉口后，回京组阁。俄、日本、英、美都忙起来了。他们一面乘机窃取权利，沙俄制造蒙古与中国分裂，企图强占东北；日本想乘机吞并东三省南部；英、美也在长江一带活动，与新走狗袁世凯勾结，逼请政府授权给袁世凯，让监国摄政王载灃退位，又对革命党人抛出所谓“和平谈判”的圈套，诱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十一月二十六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密议，由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建议停战议和，同时命令冯国璋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攻陷汉阳。软硬兼施，导致武汉局部的停战，接着又发展为全国停战。十二月十八日在上海举行了南北和谈。在这一时期内袁世凯用尽心机，帝国主义者也为之四处奔走游说，终于达到了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鬼计。

中华民国成立 1911年十二月初，宣布独立的各省派代表到南京开会，决定以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从美国回国，十二月二十九日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改用阳历。一月三日，选黎元洪为副总统。接着，由各省都督府各派三名参议员到南京，成立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了。

再说袁世凯，在南北和谈时，英国公使朱尔典就为之策划了三项条件：停战、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总统。在袁世凯的政治欺骗与军事压力下，湖北军政府接受了三项条件。孙中山反对南北和议，准备北伐。可是革命党人内部意见不一，袁世凯又伪装拥护共和体制。孙中山等革命派受到内外反动派的压力，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谈判继续进行。袁世凯要尽手法，演逼宫丑戏，他劝说皇帝退位，民国将年年供应皇室白银四万两，保护皇室私产，皇帝仍留在皇宫，同时指使冯国璋、段祺瑞联名通电，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向革命党伪装拥护共和。1912年二月十二日，清朝皇帝宣告自行

“逊位”。孙中山为了实践诺言，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辞呈。但为了限制袁世凯权力，提出三个条件：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新大总统到南京就职后，他才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新大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即将制定的约法。二月十四日，参议院同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可是在孙中山派去迎接袁世凯南下的专使蔡元培、宋教仁到北京后，袁世凯表面欢迎专使，暗地却派亲信发动兵变。日、英、俄、德等国也增调军队，配合袁世凯行动。立宪党人和旧官僚，指责孙中山派专使接袁去南京，是不顾国家安危。南京派来专使，受到兵变威胁，反而要求临时政府迁就袁世凯，准其在北京就职。三月六日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窃夺走了。

十一日，孙中山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但袁世凯大权在握，约法竟成为了一纸空文。

辛亥革命推翻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这是革命的主要成就。但把权力交给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代表人袁世凯，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这是革命的失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没有也不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打垮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仍然存在并继续激化，还需要进一步走上新的革命道路。

六十七 袁世凯窃国和二次革命 复辟和反复辟斗争

近代史上的两个祸国殃民的大罪人 中国近代史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结束，共计八十年。在这八十年中，基本上是两个祸国殃民的罪人统治着我们中国。一个是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西太后，她实际统治中国达四十七年之久；一个是袁世凯，他虽仅统治中国五年就死去，可由他培养出的北洋军阀仍统治着中国。这两个祸国殃民的罪人，对外屈膝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主权；对内残酷屠杀中国人民，镇压革命力量。真是罪恶累累，死有余辜。

叶赫那拉氏，即西太后，慈禧太后，原是咸丰帝妃子。公元1861年咸丰帝死，其六岁子载淳继位，即清穆宗同治皇帝。那拉氏就以阴谋手段，发动了辛酉政变（也叫祺祥政变），垂帘听政。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载淳十八岁，那拉氏表面上交权给皇帝，但实际仍干预朝政。第二年，载淳死，四岁的载灃（tǎn恬）继位，即清德宗光緒皇帝。她又再度垂帘听政。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载灃已成年，只好又一次假交权，但朝政仍由她操纵。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戊戌变法，那拉氏又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緒皇帝，自己公开出面“训政”。从此一直到光緒三十四年（公元

1908年)死去,她都始终抓权不放。她祸国殃民的罪恶之大,罄竹难书。近代史上五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除鸦片战争在她以前外,余四次都是她对帝国主义采屈服投降策略,十二项主要不平等条约,除鸦片战争订立的三项外,其余九项,都是通过她才得以签订的,“量中华之财力,结与国之欢心”,是她的一贯思想,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及一些农民起义,是她派军队镇压;并对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阴谋加以利用后又无情地给予了绞杀;连一心保“大清皇位”的戊戌变法,她也不允许存在,制造了流血惨案,囚禁了光绪皇帝。这个地地道道的“洋人的母走狗”,狂咬中国人民的女太上皇,心狠手辣,一生做尽了丧失天良的丑事,直到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才“寿终正寝”。

那拉氏死后三年,由她一手培养的忠实奴才,戊戌变法时的叛徒,义和团爱国运动中屠杀山东人民的刽子手袁世凯,继承了她的衣钵,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正如上题所说,在辛亥革命的烽火中,袁世凯在帝国主义面前摇尾乞怜。在旧主子——清王室面前摇身一变,大演逼宫丑剧。在革命党人面前,要尽圈套。凭着这浑身解数,终于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登上了临时大总统宝座。

二次革命 袁世凯上台后立即依靠北洋军阀建立了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在全国各地残杀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和人民,单在湖北,一年之间就杀害了两千多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志士。

1912年8月,同盟会代理秘书长宋教仁,使同盟会与四个小党派合并,改组成国民党。仍由孙中山任理事长。一些官僚、政客及立宪党人也混入了国民党,宋教仁幻想通过议会选举,建立责任内阁,来分割限制袁世凯权力。1912年十二月国会第一次选举,国民党取得压倒的多数。袁世凯为了保证自己的反动统治,竟在1913年三月,宋教仁从上海坐火车去北京,梦想组织他的责任内阁时,派人刺死了宋教仁,并下令用武力消灭在南方的国民党成员。他的主子帝国主义也马上出面支持,四月,英、法、德、日、俄借给袁世凯两千五百万镑款,作为袁世凯发动内战的经费。这时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才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孙中山提出要能保证革命成果就非去袁不可!南方许多城市群众也开展了反对借款的运动,国民党人的都督也通电反对借款,并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为“先发制人”,就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等国民党人的职权,接着于七月十二日派兵攻打江西。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黄兴在南京宣布讨袁;安徽、湖南、广东、福建也宣布独立,这就是人们说的“二次革命”。可是由于国民党讨袁军缺乏统一指挥,在袁世凯北洋军的大举进攻下,李烈钧从湖口败退,黄兴自南京败走,宣布独立的各省纷纷取消独立,孙中山流亡日本。从七月湖口起兵,到九月南京失守,不到两月,国民党在南方的势力就垮了,“二次革命”也失败了,袁世凯势力伸展到南方各省。

袁世凯逼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废弃《临时约法》。此时,袁世凯自以为宝座稳定了,临时大总统该改为正式了。于是他于1913年十月,硬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并事先雇用了几千名打手,自称“公民团”,包围会场,大叫“如果不把中意

的总统选出来，议员就不能离开会场。”就这样，袁世凯稳稳当地做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美帝国主义首先承认袁记政府，俄、日、英、法等也相继承认。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立即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第二年五月，又宣布废弃《临时约法》公布他自己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由他任命了一个“代行立法权”的参议院，制定了一个《总统选举法》，总统任期十年，可无限期地连选连任，选新任总统还要由现任总统推荐。袁世凯这个大总统，根据法律，不仅成了终身制，而且还是世袭制。成了实际的皇帝。

袁世凯卖国和复辟帝制的活动 袁世凯当了正式大总统还觉着不够味，更想当皇帝，为此他又用尽心机，摆下了三盘棋：第一，先取得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帝国主义无暇顾东方，他就与日本勾结起来。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袁世凯不作表示。1915年一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并以“若开城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为诱饵。五月七日，日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作出答复。袁世凯半推半就地，除第五条“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接受。日本也就一再表示，愿意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排除“一切故障”。第二，进行复辟帝制的舆论工作。首先由其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一文，鼓吹中国宜行君主制；接着由一些政客组成“筹安会”，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第三，假借民意。授意组织这样或那样的请愿团，要求袁世凯当皇帝，一时“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也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买办官僚梁士诒等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议院请愿组织“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解决国体问题。袁世凯的党徒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在全国各省区“选出”一千九百九十个“国民代表”，由他们投票一致赞成恢复君主制，并向袁世凯上《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共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十二月十二日，万事俱备，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预定自明年（民国五年，1916年）起改元为“洪宪”，进行“登极大典”称皇帝。

护国运动 袁世凯的这一复辟倒退丑行，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集会讲演，商人罢市，抵制日货，反袁卖国，反日侵略，爱国人士们把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日本帝国主义见形势不妙，于1915年十月联合英、俄警告袁世凯暂缓称帝；十二月，又联合英、俄、法、意四国再度警告。孙中山在日本发出《讨袁檄文》，指出袁世凯“既忘共和，即为国贼”。号召全国革命同志起而反袁，苏、浙、粤、沪等地发动了多次反袁武装斗争。191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辛亥革命时的云南都督蔡锷（è）正式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向四川、贵州、广西三路出兵。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也相继宣告独立，电促袁世凯退位。袁世凯手下最重要的两个大将冯国璋（江苏都督）、段祺瑞（帝制前国务院总理），也联合浙江、江西等若干军阀密谋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袁世凯哭丧着脸，无可奈何地于1916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从一月一日到三月二十二日，这个早被山东人民称为“袁电蛋”的人，只过了八十三天的皇帝瘾。就当不成皇帝了。只好请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出来收拾烂摊子。段祺瑞逼着袁世凯交出权力，让自己做“责任内阁”。

1916年六月，“袁葱蛋”在万人唾骂声中死去。

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 袁世凯死了，帝国主义又忙着寻找它的新走狗。那时候，袁世凯培养的北洋军阀分为直系、皖系两大派。日本抓住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操纵北京政府，控制皖、陕、鲁、浙、闽等省。直系军阀先后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为首，成为英、美的走狗，占领着苏、赣、鄂三省。还有一个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扶植下，盘据东北。此外，又有一些独霸一省或数县的小军阀，各据一方，各以各自的帝国主义主子为后台。他们之间经常相互火并，争城夺地，使中国陷于军阀混战之中，人民再次备受战乱之苦。

在此期间，还有两段史实，简叙如下：

张勋复辟：段祺瑞为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掌握实权，他企图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讨取其主子日本的欢心，换取日本借款与军火援助。1917年四月段祺瑞召集皖系督军为骨干的各省督军及督军代表二十人，向总统黎元洪施加压力，迫使黎元洪同意参战。五月二十日，国会讨论参战问题，段祺瑞滥用其老上司袁世凯的故伎，蔡使军警、流氓、乞丐数千人自称“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叫嚷必须通过参战案。多数议员愤而拒不开会，非皖系阁员也相率辞职。段祺瑞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在英、美势力支持下，反将段免职。皖系督军通电要率军“直捣京师”进行“兵谏”。黎元洪束手无策，请张勋调停。张勋率辫子军五千人自徐州北上，六月先胜迫使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接着于七月一日在北京拥戴帝溥仪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北京城内又竖起“龙旗”，大街叫卖“宣统上谕”，康有为、张勋文武两大员主持“朝政”。此时段祺瑞抓住时机，自任为讨逆军总司令，起兵讨伐张勋，张勋的辫子兵不堪一击，于七月十二日被击溃。这出滑稽丑剧只演了十二天就宣告结束了。黎元洪下台，冯国璋当了总统，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掌握着实权。

护法运动：段祺瑞由于讨逆有功，而自称是“再造民国之功臣”，为此他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下令对德宣战，向日本借款五亿日元，出卖山东利益给日本，并把东北铁路、矿产、森林抵押给日本，让日本人训练和控制中国军队。这时孙中山主张拥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反对段祺瑞“以伪共和易真复辟”，并于1917年七月，亲自率领宣布自主的海军舰队到广州，九月，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军政府，非常会议选孙中山为大元帅，孙中山把《临时约法》和国会看作民国最重要的象征，他依靠桂系、滇系军阀进行护法运动。军政府成立后，出师北伐，进行护法战争。战争开始不到三个月，南北双方都出现了矛盾和分裂。1918年一月，西南军阀在广州组成“护法各省联合会”，同孙中山对抗。四月，改组军政府，改元帅制为总裁制，设总裁七人，孙中山虽仍为七人之一，但孙中山的权力，已被剥夺无法贯彻实行革命主张。在此情况下，孙中山于五月愤而离广州到上海，“护法运动”只是徒有其名了。

六十八 新时代的曙光

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辛亥革命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地位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以1913年为一百，英国对华输出在1918年降为五一·五，法国降为二九·六，德国货完全停止进口。这样，民族工业有了发展的时机，从1912年到1919年的八年里，中国新建的近代工业厂矿有四百七十多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八年新增资本至少有一亿四千万，超过过去五十年的投资总和。轻工业发展比较迅速，而粉和纺织业更快。1911年，中国纱厂只有二十家，1919年，增加到三十五家，1922年，增加到五十四家。纱锭1913年有五十万锭，1922年增加到一百五十万锭，缫丝厂1911年有二百六十多家，1917年，增加到四百六十多家。面粉厂1911年有四十家，1919年有一百二十多家。产品远销欧、美、日本及东亚各地。

这时，日本、美国却乘机加紧侵略中国。日本在中国设的商行，1912年有七百个，1919年增加到近五千个。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投资1913年有三亿八千多万日元，1919年增加到八亿八千多万日元。美国在中国的企业，1913年到1919年，也由一百三十多家增加到三百多家。

中国无产阶级的壮大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美企业的扩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现代产业工人人数从1913年的一百万人，发展壮大到1919年的二百万人左右。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工人、店员等约有一千万人左右。

中国现代产业工人，就地区来说，主要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青岛、大连、哈尔滨、广州、香港等十几个大城市；就行业说，主要集中在矿山、铁路、纺织、造船、航运等部门的大中型企业。单上海就有三、四十万产业工人，其中在五百人以上工厂工作的，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七。这种高度集中的情况，当时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它十分有利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与战斗。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工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任何实际利益。劳动时间长达十二小时，甚至十五、六小时。工资又低，每天只有两角至四角。1912年到1919年，上海、天津、广州工人工资一般只增加百分之五到三十，但主要生活品价格却上涨百分之五十。在政治上，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权利和地位。在厂里，工人稍有反抗，就能犯法网，逮捕法办。北洋军阀公开宣布要“采取一切力量来制止一切工人的结会和行动”。事实证明：“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

中国工人阶级队在革命斗争中，一开始，就比任何阶级都英勇、坚决、彻底。据统计，从1914年到1919年五月，全国共发生罢工斗争一〇八次，相当于1870年到1911年罢工次数的总和。其中，1916年为十七次，1917年为二十次，

1918年为三十次，1918年头三个月就有十九次。罢工规模，参加人数，组织程度，斗争水平，后者比前者都高。他们的斗争锋芒，除指向资产阶级者外，更指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在1915年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站在最前列，上海码头工人和搬运工人，不怕失业，首先罢工，抵制洋货，散发传单，日商企业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示威游行。1916年，法国侵略者强占天津老开西，北洋政府奴颜婢膝，天津工人却奋起反抗。十一月十四日在法租界的工人全体罢工，“法租界电灯全部熄灭，忽然化为黑暗世界”，法商企业被迫停业。工人组织“工团”，成立“工团事务所”，统一指挥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斗争坚持五、六个月，迫使法帝国主义不得不把老开西地方划为“中、法共管”。

中国工人阶级壮大，中国有了新的革命力量，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斗争，又促使中国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就在这一时期，一些资产阶级中的激进民主派，继续摸索革命真理和道路，适应了这一形势的发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出现了。

新文化运动 1915年九月《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展开了斗争。“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面旗帜，立下伟大的功劳。”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民主”，以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为榜样，学习民主政治。指出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不能寄希望于“善良政府，贤人政治”。“科学”是指资产阶级所需的自然科学和认识自然法则，反对迷信，宣传无神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

1916年国会复会，讨论孔教能否列入宪法问题，引起舆论界激烈论战。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中，指出孔子学说的封建性质及其与共和制的根本对立。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中，更指出孔子是被历代“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成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开始了一次对旧思想的革命。

与此同时，《新青年》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反对雕琢晦涩的文言文，提倡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胡适(资产阶级的右翼代表)提出“文学改良”意见，陈独秀提出“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的要求，触及到了文学改革的内容问题。鲁迅发表了近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控诉几千年专制制度全是“吃人”的历史，他愤慨地揭露反动统治者用那些“吃人”的说教去毒化人心，把一些人变成帮助反动阶级“吃人”的人，“吃”反封建的“狂人”。鲁迅响亮的“呐喊”声，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

新文化运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清除了一些障碍。但是，它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范畴。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

命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逐步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初步具有马列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8年十一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热情指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李大钊等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1919年四月《每周评论》登载了《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译文。

新文化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扫除了一些障碍，做了一些舆论准备，解放了思想，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

中国无产阶级的壮大，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时期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准备了条件。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将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